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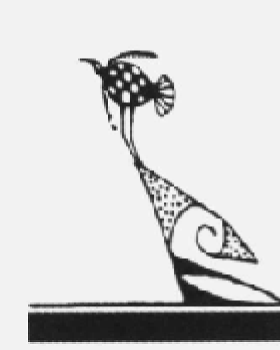
【我所认识的经济学】



目录

第 1 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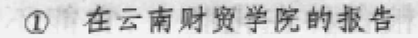
我所认识的经济学①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为什么叫《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呢？因为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建立起来的，不是从哪一本书上学的来的。我接近经济学的一条道路是比较特殊的，因而我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越来越对制度经济学有兴趣，对此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知道现在同学也好，老师也好，普遍都对制度问题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也想把我对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见解跟大家来交流。

西方制度经济学往往讲的是产权理论、交易费用、企业理论。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制度经济学恐怕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今天我把我的一些认识和为什么这么想的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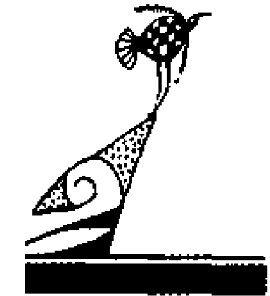
经济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配置好资源。我们现在手头有一些资源，如人力、物力、财力、土地、技术等，这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够转化成为生产财富的一些手段。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用这些手段，用得恰到好处，生产出最多的产品。首先，生产是生产财富，不是生产别的，当然不是物质。物质是不能生产的，物质也不能消灭，物质可以转换。我们用物质的目的是生产出财富



① 在云南财贸学院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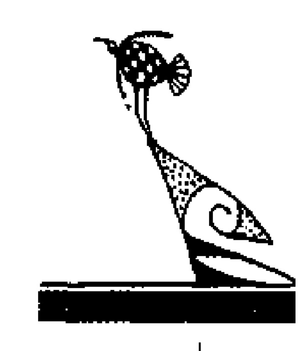
来。所以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积累了这么多资源，怎么利用这些资源来生产出最多的财富？首先，怎么来定义财富？然后这个定义是不是客观的呢？是不是可以公认的呢？是不是也能够自圆其说呢？我们说有些资源，刚才我讲了，如人力、资本、土地、各种自然条件，还有其他各种资源，比如说钢铁、水泥、粮食，甚至还有外汇等，这都是必需的。那么每一样东西怎么把它用得恰到好处，这个问题就太复杂了。我们从何处入手呢？

我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问题。在数学里有现成的方程，就是拉戈朗日乘数法。数学方法是现成的，但是我们怎么把它用在经济学上？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原成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来考虑，把它看成一个在两块土地上，怎么分配化肥使得产出的粮食最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化肥是一定的，譬如是50公斤，现在有两块土地，这两块土地大小也不一样，土壤也不一样，各种条件都不同，但是它们都是种粮食的。农民用化肥种地就是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这两块土地如何分配化肥，使得生产的粮食是最多的？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呢？同学们都懂得数学分析，用拉戈朗日乘数法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它没有给我们任何经济学的概念。你也许会算，因为式子是既定的，但是你未必懂得它是什么意思。我就通过反复的推导，把它的经济学意思弄明白了。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只要定出一个标准，就是每一公斤化肥能生产出多少粮食。有了这么一个标准，你把它分配在甲土地，分配到乙土地，看看哪一块土地上一公斤化肥施下去产出的效果比较大，只要它的产出效果高于你所设定的标准，那么这个化肥就可以用。我再强调一下，这个道理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道理，是经济学里最基本的一个道理，不管是化肥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好，你把它应该得到的效果定出一个标准来，问题就全解决了。实际上即使在同一块土地上，施肥的效果也是不同的。开始时施的肥，它的效果比较大，施的数量越大的话，它的边际产出就降低了。你们想一想，如果施的肥太多，粮食种在化肥上，它能不能



长？这一点农民肯定是知道的。施肥量逐渐增加，最后总会达到一点，化肥的生产效率等于零，再增加的话，它的边际生产能力甚至等于负的了。所以我们知道，一块土地上施的肥太多，效果就差了。因此要设定一个标准，比如说每公斤化肥可以生产两公斤粮食，再看看把化肥放在这块地上能不能达到两公斤的增产效果，也看看在另一块地上能不能达到？如果按照两公斤的标准分配，最后还剩下一些，说明这个两公斤的标准设定的太高了，那就把它降低一点，到1.5公斤。反之，如果化肥最后不够分配，说明我们设定的标准太低，应该要求更高一点，每公斤化肥能生产3公斤粮食。总之，要看手头有多少化肥，手头的化肥越多，可以对化肥促进生产粮食的要求就降低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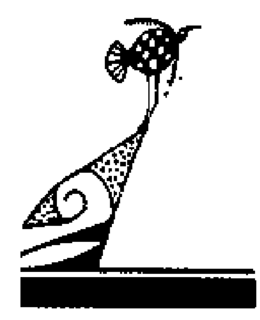
这一方法，不但能解决在两块土地上分配化肥，而且可以解决无论在多少块土地上分配化肥的问题。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学招生，有10万个人来考大学，招生的人数是1万人，1万个人分配给10个大学，我用什么方法分配，使得从10万个考生里头抽出最好的学生来上大学？这当然非常简单，设个分数线不就完了吗？设个分数线，比如说500分可以上学，如果500分没招够，那就降低一点，设490分。所以设定一个标准就一定可以把最好的学生招进来。设定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是活动的，看我们手中有多少化肥，就好像手中有多少招生的名额。这个标准设定的原则，是正好能把化肥用完。



假定标准已经有了，如何实施呢？最简单的办法是告诉农民，用两公斤粮食来换1公斤化肥。农民一定不会把化肥用到效率低的地方去，因为这样用的话他要赔的。他用两公斤粮食换一公斤化肥，然后到地里种的时候，施了肥增产不到两公斤，他就不会用这一公斤化肥。因此农民自动就会琢磨：我这块土地该施多少肥。如果我把化肥的交换水平降低一点，譬如说：1.5公斤粮食换一公斤化肥，那么农民他一定会多用一点化肥。大家看这里头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一个化肥和粮食的比价问题。实际上用不着挑着粮食来换化肥，拿钱来换就可以了。拿两公斤粮食的钱

来买一公斤化肥，也就是说把化肥的价格按粮食价格的比例把它定下来，这就把经济学里头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进一步想如果种棉花怎么办？种豆子，种药材，都可以定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不再是多少斤粮食，而是多少钱，比如是两块钱。那么不管种粮食也好，种棉花也好，种药材也好，施一公斤化肥要花两块钱的成本，他生产的东西，不管是粮食、棉花、药材，还是别的什么，每施一公斤化肥得到的产出一定要超过两块钱。这就是解决了化肥和其他各种农作物之间的价格比例。用化肥的人不多也不少，一定会把化肥施到它的边际产出等于价格的那一点上。施多了，他将赔钱，施少了还有赚钱的机会没有利用够。

再一步步把这个思想再往下推，就可以解决不光是化肥、是煤炭、是电力、是水，外汇、银行的资本、劳动力等等有了价格最优分配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关键是价格要定在恰好把资源用完的那一点上，并不是随便哪个价格都行。这一价格又是按照它能够产出的效果来评定的。今天我们不专门谈最优分配的道理，我就将怎么想的过程给大家介绍一下。择优分配就把经济中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化肥是两块钱一斤还是三块钱一斤要看你收头有多少化肥，定的价格要使得手头的化肥正好卖完，也不要不够，也不要多。价格定得高，买的人就少了，手头的化肥就买不完了；相反的，价格定得太低，手头的化肥就不够买。所以把化肥的价格订到供需均等的时候，这个时候实现的化肥是最优分配。不光是化肥如此，任何一个东西，凡是可交换的，统统有一个供需均衡的价格。这个价格就是这种东西最优配置的一个标准。这就可以说把经济学的问题基本上全部解决了。微观经济学有时候就叫做价格理论。它证明了一个均衡价格可以实现每种资源的最优配置。道理就这么简单。



但是一个商品的均衡或两个商品的均衡和所有商品全部达到均衡，有非常重要的区别。一个商品的均衡我们叫做局部均衡，两个商品的均衡还是局部均衡，一直等到所有的商品全部达到均衡的时候，我们就叫做一般均衡。一般均衡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

重要的变化，一般均衡的价格和局部均衡的价格可能是不同的。因为价格是彼此有牵连的，一个东西的价格变了，会影响别的商品的价格。所以如果所有的商品中有一个商品不均衡，其他商品都均衡，那个价格未必是真的均衡价格。只有最后这个商品也达到均衡的时候，所有商品的均衡才是真正的均衡，这才是一般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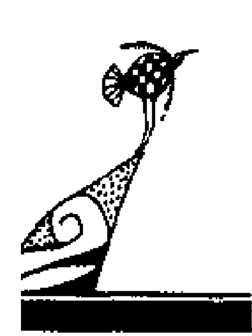
一般均衡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呢？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钱变成度量价格的单位。我们在经济学里头反复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怎么度量？有很多经济学的理论比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只有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以后，价值问题才彻底得到了回答。价值就是一般均衡下的价格，这用不着证明，它是用事实来说明的。因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任何一个商品都可以买得到，也可以卖得掉。因此，你很容易把一种商品变成另一种商品。你把它卖掉，变成钱，再买另一种商品，于是你就把这种商品换成了另一种商品。怎么换的呢？就是按这个价格的比例，将这种商品换成了另一种商品，两块钱一样的东西你卖掉以后可以买两个一块钱的东西，它的交换比例就是价格交换的比例，这是个事实。如果你承认有一般均衡这个现象，那么它必然得到一个结果就是"钱度量价值"，原因就是任何一种商品可以转换成另一种商品。如果你没有达到一般均衡，那么钱在转换的时候，万一碰到那种不能交换、不能均衡的商品，钱度量价值的作用就停下来了。一般均衡时候的价格就是商品的价值，这一点它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如果有的话，这个理论就是一般均衡系统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领域，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所能回答的问题。



下面来讲它的运用。假定我们能够达到一般均衡的话，这时候的钱当然是作为度量价值的工具。拿现在中国的情况来看呢，局部均衡的价格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一般均衡。我们有很多东西现在不能买卖，黄金不能买卖，外汇不能买卖，土地也不能买卖。因此我们现在的价格系统还没有达到一般均衡。相反，美国的价格基本上达到了一般均衡，因为美国的黄金可以买卖，外汇可以买卖，土地可以买卖，我就想不出有什么不可以买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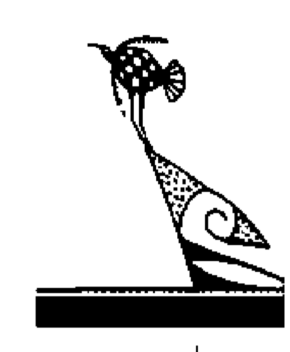
的东西。当然不能违法，买毒品就不行。怎么能达到一般均衡呢？办法很简单，就是公平竞争条件下的自由选择，它会引导到一般均衡。这个道理是我们今天研究制度经济学要想明白的最重要的一条道理，就是说，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在能够自由选择的前提条件下，这时候各种商品会形成各自的均衡价格。当所有的商品都能够公平竞争自由选择的时候，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达到均衡。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改革的经验。在开始的时候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是一般均衡价格，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价格都被扭曲了。是怎么调整过来的呢？我们采取的办法基本上是一个双轨价格，就是计划价格先不动，另外开辟一个自由市场。这个自由市场是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的，谁都可以买，谁都可以卖，没有谁来干涉。这时候就产生了两个价格，一个是计划价格，一个是市场价格。后来这两个价格就慢慢并轨了，最后呢，我们现在差不多达到一般均衡了，或者说比较接近于一般均衡。这个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般均衡状态是存在的和稳定的。现在我们的价格是从一个紊乱状态调整得到的，是接近一般均衡价格的。不但在理论上证明它是存在的，现在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通过逐渐开放价格，它会逐渐收敛到一般均衡水平上去，而且也用事实证明了它的稳定性，就是在价格调整的过程中，它不会破坏整个一般均衡的稳定，它是不会发散的，也不会震动越来越大。虽然在经济学里头这些证明好像是纯理论化的，但我们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在实现一般均衡以前，达到均衡是通过公平竞争，自由选择。达到一般均衡以后，这个系统是怎么维持的呢？也是通过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维持一般均衡。只需要我们能够经常保持公平竞争、自由选择这样一个条件，我们就可以经常把价格维持在一般均衡水平上。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它不仅仅是化肥实现了最优分配，所有可以交换的商品，统统都实现了最优配置，这个社会经济效率是最高的，它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浪费。



大家可能知道我提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劳动力就值钱而中国的劳动力不值钱？为什么一些中国人希望移民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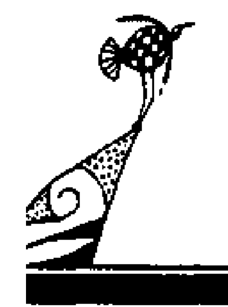
美国去？说到底就是美国的资源配置效率高。劳动价值论说劳动决定了价值，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拿美国和中国来讲，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的劳动力的报酬是不一样的。你不管在美国是当医生也好，当教授也好，在餐馆洗碗也好，你拿的钱都比在中国的同等劳动力拿的高。这原因又是什么？不是同样数量、质量的劳动吗？为什么拿的钱不同？劳动价值论根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经济学根本问题，过去不要说研究，连提都没有人提出来。和美国相比，我们的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很多浪费，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很敏锐的眼光，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社会很没有效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叫大学老师去种地，然后叫工人到大学里来管大学，然后又叫解放军到工厂里去管工厂。就是把床单拿去做窗帘，拿窗帘做地毯，拿地毯做台布，整个乱了套，这个社会怎么能有效率？我们原来的概念有非常严重的错误，以前认为只要为社会主义劳动，添砖加瓦就是建设祖国。现在我们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大学教师去农村劳动，那不是建设祖国，那是拆祖国的台。一个社会，比如说肥皂已经生产得太多卖不掉，现在再去生产肥皂，这个肥皂生产出来只能放在仓库里，生产肥皂用的劳动、材料都浪费掉了。这就说明资源配置有个优化问题，谁干什么，怎么干，为谁干，这都是资源配置问题。



一般均衡的价格信息下，每个人按他自己的利益来选择的话，就实现了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为什么能这么说？这很简单，在均衡价格下，钱表示价值，赚钱就是创造价值，个人出于自利的选择一定能多赚钱，也就是多为社会创造财富。要是价格扭曲了，个人的选择可能跟社会目标不一致。所以说，在一般均衡价格下，个人出于自利的选择和社会目标是相一致的，我觉得这一条是制度经济学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它肯定了经济自由主义，肯定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是合理的，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是有改进的。这和计划经济时候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计划经济认为，一个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一定要影响别人的利益，大家都追去利益的话那怎么得了？所以大家都要牺牲自己，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工

作。但是计划经济也有它的道理，因为计划经济下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有一些人有特权，是计划的设计者或监督者，另外一些人是计划的实施者。在人与人不平等的条件下，如果各人都追求利益的话，后果必然导致混乱。其实，市场经济也一样。一般均衡只有平等人之间自由选择才能达到。所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联系，和平等、自由相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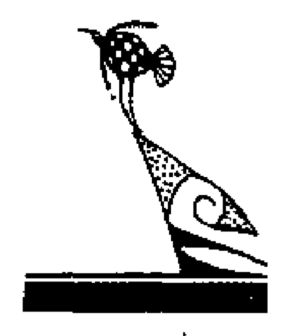
但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正确性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比如说有两个工作可以挑选，一个工作赚钱多一个工作赚钱少，那怎么挑选？我肯定挑选赚钱多的。这份赚钱多的工作，对社会做的贡献也大。但是也可能贡献反而小了，这就是说这个价格是错误的。因为我的雇主不是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人，他想的是别的事，不是按照你的产出的多少来付你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我去挑一个赚钱多的那就搞错了，可能赚钱少的这份工作才是社会最需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呢？因为那个老板不是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来决定你的工资。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从制度上讲，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市场经济承认个人的利益。它不但承认个人的利益，而且它认为，你要是不讲个人利益的话，反而是破坏全社会的利益。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是很复杂的，你坐火车，它正点要开，这件事是非常复杂的。司机必需在场，装货的人必须把货都装上，扳道岔的也得扳好，前头的火车要开走，一系列的事情都得配合。怎么配合的呢？就是靠的市场的力量。在计划经济时候也要配合，靠的是行政命令，你必须怎么样，他必须怎么样。在市场经济下面呢，它是靠的市场的力量。我这次出差到云南来，不用靠什么行政力量，我只要跟旅行社一说，他就帮我把什么事都安排好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价格，靠的每个人最求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逐渐转化为一种职业道德，他哪怕不想赚我的钱，他也不能不赚。因此就出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益是符合道德的。社会是复杂的，每个环节要配合得这么好，效率要这么高，它靠的就是追求利益。这一点逐渐转化成为一个人对职业的一种忠诚。有的时候为了实现自

己对职业的忠诚，你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你所得到的报酬，但是社会得到了利益。

回想一下改革二十多年，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变得比20年前富裕的多呢？我这次来是坐飞机的，20年以前能坐飞机的人是太少太少了。现在每个人家里都有彩电，已经不稀奇了，至少城市里头是这样。20年以前就没有彩电，黑白电视机都很少。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我们的财富增加这么多，并且现在劳动时间还减少了，从前一个星期干6天，玩1天，现在只干5天。区别就是效率提高了，这是自由选择、公平竞争所造成的。农民现在可以进城了，从前不可以；现在公务员可以下海，可以辞职；在海里头的"鱼"也可以去考公务员。道路畅通了，选择的机会非常多，也就是你改进自己为社会奉献的选择非常多。不但在国内选择，还跑到国外去选择，买东西可以买外国货，可以到外国去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源在重新优化，所以我们要参加世贸组织。大家如果都透彻的把握刚才讲的这一套理论的话，你们还会得到许多极其重要的推论。



我来说几个推论。第一个推论就是，科学技术要发生作用，但必须有一个均衡价格。我们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这句话有很大的限制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价格系统，有一个不扭曲的价格系统，一般均衡的价格系统。为什么？靠科学技术的发达，我们能够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减少了稀缺性。科学技术能不能减少稀缺性？确实能够减少。但是首先要知道什么东西稀缺，什么东西不稀缺。如果把这个搞错了的话，那科学技术就不能减少稀缺性，有可能反而增加了稀缺性。这两天我们正在开会，讨论中国的能源消耗中石油的比率在增加，进口增加极快。在这种条件下要不要发展煤炭的资源优势？我们有这个科学技术，比如说煤炭的清洁使用，或者将煤变成石油。我们要不要用这个技术？就看这个技术能不能赚钱。如果这个技术要赔钱，那就没有减少稀缺性，这样的科学技术不是使得我们变富有，而是使得我们更穷困。它也是一种发明，也是一种新技术，但它不

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就要看它能不能在一般均衡价格下赚钱。这道理要紧不要紧？真是太重要了。有些同志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不注意价格和一般均衡条件，那就错了。要知道同样一个技术在不同的环境下它的效益可能是不同的。在煤炭很便宜的地方和煤炭很贵的地方，节约煤炭的意义就不同。我们还注意到，比如在飞机上，厕所的冲洗只用一点点水，大量用的是压缩空气，让空气去吹。因为在飞机的环境里压缩空气更便宜，水比较贵。但是在地上，你决不会用压缩空气去吹马桶，因为水更便宜。这就说明科学技术要有价格做后盾。

如果你同意我的说法，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更重要的推论。人类如果还要生存几百年、几千年，不敢说还能不能活几万年，我们总希望能够生活得越来越富有吧？总不希望越来越穷困吧？我们的儿子孙子比我们更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科学技术。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必须要有一般均衡价格，因此将来要紧的不但是科学技术，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社会能够产生一般均衡价格。什么条件能够产生一般均衡价格？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而且竞争的双方或多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竞争的。不是一个什么理想，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或什么别的革命理想，也不是要去贡献，要的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它产生一般均衡价值。所以我说价格万岁，如果人类要持续一万年，这一万年不可能没有价格。马克思理论是对共产主义的一个科学说明，我们现在得到的理论比这个要科学得多。没有价格人类是不能生存的，除非你回到自给自足、没有交换的时候。这些道理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从最基本的道理推出来的，在它的逻辑上是能够说清楚的。关键是要看清人类社会是怎样发展的，不管是一万年还是一千年，它必须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

非常重要的是一般均衡是怎么达到的？是通过公平竞争。不管已经存在这个均衡价格或还没有这个均衡价格，都必须要有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是效率的来源。因此，我们可以用测量一个国家的自由不自由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浪费。现在国际上就有一个经济自由度指标，测量每个国家经济中的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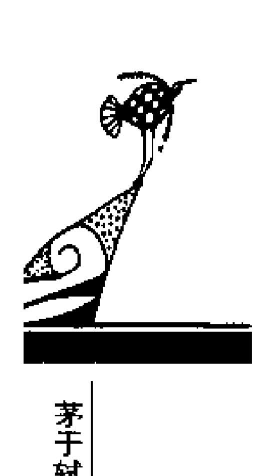
由度，它每一年或每两年发布一次。它怎么研究法呢？比如说，老百姓能不能在本国银行里开外汇存款的账户？当然我们中国是可以的。你可以存美元，可以存日元，而且你拿出来还是美元，现在更宽了，你存美元想拿日元也可以。这就是自由度的增加。我有一个印度朋友跟我说："你们中国真好，真幸福。我在外边挣的一点钱，回家就统统变了卢比。"他们就没有这个自由。再比如说，政府办企业的多少。政府办的企业多，那么老百姓办企业的自由度就减少。甚至于这个国家是征兵制还是募兵也能看出自由度。自由的话就把当兵看成是一种职业，义务兵是每个老百姓都有当兵的义务，这两者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自由度增加的结果是什么呢？效率提高了，最适合当兵的人去当了兵，这就是自由度；不适合当兵的偏要叫他也去当兵，那就是"地毯当作窗帘"了，那效率就降低了。当然，这仅仅是从效率看问题，一项政策还要看公平。再比如关税，关税提高了，贸易的选择就减少了。当然，当考虑到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有时高关税也是有道理的。经济自由度测量的结果，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是香港，第二的这两年是新加坡，再下面就是美国、荷兰、德国。这个研究从 1986 年开始，中国进入这个表大概是在 1996 年。从 96 年到现在中国的排行往前提了很多，现在中国在全世界的排行在中间稍微偏高一点，最近一次的评分香港是 9.4，中国大陆是 5.6，最差的是两分多，就是缅甸、北朝鲜这些地方。现在樊纲博士作了一个中国各个省自由度的研究，最近研究结果和报告已经出来，他得到的结论是经济自由度越高的省人均收入越高，证明经济自由度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他的资源利用效率是有关系的。我国浙江排第一，广东第二，云南可能是靠后。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越自由越好？有没有一个限制？有限制，一个人追求利益是有限的。限制在什么地方呢？其实非常简单，别人跟你一样，他也是追求利益的，别人也愿意自由。因此**我的自由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我的利益不能妨碍别人的利益，这就是非常简单的答案。我们要追求自由但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

我们要追求利益,但不能妨碍别人的利益,这就是界限。因此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理论:一般均衡是个人追求利益达到的,但个人追求利益是否能达到一般均衡,就看有没有人与人平等,每个人都不妨碍他人的自由;还是某一部分人有权得到更多的自由,从而影响到其他人的自由。

从学术上讲,一般均衡是一个瓦尔拉斯均衡,而现实世界的均衡是一个博弈均衡,必须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博弈均衡才变成瓦尔拉斯均衡,此时两个均衡就重合了。不能实现这个制度环境的话,那么个人追求利益的博弈结果是偏离瓦尔拉斯均衡。也就是说,这时候得不出一般均衡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市场规则,这个时候个人的博弈行为变为整体的瓦尔拉斯均衡,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博弈均衡变为瓦尔拉斯均衡。刚才我讲的每个省的自由度不一样,同时还得看每个省的制度环境。有的省很自由,但他的制度环境不好,偷东西、抢东西、打官司特别多,大家不讲信用、假冒伪劣特别厉害等等。假冒伪劣是不是追求自由?也是自由;是不是追求利益?也是追求利益,但是这样达不到瓦尔拉斯均衡。所以一个省不光要有自由,而且还要有制度,也就是说政府能不能维持一个好的商业环境。我给樊纲提出了一个补充的指标,就是你看看每个省的省会(现在差不多所有省都有高速公路)的高速公路收费卡,省委书记的车通过时收不收费,这就是一个标准看这个省有没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政府是不是在破坏市场。政府破坏市场,市场就好不了。政府带头,大家都去学,都走邪门歪道,还有什么一般均衡?自由度这个指标很起作用,我到了很多省看了很多地方,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投资环境好的省,它的政府首脑的车过卡要交钱,只有军车不交钱,我觉得做得最好的是深圳,深圳就是只有军车不交钱,其他车都要交钱。别的省就不一样,有的省是省委书记不交钱,局长要交钱,有的省局长也不交钱。自由问题就是一个市场环境的问题,市场环境当然有好多方面,我刚才讲的例子是过路卡收费,其他太多了,一百条、一千条都有。那么,这些一百条、一千条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人



与人的不平等。所以一个市场发育得好，它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反过来讲就是没有特权。人和人不平等就是有特权，市场经济必须是没有特权的，如果有特权，那么博奕的结果将达不到瓦尔拉斯均衡，博弈的结果是一个价格扭曲的纳什均衡。这样的均衡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人们争权夺利。人跟人不平等，有特权的人有特殊的利益，大家都争取特权，干吗自己去生产呢？瓦尔拉斯均衡就是市场均衡。市场制度是产生均衡的重要前提。我们讲市场制度，它不光包含交换制度，尤其包含平等自由的条件。我是自愿的，没有人能强迫自己，我自愿参加一个交换，因为它对我有利；同样，对你也是一样的。所以交换是最自然发生的事情，如果谁也不来干预的话，那它一定会发生，而且应该是平等自由的交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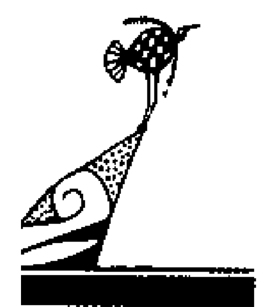


但我们知道市场制度是人类历史中很晚才出现的，不是好几千年，而是最近两三百年才开始的，原因就是有特权对市场的干预。有了特权市场制度就建立不起来。中国是皇权制度，皇帝就是一切，皇帝要杀谁就杀谁，要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个人又有什么保证？有什么公平竞争？你能跟皇帝竞争吗？也没有任何自由，特权者要奴役你，哪能给你自由？没有竞争、没有公平、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市场制度。外国也一样，一直到现在还这样。我们看世界上凡是人与人比较公平、人权得到保障的，他的市场比较发达，人民比较富裕；人权被践踏的、有特权存在的，这些社会的经济都发展不起来。你不要看他名义上也叫自由经济，也叫市场经济，也叫民主政治，但他是没有个人自由的，他有特权，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比如说印度，他经过改革算是市场经济，也有民主政治，也有多党竞选，但他的社会经济发展不起来，原因就是他的社会非常不平等。大家都知道印度的女性是非常受歧视的，印度还有四个种姓，你姓什么决定了你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像这样的制度，就没有一个公平的机制。所以，真正在背后起作用的是人权，或者说是平等。

由于人跟人平等，我们对自由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

有特权，那么自由只有特权者才有，其他人是没有自由的。如果每个人都要有自由，那么每个人的自由不应受到别人干涉。每个人又是别人的环境。要想每个人都得到自由，首先必须不干涉别人的自由。所以实现自由的根本之道在于每个人都不干涉别人的自由。这时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没有人干涉的环境之中，也就得到最大的自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开始是要享受最大的自由，如何做到这一点？最后是你得约束自己不去侵犯别人的自由，只有这样，你才能享受到最大的自由。同样的道理，每个人要达到最大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每个人都不去侵犯别人的利益。

有一句话是保护私人财产，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交换，有市场制度。我们过去把这句话看成是富人的口号，富人有财产，所以才要保护。所以保护私有财产似乎是富人提出来的。其实富人之所以富，并不是因为他的财产得不到保护才富的，富人的财产是得到保护的。谁的财产得不到保护？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所以保护私有财产实质上是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对那些无权无势的人的财产的保护。而对中国来讲谁的财产最得不到保护？农民。农民的负担可以加重，也可以减轻。现在要减轻农民负担，这说明他们的财产没有保护，像个橡皮泥，可以捏来捏去。就没有人说要减少部长负担，他的负担本来就没有谁敢侵犯，他还可能侵占别人的东西。其实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发展经济，就是因为最穷的人、最没有势力的人，他的财产得到保护，有钱有势的人也不敢去侵犯他们的财产。不论是谁想要钱再多一些，你不能靠掠夺，只能靠和大家合作，从合作中得到利益。如果我能侵犯别人的财产，那我干吗还要劳动呢？我干吗还要和人合作呢？正因为私有财产严格得到保护，特别是对弱势力群体的财产得到严格保护，人的自利本性从破坏因素变为创造因素，这时社会的财富就开始增加。否则的话，自利导致对财富的争夺，社会的财富只是在转移，从他的手里转移到我的手里，更不用说在争夺过程中所发生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另**一方面就是保护财产的成本越来越低，而侵犯财产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是人类社会开始变富有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保护私有财**



产应该被道德支持就是这个原因。有谁侵犯别人的自由，谁最容易侵犯别人的财产？那就是有势力的人。所以我们对有势力的人要加以限制，这个社会就能够发展，就能够创造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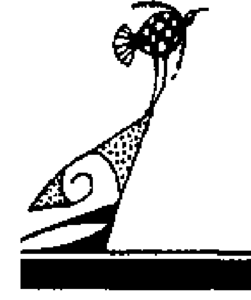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从来的革命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是穷人剥夺富人的财产。穷人们没有看到，最需要得到保护的恰好是这些无权无势的穷人或普通人。革命来临时图痛快于一时，破坏了私人财产的保护。结果穷人依然是穷人，只好等待下一次革命，历史就是这样重复着。当改革代替革命之后，情况才可能有所不同，如果统治者不懂得让步，革命就难免要发生。

我觉得这些对中国当今研究制度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也能看出来，为什么经济学家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就是我刚才讲的，接触过主流经济学的人就知道在一般均衡下做自由选择对社会是有利的，所以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主义。那么谁反对自由主义呢？就是想侵犯别人利益的人，他最反对自由主义。当每个人的自由都不能干涉的时候，他就没有机会去侵犯别人的自由。我记得前年我在威海讲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道理是一样的。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么我要把我的利益让给你，如果你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你要把你的利益让给我，那怎么办呢？如果有一个第三者的话，那么利益给他，如果他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就不好办了。所以是谁最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是那些想占你便宜的人。谁讨厌私有财产得到保护？是那些想侵犯别人财产的人。谁讨厌自由主义的口号？是那些想侵犯别人自由的人。



最近这两年我又在想一些别的问题，我受到黄有光教授的启发，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经济和快乐》。经济学家容易犯一个毛病，认为增加财富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美国通过了一条法律，就是美国所有的政策都要通过经济可行性分析，通不过就不能添进去，这就是把社会财富的增加看成是社会的最终目标。对这样一种说法我以前也丝毫不怀疑，我也主张什么事情的是非判断都要看看有没有利。现在我认为这个想法有很大毛病，其原因就是，

黄有光教授讲的人追求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财富，财富不过是一种手段，财富可以使我得到快乐，但最终目的是快乐而不是财富。如果我们把最终目的看成是快乐的话，那么我们看整个世界会大变样。这个想法对一个人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处事待人都会有启发。我们把财富看成是追求目标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快乐不一定需要财富。当然有财富可以快乐，但也未必，有时财富是一种苦恼。还有更多的方法让你没有财富也能得到快乐，而这些方法没有人教你，也没有人去用它。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小学学如何读、算、写，到大学学一个专业将来能赚钱，人生之道最后想的是怎么赚钱。小学老师讲没讲过你怎么快乐、什么叫快乐，从来没有人讲，大学也没有人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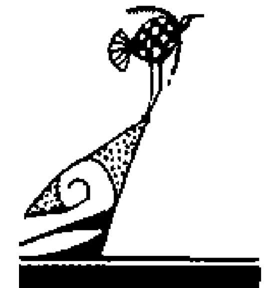


我们用经济学研究快乐更有一点优势。经济学有一个帕雷托改进，就是没有任何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得益，这就是一个帕雷托改进。用帕雷托改进的原理来研究经济学的时候，要求没有人变穷，至少有一个人变富，这确实是好办法。现在我认为要把帕雷托改进拿来研究快乐。没有一个人变得不快乐，但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一点，那么全社会的快乐总量就增加起来了。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全社会的财富增加，而更重要的是全社会快乐的极大化。你怎么使全社会变得更快乐？这个问题我想了两年的时间了，我希望每个人都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它会改变你整个人生，使你变得更快乐，也使你周围的人变得更快乐。你将来当了外交部长，也要用这种方法处理外交事务；如果你当了总统、当了主席，也要用这个方法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时候全世界可以变得更快乐。孔子曾经讲过许多使全社会快乐增加的办法，比如说“君子成人之美”，就是人家有一个好事，你帮他达成了，这就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事。自己没什么损失，而帮人做成了一件好事，那多好。相反的是妒忌，他的考试比我成绩好我就妒忌，就不快乐，甚至使坏；他比我有钱，我就不舒服，我就有气，这样一个社会不可能使得所有的人都感到幸福。我们不但要希望比自己不足的人更幸福，也希望比自己更幸福的人更幸福。在一个社会里，你往往比其他的很多人

幸福，如果人家真心诚意的祝福你幸福，当然你愿意，那么你也应该祝福比你处境好的人更幸福。有很多事和这一原则相悖，就不应该干。跟人发脾气、摆架子，就是常常犯的毛病。摆架子就是“臭”字，“臭”字就是有点自大。作为一个自大的人，他使周围的人不愉快，对他自己也好不了，干吗这样呢？相反的，如果你是一个很谦虚的人，“谦受益，满招损”，你愿意向别人学习，人家就喜欢你。因为你向人家学习，人家觉得你看上了他的优点，不但看上而且身体力行地学习，他当然很高兴。对你自己也一点坏处没有，我把人家的好处学来了，有什么坏呢？大家的快乐都增加了。我们应多表扬别人，你觉得一个人好，不要放在心里，要把它讲出来，这不是一种马屁，马屁造成外部性，别人讨厌拍马屁的人。你真心诚意的表扬人，比如女同志都喜欢别人称赞她漂亮，你说她漂亮，她一定高兴。如果她确实不漂亮，就说她今天衣服真好她也会高兴的。总之，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这个环境靠我们自己去创造。可惜的是，这方面的学问研究得太少，有时候我们造成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世界。有的人是得理不饶人，这是很坏的毛病。当然他没错，他本来就很有道理。但你不饶人的话就造成全社会的痛苦和压力，不是快乐增加了。你有理，你批评人家，但要有爱心，让你批评的人觉得你确实很好，我要改正，他才会高兴。这些道理实际上不是大学讲台要讲的东西，可是我们这方面确实讲得太少了，研究的太少了。我特别感觉我们应有一个更宽广的胸怀，我们看待人类社会要有更长远的眼光，不但看中国，也要看全世界；要看大陆，也要看台湾；要看中国，也要看美国，我们要有平和的心态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20 世纪与 21 世纪最大的不同从国际事务上来讲，争夺资源的时代，炮舰外交、派兵侵占人家的领土、去奴役人家的老百姓、搞慰安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1 世纪不大会再有这种战争。伊拉克就是想侵占科威特的财产，现在叫他赔钱，赔了 900 多亿美元还没赔完，不赔也得赔。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敢出兵去侵占别人的财富？过去搞慰安妇现在得道歉、得赔。但是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就安然无事，不打仗了？现在世界上的冲

突还存在，潜在的冲突也还存在。为什么有这些冲突？我觉得就是违反了我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道理。

自由是人的权利，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如果你爱这个人，你首先不要干涉他的自由。父母爱子女，你就不要干涉他的自由，他想找什么对象、学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你可以给他建议，你帮他分析，但你不能干涉他的自由，自由是他的权益。谁最容易干涉别人的自由？在家里就是父母，如果你是父母，你就不要干涉孩子的自由；社会上就是领导、政府，如果你是单位领导、或代表政府，千万不要干涉别人自由。我一个朋友纠正我说："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这句话非常得好，因为自由是人的权利，任何人没有权益剥夺别人的自由，人家想干什么只要他对别人无害，这是他的权利。这是我们的社会能够安宁、能够发展最基本的前提。你老想管人家，说人家这个不对、那个错了，那这个社会就危险了。现在这个世界的矛盾就是这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谁对谁错？以色列人说巴勒斯坦错了，巴勒斯坦说以色列错了，没任何理由。你到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去听听看，各自的理由强得不得了。不要为正义而战。为正义而战似乎是最崇高的事，我是为这个社会的正义而战，多好！但不要为正义而战。为什么呢？因为巴勒斯坦有巴勒斯坦的正义，以色列有以色列的正义，到底谁的正义对？那就打吧。现在21世界上的问题就是为正义而战，或者说你不尊重别人，或者说你不给别人自由。你为什么要干涉他？你凭什么理由干涉他？你喜欢别人来干涉你吗？我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我们还有机遇，还有远大的前程，但怎么对人待物、判断是非，小到个人家庭、配偶，大到国家关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



现场答问

问：问如何看待私有化、民主法制建设和公有制的关系？

答:中同改革的重心应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如果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发展,那么我们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经济增长依靠的就是民营经济。我作了一个比较,全世界的国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比重,比较的结果是:自由主义的国家也有国有经济,但比例都在百分之十上下,少的百分之七八。我相信如果我们按这样一个标准,该国有的国有,该私有的私有,将来我们的经济将比现在更健康的发展。现在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按产值来说是35%,将来我相信还会减少。这个原因并不是任何人主观上想怎么样,而是不减少不行,不减少国有经济政府负担不起。我们回想20年改革,也就是一个民营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讲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我国修改宪法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我很同意要以德治国,光有法律没有道德这个社会是很可怕的;光有道德没有法律也有问题。我认为法律和道德是相辅相成的,现在问题是以德治国讲的是什么"德"。我想不要再唱高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逻辑上有错误,而要从基本做起,比如说:诚实。首先政府要做到,要尊重每个人,政府要尊重每个老百姓,我们的政府官员很少微笑服务。以德治国应该体现在这些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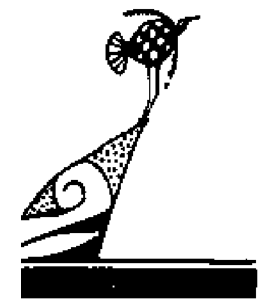
问:请你谈谈您在《中国经营报上》提出的"股票价格不可测"的观点。

答:其实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了股票价格是不可测的,如果股票价格可以测,那么大家都可以发财,大家都发财的结果是大家都发不了财。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测,人家也可以测,都会测的话,结果把你发财的机会就弄丢了。而且这个价格不可测不仅仅是从确定性意义上,而且是从概率意义上不可测。但是并不等于价格变化的趋势不可测,趋势是可以知道的。就是你可以猜测,而且不是随意的猜测,而是作有根据的猜测。因此呢,投机是可以赚钱的,如果你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有预见。所以,经济学家可以做股票,但他做不了今天买、明天卖那种股票生意,他可以作长期股票投资。他可以判断那些行业有前景,那个公司治理好,这种判

断使他必然会有盈利。

问:如何从体制上解决农村问题?

答:我觉得农村最根本的问题是人权问题,农民的财产、个人的自由要得到严格的保护,但这句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我们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变成发达国家了。我们回头看看20年的变化就会有信心了。这20年的变化,我们自己是从中走过来的,感觉好像自然而然,但是我们看看所有经济转型国家,包括苏联,这些转型国家的经济学家非常羡慕我们,说如果我们当初也按这个方法,那就不至于搞得这么糟。所以中国经济有非常大的进步,包括农村,现在城市的改革远远超过农村。这里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发展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是平等和互利、公平竞争、自由选择。现在农村还做不到,怎么解决?怎么让农村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繁重的任务。我估计我们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转变。就是要普及农村的教育,而这个教育不能用现在的教育方式,要用现代的公民教育,城市也要有公民教育。你当一个公民,你应该如何处理你跟周围人的关系、你跟政府的关系,当你的权益被侵犯时,你应该如何对待。我跟农村有不少联系,我感觉到农村有人欺负他的时候,他怎么办?一般是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找几个兄弟哥们把仇人揍一顿;第二个办法就是到县里头、省里头或者到北京找一个大干部。这就是他能想到的,他很少想到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当然这个法律手段到底有效没效?法律手段成本很高,而且他受的冤屈又不利于帮他。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长过程,但我们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中国要走向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一方面在政府,一方面在老百姓。并不是政府存在不民主,改变一个政策就变成民主国家了,不是这样。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为什么红绿灯下要有警察。因为中国人不服从法律,而服从人。闯红灯,按法律就不该有,如果没有警察我就冲过去。这样的老百姓自己都需要有人管,他怎么去管国家呢?再比如交税,有的人非常爱国,打台湾,愿意上前线,但叫他交税,他不想交。这似乎不可理喻,怎么有为国献身的精神却不愿意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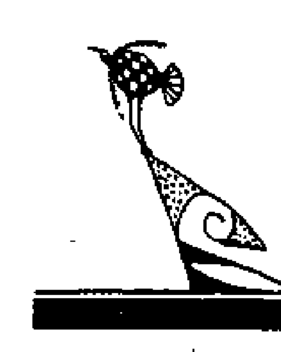


税？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税应该交，打台湾，我们应再考虑考虑。

问：中国整个国家和企业怎样应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配置？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根本。中国参加世贸组织后最根本的竞争就是人的竞争，中国人在全世界的竞争结果并不坏。在东南亚很多国家，经济命脉都是华人掌握。在美国、欧洲学校里学得最好的往往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很差的民族。但我们底子薄，教育水平低，环境不好，包括质量环境、生产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都不行。你看中国人到美国就有机会发挥，因为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讲人力资源，就是应培养一个好的环境，每个人都要努力，而且要懂得处理人际关系，我们讲环境就是人际关系。

问：张五常先生认为：国有企业不可改进，只可废止。你如何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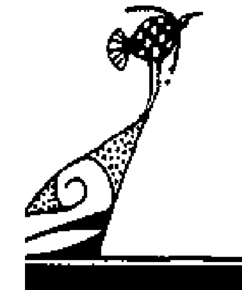
答：我跟他的观点类似，但不完全一样。我觉得国有企业可以变成有效率的企业，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汪洋大海的民营经济。由民营经济创造出一个价格，国有企业创造不出价格来。民营企业创造价格之外，还要有人员、信息、物质与国有企业交流。国有企业的经理要到市场上去请，他的干部、工人都要与民营企业交换，他的资本、资金来源要跟民营企业竞争，这样国有企业就可能变得有效率，否则确实不行。

问：请问现在的中国要实现公平竞争与自由选择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答：我觉得最需要做的是从自己做起。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你要求别人做可能做不到，人家不做你怎么办？但要求自己这么办，我自己肯定能做到。我今天给大家讲我的一些思想，也是我满腔热忱对大家报有希望。就是我们要做这么一个人——平等、与人为善、成人之美。

问：如何定义、定量快乐？快乐是否等同于效用？

答:经济学里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各种商品的消费数量,经济学把效用看成是物质生产函数,而且是增函数,消费越多、效用越高。在这样一种定义下,经济学的大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可以建成逻辑上统一的、没有矛盾的理论结论。如果把效用改一下,比如说,我要比别人更富,把这个作为效用函数,经济学的大厦就要坍塌下来。为什么?使我痛苦的人是谁呢?比我更富的人使我痛苦。因此有一个人比我穷我就得到快乐。把中国最富的人变成最穷的人,让全中国的每个人都得到一点快乐,但第二富的人变成第一了,还要把这个人拉下来。弄到最后呢?所有人都一样穷。大家看到了吧,如果把效用函数修改了,经济学的大厦就坍塌了。快乐能不能度量?没法度量。但有一点,快乐可以做帕雷托改进。效用是无法度量的,你的效用跟我的效用是无法比较的。经济学里有一个多目标函数,就是每个人的快乐都是目标。那么如何解这个多目标函数呢?帕雷托改进。你不需要比较每个人的效用多大,只要知道他的效用没有损失,而其他人的效用改进了,这就好了。快乐不是自我牺牲,让你得到快乐,而且我不需要牺牲快乐。我表扬你,你快乐了,但我没有什么损失。



问:茅老师,您说到中国经济有很大的自由,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经济仍摆脱不了政府干预的特性,现在经济的繁荣掩盖了政府行为,尤其突出表现在中国股市的发展。中国股市是在为国有企业圈钱做贡献,但大多数中小股东的利益谁能保证?如基金黑幕、庄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虚假,难怪吴敬琏痛斥中国股市的黑,我赞成他的观点就是股市就是为国有企业圈钱。另外,二板市场究竟会不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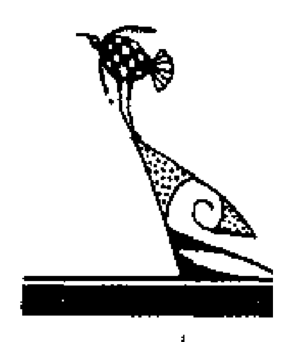
答:我觉得中国有很大的自由度,是指我们与20年以前比较,这些年的变化是不断的朝更多的自由度发展。我也同意你说的现在中国还有政府干预。关于中国股市的问题应该看到这样一点,就是我同意吴敬琏的说法,我们股市很黑、毛病非常多。但我们要看到中国股市成长得非常快,而且政府做了很大努力来纠正股市

中的问题。这个同志说得对，中国股市为国有企业圈钱，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当大的错误，但现在已经在改正了，现在开始有民营企业上市，而且二板市场迟早要上。

问：民营经济的产值已大于国有，这是否与公有经济体制相矛盾？

答：我觉得"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句话迟早要改，我们看宪法改了好几次，开始是80年代，第一次修改为"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开了一个大口。本来是私有经济等于零，最近改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还不是主要而是重要。最后应该是"所有经济同样看待，无所谓为主为次"。

问：是否可以将你所说的自由、财富、快乐的关系来看待我国的腐败现象？



答：中国的腐败与好多事情相联系。一个是我们从计划转到市场，认同了个人利益，但没有强调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从来的哲学家把坏事看作"私"造成的，这是错的。坏事并不是"私"，而是侵犯别人的私造成的。这点非常细微的差别造成了重大看问题的不同。"私"它既不坏也不好，它是中性的。一块石头没有私吧？它也不会有同情心。人有私心，有时会做坏事，偷盗、抢劫、骗人，但有时候私心也可以做好事。别人有困难是帮助他，同情心就是私心产生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将来的这个大同世界是一个无私的世界，那就错了。"私"这个东西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它否定。我们要的只是不侵犯别人的"私"，别人的"私"和自己的"私"一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社会毛病、丑恶，都是侵犯别人的"私"造成的，而不是"私"造成的，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法制不健全，法制不健全就是司法不独立，有的地方非常不独立，简直就是暗无天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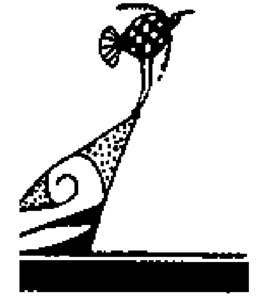
问：吴敬琏认为股市是"零合游戏"，你如何看？

答：我认为股市是创造财富的，交易费用是产生价格的成本。我刚才讲了半天价格的重要性，但价格怎么产生出来？它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它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交易费用。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价格信息，你要价格信息，就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而且创造正确价格信息的人应该得到报酬。从这个道理出发，参与股市的投机者，那些买卖股票的人，如果创造了一个正确的价格——什么价格？企业的价格，那么他就应该得到回报，这个回报就是股市赢得钱。如果他创造一个错误的价格，他会得到惩罚，等于他产生的是废品，从长远来讲他会赔钱。这就是我的解释。

问：从中国经济信息得知国家对西部开发的省、市、地区的投资比例不一样，云南低于四川、重庆等地，这是否是茅教授所说的择优分配的经济学原理？对云南这些基础设施不如四川、重庆的省份，在加入世贸以后，没有好的投资环境，国家怎么来缩小西部省市之间的差距，甚至和东部省市之间的差距？

答：我觉得市场必然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简单的道理就是市场可以靠钱来赚钱，因此钱多的人钱会越来越多，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所以市场有好多毛病，今天没有时间来讲，我讲了很多市场的好处，但没有讲它的毛病。毛病中的一个就是贫富差距，这个差距市场本身就有，而需要其他方法来解决。



第2讲

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①]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欢迎光临世纪大讲堂，有人说，假如有100个人关心市场经济的话，其中可能只有1个人关心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今天我就把这稀少的1/100请到我们的演播室，他就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好，有请茅先生。请坐。

我想先跟您聊聊天，为的是向大家介绍您是一个什么样人。我记得您是1946年上的大学，是吗？

茅于轼：对的。

主持人：能告诉大家是哪所大学吗？

茅于轼：上海交通大学。

主持人：那是一个光荣的大学，因为我们的总书记也是那儿毕业的。

茅于轼：他比我高两届。

主持人：当时您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茅于轼：我学的是机械工程。

主持人：好，我知道您是一位经济学家，那您早期的学术专业

① 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演讲

攻的是机械,当时您是怎么求学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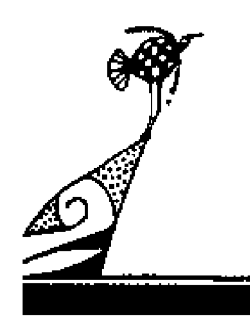
茅于轼:我在铁道的机械部门做研究工作做了30年,从1950年到了差不多70年代末。开始做的是纯技术性工作,以后逐渐对经济有兴趣,就在70年代中后期转变到研究经济上来。

主持人:在北京,如果去哪个京戏团的时候,他们在讨论一个人背景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个词来区分两种人:一个是京戏真正的演员,另一类人叫票友。那您在经济学界,是不是相当于梨园的票友?

茅于轼:对,原来是票友,现在变成演员了。

主持人:您自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是哪一年?

茅于轼:那是70年代末。



主持人:70年代末,思想正开始解放的时候。您那个时候研究的课题是什么?

茅于轼:我研究的是最优化问题。

主持人:什么?

茅于轼:最优化,optimization,就是把一个事情做得最好。

主持人:这个中文我都没有听懂,这"最优化"是什么意思?

茅于轼:最优化,不是自由化,最优化是最大最小。

主持人:是把财富怎么最优化?

茅于轼:不光是财富,做各种事,为了达到一个目的,用最低的成本来把它做好。这是最优化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主持人:好,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道德问题了?

茅于轼:那是1985、1986年的时候。

主持人:我查了一下您的资料,发现您1984年的时候,有一个工作上很大的变动,就是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

茅于轼:是的。

主持人:调到那个地方什么所?

茅于轼:美国研究所。

主持人:这还是不着边呀?

茅于轼:它里头有一个经济研究室,研究美国经济,需要懂经

济的人。

主持人：这个调动跟您研究的方向有什么关系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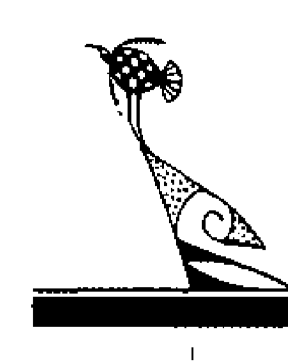
茅于轼：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一些间接的关系，因为到了美国所，我有了更宽的一个眼界，可以接触到美国的经济、文化、社会，所以更开拓了视野。

主持人：您是发现了美国社会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很好，然后一对比，发现咱们这边很差，才开始…？

茅于轼：这不仅仅是一个好跟差，两个的区别非常大。道德观，或者说判断是非的标准，我们刚刚从计划经济出来的人，跟市场经济的那一套差别很大。

主持人：好，至于差别为什么大，让我们在讲演当中去体会。下面就请茅先生给我们带来一场学术报告，这个学术报告的名字叫"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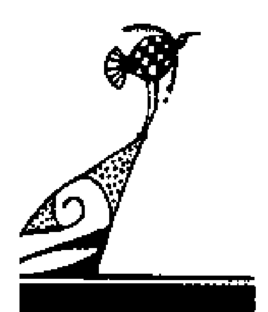
好，有请。



茅于轼：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基本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觉得这二十多年，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我记得1982年的时候，我头一次出国，到英国去，我看到英国超级市场里的东西，如此之丰富，对照一下我们自己什么都要票，什么都买不着，东西质量很差，看到国外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一双袜子也是好的。我带回来一点土豆片，哎呀，我们的同事吃后，说土豆还能做成这么好吃的东西。现在呢，当然还有一些穷困的同胞，但是整体来讲，收入增加了好几倍，四五倍吧，平均寿命也到了七十多岁。像这样一个成绩，是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三千年中间，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变化是我们每个人亲身都体会过来的，它怎么得到的？当然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是非准则有变化，就是道德观变化了。道德观是一个人判断是非的标准，所以他做事情会按照他的道德观来行为的。

计划经济的道德观是什么呢？就是无私奉献，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我们的祖国。市场经济道德观，虽然也没说完全否定

这些东西，但是真正驱动市场经济的力量，是个人的利益。现在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经济确实是发展起来了。你看，这个区别有多大？一个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斗私批修，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共同的，不是个人的。但是在市场经济呢？它也讲共同的道德，但是它真正的推动力是利益，是个人利益。我们看看计算机，每一两年就要换一个代，这个技术进步的力量从哪儿来的呢？不是为了一个什么崇高的理想，就是为了赚钱，你不改进，你就被淘汰，你能改进，你就能赚很多的钱。现在所有的技术，这么发达，这么高。大家知道，全世界每天有多少个航班在飞吗？差不多有十万个航班在飞，一年就是几千万个航班。这么多航班，就很少听说有飞机掉下来。可靠性这么的高，简直不可思议，这就是追求利益造成的。市场经济出现至今，也就是二三百年吧，人类的进步超过过去几千年。它的动力就在于承认个人追求利益的权利，这个权利得到保护，得到承认。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基本变化，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变化。



但是，我们也看到市场经济中种种丑恶的现象，过去很少有的，现在我们看到太多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呀，借了钱不还呀，毁约呀，人跟人人情淡薄，就知道钱。大家就怀疑了，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就非得弄成这样子吗？物质上的享受当然是重要的，但是物质享受是不是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呢？丑恶的现象，是不是和市场经济是相伴相成的、不可分离的呢？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认为市场经济承认人追求利益的权利，不一定会造成方才提到各种丑恶的事。这种丑恶的事，不是追求利益造成的，而是侵犯别人的利益，侵犯了别人的私。因为我的私，侵犯了别人的私，这是错误的，是错在这个地方。如果我有私，你也有私，我不侵犯你的私，你也不侵犯我的私，那么这个市场经济就不会出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借了钱不还，那就是侵犯了别人的私，假冒伪劣就是侵犯了别人的私。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区别这个私在什么地方是好的，到了什么地方它就变坏了。换句话讲，我们要看清楚，私是一个推动力，但是它越了界限，就变成一个破坏力了。

从古以来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把私看成是万恶之源，所有的坏事，都是因为私干出来的，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私不是做坏事的原因，侵犯了别人的私，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想清楚了，我们承认每个人的利益，比如说私有财产，它应该受到保护，这就是承认每个人的利益，承认每个人的私。但是我们要严格的区分，不要让这个私膨胀，以至于侵犯了别人的私。

当然，我这样讲，是非常理论化的一个说法。在现实社会中，在生活中，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克制自己的私心，原因就是利益界限是很模糊的，到什么地方算侵犯了人家的利益了，这个很难客观科学地判定，虽然有各种方法来鉴别它。市场经济的法律，整个民法，它就是想办法界定你的利益的界限。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大多数时候说不清楚，我们研究经济的人也说不清。举一个例子讲，一个企业赚了一百万，资本家应该拿几万？工人的奖金应该拿几万？这是说不清的。又如，海湾仗打了，石油涨价了，有的企业赚了好几个亿，你说这个钱是资本家的贡献，还是劳动者的贡献呢？没法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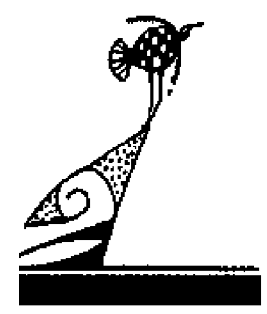


再比如说，一个科研项目，给了一百万奖金，十个人一个小组，分这一百万。我们可以说某某人的贡献大，某某人的贡献小，这个大体上大家能承认，但是贡献大的该拿多少钱呢，贡献小的该拿多少钱呢？像这种的事，根本就没有一个科学界定的方法。因此，如果你只强调我有我的私，我的利益要得到保护，而不去想人家这一方面的话，冲突就在所难免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虽然知道私是得到保护的，但是也知道，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减少社会的摩擦，减少冲突，减少社会的成本，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要克制自己的私心，使得社会能够平稳的运转。因为，一旦发生这种事，除了有些事是很明显的，如我方才讲的借了钱赖着不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但是有很多案件，双方都感觉理由充足得很。这种案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大家都克制一点，这种问题就不会发生了，就不是互相冲突、诉诸法庭，而是继续合作。我们想想，是继续合作得到的好处大，还是去打官司得到的好

处大，这还用说吗？因此一个市场经济要运转得好、有效率，它要把很大一部分的力量，用在生产性的活动上头，不要用在非生产的活动上头。

当然，什么是生产性的活动？这是经济学里头要问答的，并不是说任何一种生产，都会创造财富，有很多活动、很多劳动，不但不创造财富，而且还消灭财富，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但是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人跟人的合作，它是创造财富的一个前提，人跟人的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没什么好处，浪费资源。

所以，一个社会财富要增加，要有一个好的效率，就需要有道德的限制，每个人都要讲道德。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到大连去出差，有一位管大连自来水的同志跟我讲，说大连非常缺水，每一个家庭一个月只能够用三吨水，北京好像是可以用七吨、八吨。三吨显然是不够的。这三吨水是一块六毛钱一吨，超过部分，就变成十六块钱一吨，要罚十倍的钱。于是，很多家庭就用嘀嗒嘀嗒偷水的办法，放一个盆，嘀嗒一个晚上，这个盆就满了，这不用花钱，因为水表不走嘛。为了对付这个普遍的偷水现象，自来水公司就找了个教授想对策，教授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做一个精密的水表，嘀嗒嘀嗒，这个水表也能转，但是这个水表价钱很贵，也要十倍的价钱。可是因为大家都偷水，大家都得装这个很贵的水表。你申明自己不偷水就可以不装吗？谁信你呀？这件事情说明，本来大家都不用装这个水表，但是因为有人不讲道德，损人利己，就不得不搞这个水表，最后大家都倒霉，包括原来不偷水的人。



我也可以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我几次到柏林去，柏林地铁售票的地方是一个大通道，没有售票的人，只有售票的机器。每个人自觉自愿到自动售票机上买一张票，而且是分距离的，距离近的票便宜，距离远的票贵。你到什么地方，你把钱放进去，自动售票机就会给你一张票。没有人查票，也没有机器查票，也没有人在车上检票，它的效率就非常高。我几次到柏林，我特别注意这件事情。我到过不少大城市，各个国家的，好像柏林市是唯一的一个城市，它没有任何查票设备，节省了设备的费用，节省了人力，因此它的

成本就可以降低。这就是说大家都守规矩的话，最后得到好处的是大家，每一个人得到好处。如果我们北京地铁要是没有人检票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从这一点看，我们跟德国人比，确实是不如。

现在说起来，我们从计划经济变换到市场经济，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不知不觉地在进行。由于我们资源配置的规则起了变化，又有许多到国外去的人，外国人也不断地进来，有各种文化的交流，我们逐渐的接受了市场经济这么一些道德观念。但是应该讲，现在还非常的不够，我们还需要加速这个过程。怎么加速？这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我想有许多方法可以提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要多宣传正面的事情。不是说坏事就不能讲，坏事要批评，这是肯定的，也要揭发，但是要以正面的宣传为主。什么道理？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到一个公园去，里面是干干净净的，你在这个环境里头，也会有意保持这个公园的干净。相反如果你来到一个公园，到处都是脏东西，你也会跟着扔脏东西。我想大家会同意这样一种习惯。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到了一个好的公园里边，你感觉我享受了大家遵守规则、提供给我的方便，因此，我也有义务跟大家一样，为大家提供这个好的环境；如果人家都是挺随便地扔脏东西，我不扔脏东西，于事无补啊，对我反而还吃了亏了。这就说明当你感觉这个世界都是很好的人，你也会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好人，你感觉世界都是坏人，你就觉得我做好人就吃亏了，我也去做坏人去。当然，我这是说一般人。中国有很多鲁迅所讲的民族的脊梁，就是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我要遵守自己的道德准则。也正因为这样子，我们这个社会尽管在最糟糕的时候，也还会有维持正气的一股力量。



再比如讲，影响老百姓道德的主要因素，在家里头是家长，他是主要因素。家长要是规规矩矩的话，他的孩子一定也比较规矩；家长打人、骂人，这个孩子往往也是跟家长学。在学校里头也是一样，教师是主要因素。现在很多小学的老师还体罚，打孩子，还骂孩子，缺乏爱心，这样的孩子教出来，就很糟糕了。在社会上，是领导。社会团体也好，机关里头也好，一个领导自己坐得正，底下就

好得多。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政府，政府要遵守道德，要讲老实话，要有爱心，要守规矩。所以，要把重点放在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这些人上头，所以为什么道德的教育，我们讲言教不如身教，就是说你讲了半天，用处不太大，也不能说没用处，但是你自己做出来，就不同了。它的原因就是：你做出来，不但是一个榜样，而且使大家感觉到我享受了人的一种道德服务，我有一个义务，我也要提供这种服务。方才我讲的例子，在干净的公园里，你享受了大家的道德服务，所以你也会提供这种服务。

所以说，要让我们有信心。大家往往觉得，哎呀，我们这个社会道德真糟糕，没办法，其实怎么会没办法呢？你自己做起，人家的事你管不了，自己的事总能管吧？我不管人家怎么不道德，我要讲道德，你不要说每个人都这样想，有一半的人这样想，我们今天的社会就变了，相反，你总是等着人家先做好了，我再来做，那咱们就彼此等着吧，就没有改善的一天。自己的事你自己能管，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每个人自己有这个决心，做一个符合道德的人。



主持人：好，谢谢您。

主持人：首先，来看一下来自凤凰网站的问题。这位网友叫“有妖精就有天使”，他说，听说您老在山西搞了一个大型扶贫行动，这是您倡导市场经济时代的道德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吗？我知道您已经72岁了，所以想跟您说，您老千万别累坏身子，其实，一个人或一伙人声音微弱的为道德奔走，并没有太大用处，您老想做孔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吗？

茅于轼：我在山西做了一个扶贫的事，很小的一件事，但是做了好多年，8年了。我收集了一些钱，拿到农村去做小额贷款，从几百块钱现在发展到了十几万块钱，那么一个小村庄，有了这个钱，就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是很受欢迎。前两天，我另外又收集了一点钱，又开辟了两个点。这是一种扶贫的试探，通过这个，我认为可以纠正一个错误观点，认为穷人不讲信用，或者说穷人没有能力讲信用，借了钱不大能还，我在那边8年运行下来，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笔赖帐。

观众：茅老，您好，我是经管学院的学生。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仓禀实而知礼节”。你刚才也说到，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对来说，道德水平或者文明程度要高一些，那么您认为，是不是发展经济应该放在第一位上，只要咱们经济发展了，道德水平相应的就能提上去？

茅于轼：其实，道德跟经济，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一个人吃不饱饭，你要求他讲道德，不是不可能，就是很困难。但是，我们现在的道德水平，我觉得跟1963年、大概是1963年我们学雷锋的时候差得远。学雷锋的时候，那确实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比1963年恐怕要好了10倍的样子，所以未见得一定是有关。但是一个人如果连饭都吃不饱，要他讲道德这是比较难的。但是生活好了也未必一定道德就高。“优俸养廉”，就是主张给政府官员很高的工资，让他不贪污，我觉得这不一定对。但是有一条是对的，你给他的工资，至少要够他生活。给他的工资连生活都不够，那他作为一个人，生存是第一位的，他找点小钱那是很难避免的。另外，越是讲道德的社会，经济越容易发展，就是我方才讲的一些例子，所以它是互相在作用，经济跟道德有关系，道德又反过来影响经济，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关系。



主持人：好，谢谢。

观众：我不知道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同。从您刚才的回答当中，我好像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现在人们的道德观，普遍没有以前的好，而现在的生产力，明显是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国外那些发达的国家，他们的道德观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对于我国，生产力既然已经发展了，为什么道德观反而下降了？

茅于轼：我说两个看法。首先说，计划经济下的道德观，我觉得它有很严重的缺点，它能够维持于一时，但是最终这个道德观是难免要垮台。它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它抹杀了个人追求利益的权利，它把利益仅仅看成是集体的利益，集体的利益究竟落实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计划经济，它能够用集体利益来鼓动大家努力

工作，而且这个成果确确实实能够体现在每个人身上，我相信这个制度是可以运行的。但是，事实上，计划经济它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资源配置的错误，这个在经济学里头是可以严格证明的，因此它必然是一个低效率的经济。换句话讲，工人、农民努力工作的结果，生活没有改善，不但没有改善，连饭都吃不成了。因此，它这个道德观，最后就是什么啊，就是大家都不相信了，我这么卖力气干，为什么生活没有一点改善。

另外，这个道德观在逻辑上还有它的问题，它提倡无私，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在逻辑上是错误的。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把利益给你；你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你把利益给我，但是我不能接受，因为我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如果有一个第三者，他不是毫不利己，咱们把利益都给他，问题才能解决。如果他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请问这个利益给谁去？这种理论把自己和他人看成是两个人，但是对于一个整体社会来讲，自己就是他人，他人就是自己。跟你说话的时候，我说我是我；等到你说话的时候，我就变成你了。所以我跟你是一样的事，你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到底利谁呀？大家要注意雷锋他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是帮助有困难的人，这是对的，但是你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变成一个普遍原则，那么没有困难的也得帮助他，或者说穷人要帮助富人，这有道理吗？我们说富人帮助穷人、强者帮助弱者这是正常，但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错了。我们看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在马路上给人理发，不收钱，他旁边排了一个长队，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不是来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来捡便宜的。你培养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培养了十几个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因为它逻辑上是错误的。

再说，我们传统的道德跟市场经济的道德，是不是有区别呢？当然，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一致的，比如有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等等。但是有许多地方不同，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传统道德里头缺乏人跟人平等这个最基本的因素，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跟人平等上头的，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它要

求尽可能的要没有约束。我刚才讲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追求利益的结果，使大家都富起来了。在经济学里头叫做“个人选择符合社会目标”。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有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包括法律跟道德。在这个制度框架下，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当然是符合他个人利益的，他的选择恰好符合社会目标，正好这个社会需要你做这个事，你正好又去做了。所以亚当·斯密，就是我们经济学的老祖宗，他就讲，一个人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工作，比他故意地为社会做好事对社会的贡献还大。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他当时讲出这句话来是叫人大吃一惊的，现在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根据。这些东西，在我们传统的道德里头是没有的，平等和自由，孔子从来不讲这个，相反他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子和小人有区别，他把人看成一种是管人的人，一种是被人管的人。而现在的市场经济，是没有这种区别的，是人跟人平等的。市场经济都是反特权的。消灭特权，市场经济才有前途。现在我们的经济正处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步一步的克服各种特权。



观众：我想问题在于讲道德的人多，还是不讲道德的人多。拿北京地铁来讲，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小人，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君子；而国外地铁呢，它认为大部分人都是君子，而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小人，所以他可以不用检票，只用查票就可以维持这个秩序。所以，我想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认为大部分人是君子，什么时候可以认为大部分人是小人，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另外，我想，道德跟法律制度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仅仅是法律的一个润滑油呢？我的问题就是这些，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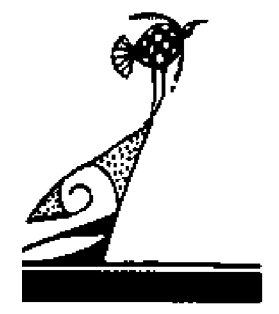
茅于轼：到什么程度可以算是大多数人都讲道德，这个我想会有一系列的方法可以来测量的，西方国家有很多这样的研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用盗版软件，这个很容易看出来，有百分之多少人用了盗版软件。在德国这种事情就极少极少，每个人他自觉自愿会去买正版软件，而且你根本看不到有盗版软件的市场，你要去copy 人家的软件，人家是不给你的，人家会很惊讶的，说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没有道理。有很多研究，当然，这是作为一个科学的一种方法来讲，地铁公司它可以根据研究的结果，来判断应该设检票员好，还是不设检票员好。如果守道德的人越多，那么设检票员的必要就越低。

第二个问题是——

主持人：道德和法律，到底道德是不是就是法律的润滑剂？

茅于轼：其实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打官司的双方都觉得很有理，这就是说明道德和法律是有界限的，有区别的。法律是试图把利益界限划清楚，可是它是划不清的，许多纠纷法律没法解决，只有道德能解决。另外有很多行为，虽然是一个错误，但是不认为是犯法。比如说开会迟到，大家都等着，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但是你不能说开会迟到就犯了法。这样的事很多。那么，如果一个社会道德很好，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法律呢？还是需要法律。因为什么呢？因为也不希望大家过于退让，我也非常退让，你也非常退让，最后怎么呢？有一些利润、一些财富不能创造出来。所以，需要有一个尽可能明确的界限，能够把所有创造财富的机会都利用起来，这时候又要有法律，又要有道德。另外，法律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一种事后的处理，而道德是时时刻刻在约束一个人的内心，使坏的事情不至于发生。另外，道德是没有成本的，而法律是成本很高的，是非常奢侈的一种工具。



观众：茅老师，您好。我想再提一下刚才那个问题，我曾经看过关于您在山西扶贫的有关报道，通过那篇报道，确实证明了穷人也是有信用的，穷人也是有尊严的。那么，从那篇报道当中，我看到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您所找到的那个管理员，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管理员。现在有这种担心，说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个管理员比较负责任，基金会才搞得比较好？还是说您的一套管理制度非常适合当地情况，或者说有进一步推广的价值？

茅于轼：这个管理员是一个关键人物，这一点也不错，我碰巧找到了一个好管理员。我也找过另外一个管理员，因为1996年我试图推广在另外一个村，结果这个管理员就找错了，我给了他五千

块钱，结果他就自己花了，后来费了大劲，过了一年才把这个钱追回来。但是，光有一个好的管理员还不够，还要有一套制度，所以在那个地方我立了一套制度。这个制度最基本的特点就是透明化，如何借钱都贴在墙上，谁借了钱，谁还了钱，谁付了利息，墙上都有。所以，老百姓很关心这个事，他们一看就看两个钟头，琢磨谁谁谁该借不该借，一边看一边还议论，所以有这么一套透明的制度，管理员就受到大家的监督。另外，从我这儿讲，有很多钱是我的亲戚朋友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拿来的，他的钱先是给了我，然后我给了这个村庄。我对他们每一个出钱的人要做报告。我每过一年，或者一年半，要写一个详细的报告，谁谁谁几月几号出了多少钱，现在他们加起来一共是多少钱，跟他的账要符合。那就是说在我这儿也要透明化，让每个人看到他出的钱，现在在什么地方，在起什么作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钱都是私人的钱，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大款的，都是工薪阶层，都是自己的钱。所以，他们知道，这个钱不是来路不正的钱，所以他们用得也是很仔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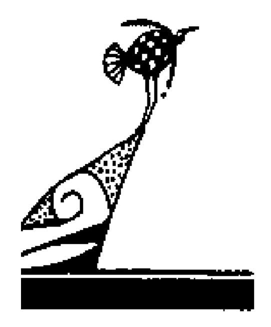


观众：茅先生，您好，我是清华外语系的学生。我刚才听了您的讲座之后，我的感觉是从经济上来讲，您可能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的赞同者。那样的话，我觉得您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概括，就是说，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来实现整个群体的利益的最大化，以达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我觉得您在谈到道德问题的时候，您同时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您不断地在提出一种道德上的自律，就是说让每个人从个人来做起，然后达到一种和谐、繁荣、向上的这种情况，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比如说，这种道德上的自律，似乎是非常微弱的，而且并不能起非常大的作用。那么这样来看，您有什么具体的，就是说道德制度上的这种解决方案呢？再就是说，如果涉及到法律问题，比如说刚才提出高薪养廉的问题，现在看来，对于广泛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无论是高薪养廉，还是道德上的约束，都不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否赞同严厉的法律上的制约机制？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茅于轼:用严厉的法律来制止。

主持人:古代话叫"乱世用重典"。

茅于轼:我对这个不太同意,我觉得任何一个制裁,都要恰当,不能够过头。我很反对这种说法,叫做"罚他一个倾家荡产",我赞成孔子的一句话,叫做"以直报怨"。有以怨报怨,也有以德报怨,孔子说的不是以怨报怨,也不是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直"就是正直,不是歪歪曲曲的。这里讨论的是如何对待坏人坏事。有一种做法就是以怨报怨,你给我使坏,我也给你使坏;你杀我的人,我也杀你的人;你搞阴谋诡计,我也搞阴谋诡计,这就是以怨报怨。以德报怨呢,这是基督教的精神,你打了我左耳光,我给你右耳光打,感化你,让你转变成一个好人。这两种方法都有它的道理。以怨报怨,一个人一旦做了坏事,这个坏事就报应到自己身上,那坏事就没有了。以德报怨那更是崇高的,他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潜在的良心,只要不断地教化他,他总有一天会改正。这就奇怪了,这个极端也有道理,那个极端也有道理,难道这两个极端都是对的吗?这从逻辑上就讲不通,所以孔子就提出来了,他说以直报怨。什么叫以直报怨?就是要用符合道德的办法去对待坏人坏事、错人错事。我不能够用不符合道德的方法对付你。不能因为你不道德,我也就不讲道德;你使阴谋诡计,我不能够跟你也使阴谋诡计。但是我又不能够纵容你,要制裁你、批评你。当然要恰当,而且要从爱心出发,给他有改正的机会。包括这回在美国发生的恐怖分子的事情,我觉得要用孔子这句话,要以直报怨,一方面要制裁,但不是报复,报复就是以怨报怨,这是没有结果的,要用以直报怨。我们大家要想一想恐怖分子为什么这么做,他是不是有他的原因,我把这个原因消灭掉,这个坏人坏事就没有了。



主持人:他的原因是以怨报怨嘛!

茅于轼:对,就是啊,以怨报怨,这是没有完的呀,你杀了我的人,我也杀你的人,那还有个完吗?也不见得你力量大,一定能打得赢,这种战争是很难说的。所以,我觉得孔子的思想里头,这句话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一句话,其他的我们都懂,"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这个谁不懂啊？“君子成人之美”，这个都懂。但是以直报怨这句话很可能就有人不懂。我们现在老说“罚他个倾家荡产”，这就没有懂孔子的精神。再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谁敢保证我一辈子不犯错误，那你犯了错误，你希望人家怎么对待你，人家把你一棍子打死？当然不希望这样子，希望能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让我有改正的机会。所以我们把犯人抓起来了，关在监狱里头了，这是需要的，但是你还得有耐心，教育他。在发达国家，不管这个人有多大的罪，判了死刑，到临死刑的时候，牧师要为他祷告，请上帝宽恕他的罪行。而在我们这里，比较普遍的做法是把犯人游街示众，还要高呼口号，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对待坏人坏事，自己要有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光是一个制裁报复，这是不够的。



主持人：好，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例行公事，请您用一句话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谈到市场经济的道德，您认为现在目前我们这个道德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茅于轼：侵犯别人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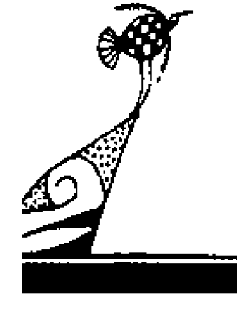
主持人：侵犯别人的利益。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解决它？您能用一句话回答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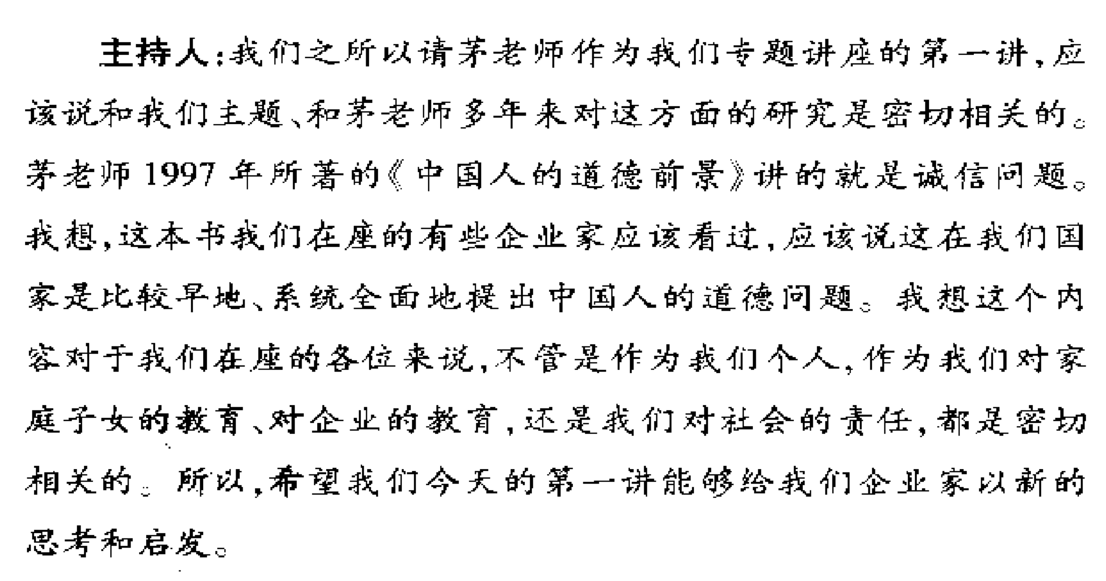
茅于轼：每个人自己从我做起。

主持人：每个人自己从我做起。好，谢谢您！谢谢大家！

第3讲

道德、信用与市场经济





主持人：我们之所以请茅老师作为我们专题讲座的第一讲，应该说和我们主题、和茅老师多年来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茅老师1997年所著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讲的就是诚信问题。我想，这本书我们在座的有些企业家应该看过，应该说这在我们国家是比较早地、系统全面地提出中国人的道德问题。我想这个内容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说，不管是作为我们个人，作为我们对家庭子女的教育、对企业的教育，还是我们对社会的责任，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第一讲能够给我们企业家以新的思考和启发。

好，我的介绍先到这。作为茅老师本人，应该说在我们国家是比较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茅老师原来不是学的经济学，学的好象是一个工科。

在座的企业家大部分也是学工科、学机械专业的。为什么茅老师转向了研究我们社会经济问题，我想这自有他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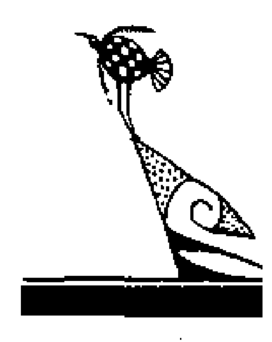
好，我们先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茅老师给我们作讲座。

茅于轼：我感到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在座大企业的老总交流。我是研究经济的，大家在企业里工作，这样一个不同的经验和立场，我想会给我们双方都带来兴趣。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道德、信用和市经济。

我们国家改革之后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现在我们比以前要富得多了，我们生产的东西要多得多了，但是从1992年到现在，整整是1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1992年是14.1%，一路下滑到现在是多少呢？7.3%。其中有两年有小幅度的回升，1996年和2000年，回升的幅度也很小，而且也是靠着政府的巨大的努力，等于是硬把它推上去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现在我们的增长率还要低。因此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究竟我们经济出了什么毛病？用什么方子来治这个病？

我们宏观的经济形势实际上影响着我们每个微观的企业。当企业的运行环境不好到宏观形势不好，总需求达不到供给，东西卖不出去的时候，企业出现了问题，他想付款拿不出来，三角债也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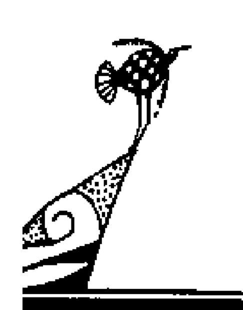
我今年七十多岁，我七十多年的经验，给我最明显的一个总结，就是大环境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好。我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之后五十多年，简单说起来，国家好了，我们每个人都好，虽然你也说不清它怎么联系起来的，但是这确实是个事实。所以我们整个宏观经济的前景并不是和我们隔得很远的，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

现在，增长率不断地下滑，下滑的原因就是总需求不足，那么今天我想谈一谈总需求怎么样跟我们的信用发生关系。我曾经写过好几篇文章，根据我的分析，我们现在的需求不足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信用不好。

首先我要分析一下需求是怎么构成的。总的生产或者总的供给都要用掉，怎么用掉？一部分就是消费者，但是我们不会吃光用光的，我们一定有剩下的储蓄，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一部分是消费掉了，吃掉、用掉、花掉，还有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储蓄的是钱，要把这个钱变成购买，那么这个总的生产就可以全面用掉。所以，关键的一步是在于我们的储蓄能不能变成购买，买什么？就是投资，就是买机械设备、买厂房、钢筋、水泥、玻璃、修铁路、修公路、修

飞机场,把它用掉,用工人、用劳动,所以我们整个生产出来的财富,除了消费之外就应该是投资的,这个投资是通过储蓄转变成投资。当然,严格的讲还有一部分是出口,但是出口在我们整个的总需求中比例不是太大,百分之二三就这么一点。有的时候,净出口还是负的,我们这两年是出口大于进口。那么,现在构成这个全部需求的可以说三部分,消费、投资和出口,或者说净出口,净出口就是出口减进口。

这三部分中出口占的比例很低,所以我们研究为什么总需求不够,主要研究的是消费和投资。增加消费好不好?对当前来讲是很好的。可是,增加储蓄好不好呢?你增加消费就是减少储蓄了,那么减少储蓄的话,就得减少投资的,因为投资是靠储蓄的,消费掉的那部分东西就不能拿来投资了。只有储蓄,即没有消费掉的这一部分才能拿来投资。这一部分直接和我们能不能扩大再生产有关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他告诉我们,你要扩大生产规模,你必须经过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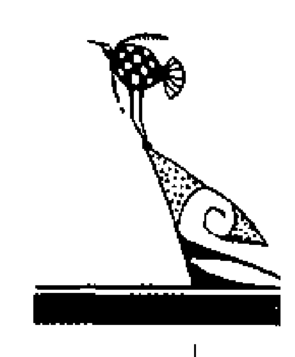


我们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的消费只占了整个生产出来的量的60%,有40%是变成储蓄了,这个比例在全世界各国中间,可以说是最高的,除了两个小国家——新加坡和南朝鲜比我们高一点,在大国家里头,我们是40%的储蓄率,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这也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不是吃光用光,我们有很大比例储蓄起来,我们很节省。这个40%的储蓄率是使得我们20年有连续平均起来9%增长率的主要原因。

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假定我一年生产出100块钱,我消费掉60块钱,剩下40块钱储蓄,这40块钱全部拿来盖厂房、买设备变成投资了,那么今年我投下去40块钱,明年我能生产多少?一般讲,大概4块钱的投资,到第二年能生产1块钱,所以40块钱的投资,明年你就多生产出10块钱来,今年生产100块钱,由于有40块钱的投资,我们明年就生产110块钱,这个账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如果有40%的储蓄率并全部投资的话,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达到10%。像我们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别的国家不具备,他

们没有那么高的储蓄率，像美国储蓄率只有15—18%，日本稍微高一点，就是30%，我们达到40%。

可是，如果这个储蓄的钱变不了投资的话，就惹出问题来了。按理讲，储蓄不能变成投资是很讲不通的，为什么不能变投资呢？中国人总的说起来还是比较穷，收入还不高，我们很羡慕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收入高。我们都希望要致富，大家都希望增加更多财富的生产，怎么增加？搞投资嘛。你不投资，用原来这些设备当然也可以提高效率，但是比较困难。可是，现在储蓄的钱变不了投资，储蓄的钱都在银行里头搁着。从货币来看，钱只是一张钞票，但是从经济来看，它对应着已经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银行里的钱借不出去，就是商品卖不出去。银行不太愿意把钱借出去，要是借出去的钱还不回来，银行负责人的乌纱帽可能要丢。所以，银行里的信贷部门对于贷款给企业家是不留情面的，他情愿把这个钱存到中央银行去，中央银行给他利息。如果他拿中央银行给的利息来支付给存款人的利息，他还有收入。所以银行可以躺着睡大觉，他只要把钱收进来之后往中央银行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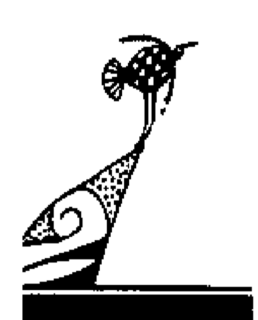
这么一来就坏事了，储蓄就变不了投资了。你必须把银行里的钱转移到企业家手里去，企业家拿它去扩大再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卡在这里，就是银行里的钱不容易流到企业家手里去。为什么原因？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政府对企业家的服务不够，服务不到位，使得企业家对于办企业有各种顾虑，不太积极。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说兰州有一个私营企业的服装商店，放着一件童装，上面有个标价的牌子，结果工商检查的时候，说你这个牌子歪了，要罚款3000块钱，这是不是一个笑话？可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发生在兰州的事。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讨价还价，最后罚了100块钱，而且也没收据。

像这样的事，当然是很极端的了，类似的事情也很多很多。今天上午我也说了，有的地方政府逼迫企业说假话。办一个企业非常难，在座诸位都是办企业的，你们都有这个体会。政府不给你帮助，而给你刁难，你说这个企业家还愿意办企业吗？所以，这是头

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的服务不到位，甚至有时候刁难企业。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信用不好，就归到我们这个主题上来了。因为借钱是靠信用，今天上午很多同志都讲，借钱和买商品不太一样。买商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借钱一手交钱一手拿回一个借条，这个借条能不能变成钱，天知道。如果信用好，这个钱比较容易流动，信用不好，这个钱的流动有很大的障碍。

流动的障碍可以用利息率来表示，利息率很高就表示流通障碍很大，利息率低说明流动很容易。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农村（现在城市里面也有），有高利贷，一年的利息是30%、40%，为什么会这么高的利息率呢？因为借高利贷的人都是信用比较差的，很多高利贷还不回来，有很大的损失。



信誉好的，借钱比较容易，利息也比较低，这就说明信誉和利息是有关系的。一个大企业，有很大的资产，财务情况也很好，这样的企业到银行去借钱没什么困难，你拿出你的财务报表给银行看，银行认为你债务情况很好，你信誉度很高，他直接借给你钱。所以，信誉可以直接转为储蓄投资。

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比我们要好得多，所以美国的利息率是比较低的。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在美国是没有高利贷的，中国高利贷是很普遍，现在越来越普遍，这里边原因很多了。为什么美国就没有高利贷呢？因为美国人都很容易从银行借钱，申请一张信用卡，你只要有正常的收入，信用卡就给你了。一张信用卡，你可以超支5000、10 000，你可以申请5张信用卡，10张信用卡，并不难。因此它把高利贷取代掉了，高利贷一般也是短期的，你不会高利贷借个五年十年，那还受得了。你拿借高利贷的利息率支付信用卡是富富有余了，所以，这样一来，美国这个社会就没有高利贷。这两个情况对比，就看出，一个社会它的信用问题在经济效率方面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那么，美国的信用好，它享受了非常大的利益。我们想想，中国有差不多两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多钱干什么用了？大部分拿去买美国的债券，主要是美国的财政部债券，美国的国库券。

中国这两千亿的外汇储备从哪儿来的呢？主要是我们的出口盈余。所以我们出口很多东西到美国，而从美国进口的东西并不多。所以，美国用了很多中国的产品，完了他写一张借条给我们。你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美国人白用你的东西，倒不是完全白用，他也要付你利息。你省下那笔钱拿到美国去投资了。我们希望外国人直接投资来中国，我们现在却投资到美国去。这样，美国占尽了便宜，它进口中国的便宜商品，我们现在电视机、空调都出口到美国，在美国卖的价钱有的比在中国还卖得便宜呢，美国的工资比我们高得多，他们买的是中国出的便宜货，挣的是高工资，完了还白用你的储蓄，拿去搞他的高新技术、信息产业，返回来再来赚你的钱。但是，你这也没办法，为什么？他就是信用好。大家把钱变成美元很多人都比较放心。你看日元或者是涨价或者是落价，很不稳定，大家不敢买日元，但是美元就比较稳定，而且美国这么多年，他的所有权得到严格的保护，你在那儿投资可以很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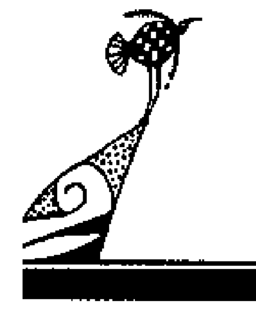
今天上午张维迎讲，我们一搞土改把什么都没收了，如果你买了一块地，碰到土改你就倒霉，那么在美国就没有这样的事，从来没有没收过谁的财产。很多国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侵犯老百姓的所有权，公私合营也好，在“文革”的时候抄家，解放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用低价格强制收购老百姓的贵金属——黄金。当然，不是说你不可以戴耳环、戴手镯，但是你要卖的话，你只能卖给政府，不可以卖给别人，而政府用很低的价格收购，实际上是侵犯你的所有权。有的国家像越南和朝鲜还用剥夺你的存款的办法，就是政府改革货币，现在的钞票换成一种新钞票，比如说超过 5 万块钱的存款统统不给了，只给你 5 万块钱，那就等于把你 5 万块钱以上的钱都没收了，你换不了新钞票。像这种都是大规模的侵犯所有权，这个社会的信用肯定好不了，而且这种事情它的影响不是三年、五年，是三十年、五十年，影响非常大。而美国有上百年，二三百年的稳定的保护，所有权非常可靠。

当然中国的信用不是最坏的，现在人民币在境外也很受欢迎，在日本、东南亚、缅甸、越南、蒙古甚至俄罗斯，人民币差不多是硬

货，你拿人民币支付人家很接受，就是说明我们人民币信誉是很被接受的。

可是我们国内市场上信用不好，所以，今天上午好几位同志发言都讲到，由于信用不好，我们整个经济损失数量巨大，有人说是6000亿，有人说是9000亿，如果我们能够在信誉方面有所改进的话，大家都能够更富一些，财富就更多一些。

今天上午有经济学家强调人因为自私自利，因此就不讲道德。我们就要问到底，这个社会要求我们讲道德，还要不要自利呢？还是要自利就不能讲道德呢？这里发生一个困惑。市场经济应该说就是追求利益的经济，我们知道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条款，他要求你做生意必须赚钱，你做生意赔钱是犯规的，你如果赔本卖东西，价格比成本还低，那你犯规了，就是倾销。人家就要起诉你倾销，因此世贸组织要求所有参与世界贸易的人都必须赚钱，你赔钱卖东西就不行。整个市场经济就建立在每个人都赚钱、都奔着利益，奔着钱来活动的。那么这样说起来，是不是只好不讲道德，大家知道道德的特点就是牺牲自己。



那么到底你要赚钱还是你要道德？变成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你要讲赚钱，那我就只好丢失道德，你要讲道德我就只好不赚钱。这个问题我有个答案，刚才李兰同志介绍我这本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我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自利并不是只有我自利，而是你、他，等等。所有的人都可以自利，任何人都没有特权，不让别人自利。如果我有特权，可能利用我的特权，只讲我的自利，侵犯你的自利。而市场经济是不允许特权的，是平等的。我们看世贸组织就知道，世贸组织讲国民待遇，外国人和中国人都要平等呢，你中国人和中国人怎么不能平等？所以我说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我觉得就两条：一个是平等；一个是自由。

平等的意思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同样得到保护，没有特权。因此，任何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同样也要尊重别人的利益，这就是答案。追求利益错不错？一点也不错，但是你不能在追求利益中间去侵犯别人的利益，如果你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与别人合作，

让他也得到利益，这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市场经济的目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坏事，市场经济中间的假冒伪劣也好，违约、拖欠等等，不是追求利益造成的，而是侵犯别人的利益造成的。这里头的差别是很小的，追求利益并不错，错在侵犯别人利益，就差这么一点。把自己利益放大了，变成把自己看成一个特权，或者是有意去侵犯别人的利益。

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平等，既然是平等就是没有特权，没有特权大家只能够合作，通过合作来得到利益，这样的结果就是合作赚钱，大家有没有违反道德？根本没有违反道德，而且很符合道德。你赚钱，你还帮助人家赚钱。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有很多理论给我们误导，比如说有一个理论叫做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是说双方交换的东西价值是相等的，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我赚钱你也赚钱。我跟你做生意怎么样？我赚钱你也赚钱。怎么可能双方都赚钱呢？一定有新的财富创造，否则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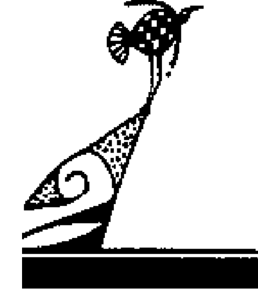


交换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它的原因就是双方都赚钱，而钱就是财富，因为你赚了钱，你买什么都可以，买香蕉、买冰淇淋、买房子，那个钱实实在在是钱，并不只是一张纸，它是一种购买力。所以，市场经济奥妙说到底，就是因为双方都赚钱，社会的财富就这么增加了。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要问，为什么交换能创造财富，而不是劳动创造财富？当然，劳动也创造财富，但是如果交换不算劳动的话，那么怎么去创造财富？也可以说，交换也有劳动，但是这种劳动创造财富和直接的生产劳动是不一样的。

交换之所以生产出财富来，那是因为我们通过交换改善了资源配置。比如说，中国生产粮食的成本很高，因此，我们减少粮食生产，我们进口，而外国生产粮食的成本很低，因此这么一交换，就避免在成本高的地方生产粮食，而利用了成本低的有优势的国家他们的生产，所以这样财富就创造出来了。跟没有交换作比较，你要用更高的成本来生产粮食，现在你用更低的成本买来粮食，而且尤其妙在哪儿呢？买粮食的这个钱怎么来的？是我出口得来的，我出口什么东西呢？出口我有优势的东西，我生产玩具，我生产玩

具发挥了我的优势，我换来美元，拿美金去买粮食，我又发挥了他的优势，双方都发挥了优势，财富就创造出来了。所以，市场经济既赚钱又不违反道德。当然，这个条件就是大家都要讲信用，都要讲彼此尊重、要讲合作，没有什么原则不可讨论的。过去我们是僵化的思想，只有我的才对，你们都错了，那是一种特权的思想，是缺乏平等的思想。现在有些国家还继续僵化着呢，当然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有特权。

平等的思想不是这样的，平等的思想是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原则，我得尊重你的原则，你也得尊重我的原则，彼此商量着办，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友好的、彼此尊重的，而且又赚钱的经济，这有多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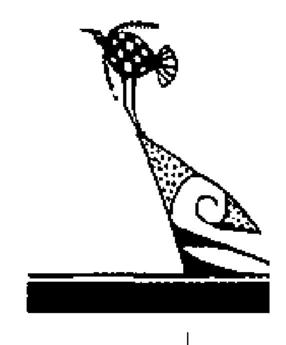


由于有了信用就降低了交易费用，今天上午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有很多交易中的成本，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是彼此抵消力量的成本。凡是破坏诚信所发生的交易费用，比如说打官司，就属于这一类。有时候这个成本非常大。我看见一个统计，64%的企业有1—4桩官司在那儿打，这个成本就太高了。这些官司没有任何收益的，只有支出。那么我们再想想这些官司是怎么造成的？我看到不少官司，发现官司的双方都很有理的，并不是说很明显的一件事一方错了，一方对的，这样的官司不是没有，也有，但是有相当多的官司就是双方理由都充足得很，只是各方强调的不同，甚至于事实也是双方都认可的，同样是一个事实，但是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就产生官司了。

那么这种官司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彼此尊重，彼此有一个信用，这回我吃点亏，下回你吃点亏，如果建立这样一种彼此合作尊重的关系，有一种长远的安排，这种官司是不会发生的。就因为只看见眼前，下一回交易和不和你做还不一定呢，这样就发生了很多纠纷。我们如果只看到短期的利益，就把长远的利益丢掉了。信用就是一个长期的预期，买东西是短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很多合作它是长期的，这个长期的合作如果没有信用的话，就没法合作，最后就是合作不成，大家有很好的机会都实现

不了。由于信用不好，交易费用上升，这是看得见的，还有信誉不好，交易机会丢失了。我有一些企业家的朋友就跟我讲，他只敢跟认识的人作生意，不认识的人来买东西，我都不敢卖给他，发了货给他就拿不到钱，或者给你拖欠，一年、两年地拖欠下去，因此他就把这个机会丢掉了。所以，我们信用不好，使得大家做生意都战战兢兢的。这样需求肯定要降下来，购买就减少了，生意的机会就减少了，所以我们现在总需求不足，也跟这个问题没解决好有关。所以说，信用问题直接关系着我们的总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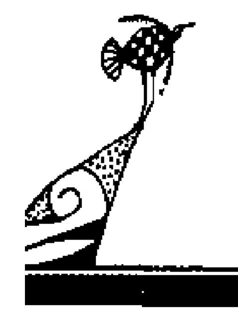
我刚才强调的就是储蓄怎么变成投资。我们比较了美国和中国，我们看看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储蓄变投资不需要信用，计划部门一句话，储蓄就变投资了，国家计委把人民银行存的钱，拿到计委去做项目，没什么信用不信用。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钱是老百姓的钱，不是人民银行的钱，老百姓的钱今天我有权放银行，明天我又把它拿出来了，我可以买股票，买房子，各式各样的活动，这个时候信用的重要性就突出出来。我们都希望更多的积累财富，首先需要更多的积累信用。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积累信用还是积累财富?》我们想要积累财富，首先得积累信用。我们依靠破坏信用的办法，是积累不了财富的，财富就越来越少。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的政府也好，舆论界也好，还有学术界，都非常强调信用，我觉得这是非常对头的。

我们说美国的信用比我们好，那么，是不是美国人都是好人呢? 中国人都是坏人呢? 不是这样子，人都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在于制度。今天上午很多同志都讲了，在美国你要破坏自己的信用，马上就记下来了，记下来之后，你这一辈子都带着它，你买房子得不到贷款，你找工作，可能也要受影响。据说在德国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坐地铁没买票，给逮住了，结果他得到学位以后，申请工作，到处都被拒绝，后来人家告诉他，你信用记录里头有毛病，坐地铁没买票。德国柏林的地铁是没有人检票的，那儿有一个自动售票的售票机，你把钱放进去，票就出来了，这个票按照距离远

近是价格不一样的，你拿了这个票就上车，没有人看你的票，也没有机器查你的票，而且在火车上也没有人查你的票，我在柏林前后加在一起待了一个多月，我就从来没有看到查票的，你看人家做到这个水平。我们北京地铁如果不查票，不知道有多少人不买票。德国人为什么会那么守纪律呢？就是因为他信用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当然，整个的来讲，那儿是守纪律的人多，要是有10%、20%的人不买票，那个制度也维持不了，现在不买票的人很少，有2%、3%，所以能维持下去，他一个月查一回票，发现个把人，这就是他的情况。柏林地铁省了好多钱，省了检票员，省了检票的机器，他的成本就降低了，你想一个社会的信用良好，他整个成本都能降低。德国人买盗版软件是最少的，比美国人还好，美国人还有一些人用盗版软件，德国人基本上没有，我的一些德国朋友，非常老实，你也看不到盗版软件。所以，一个国家的实力你投入了这么多劳动，投入了这么多物资，你得到了多少财富，和你信用水平有关系，那么我们现在正是面临着这样一个巨大的任务，怎么提高我们的信用。



谈到这一点，其实今天上午许多发言人都讲到了。我们想想：为什么信用不好？因为有空子可钻。有些不讲信用的人，人家不知道他不讲信用，以为他是个好人，完了他就钻了空子。所以要使得信用可以看得见，信用水平就能提高。看不见的东西，让它看得见，是全社会信用改变的重要方法，不但要有记录，而且这个记录要很特别。

有一次我到美国去的时候，看见报纸上有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是一个律师登的，广告说我可以帮助你修改不实的信用记录。这说明每个人都有一个信用记录，这个信用记录不是保密的，不是黑材料，你自己也可以去看，看了之后，你发现这一条不符合事实，那就可以要求律师通过一定的手续把这条去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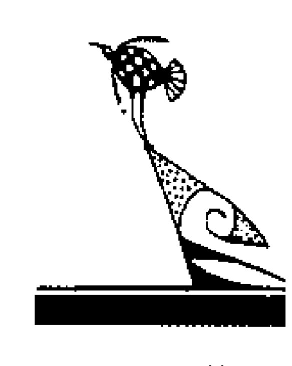
举一个例子，我有个美国教授朋友，他跟我讲这么一件事：他看见一个广告，说有一本杂志怎么怎么好，可以免费看两期，看了之后，你也可以不订，你也可以订，随你的便。这个教授看了两期

免费杂志，看完两期以后，他觉得这个杂志不好，就没有订。后来这个杂志就告这个教授说他看杂志不付钱，这个显然是不对的。那个教授就找了一个律师，把这个记录消除了。事情都是透明的，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一个人干了些什么都能讲得清楚，他有一系列的制度保证。

除了上午许多同志谈到的要有个人的信用记录，而且我觉得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一时做不到像美国那样，每个成年人都有信用记录。现在我们的力量还比较薄弱的时候，可以先把重要人物的信用记录建立起来，会计师、承包商的、厂长、经理这些人，一旦发现做假账的会计，停止他的会计身份若干年，五年、八年不许他当会计，过了八年之后，你再当会计。所以，要有一些对于个人的信用记录。

还有一个办法，我几次提倡，我希望我们能够真正做起来，就是在一些同一个行业里有的叫同业行会，各式各样的，或者联合会，或者联合体，在这个组织里可以自己评定一个信用机构，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你不做假账，你按时纳税，没有严重的违规行为，像这样的企业，可以成为一个比如说叫信得过企业吧，这些企业是信得过企业，他的信用记录很好，万一发现他违规了，把他清除出去，别的好的企业也可以申请加入。比如说三年之内，没有假账、没有欠税，这个很容易看得到，不是太难的事。变成一个可以流动的，有进来的，有出去。一个信得过的企业，在银行贷款、工商年检、税务检查、审计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优待，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做得起来的，他的核心意义就是你可以看得见一个企业的信用水平，从看不见的东西变成看得见，而且他又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你讲了信誉就能得到好处，也就是好人得好报，你的利益能得到保护。这样就会鼓励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做一个守信用的企业。像现在我们既没有记录，又没有规则帮助好的企业，于是这些混乱情况就继续下去，所以混乱情况要停止就需要有一种记录和刺激，惩罚也好、奖励也好。

一个社会环境跟企业的信用是有关系的。今天上午有几句



话，没好意思讲，因为许善达局长在这儿，我对税务总局是有看法的。现在的税务局硬叫企业做假账，以便多收你的税。像这样子一种税务制度，怎么能叫企业守信用呢？我说的是什么呢？拿北京来讲，如果你给企业的职工发了比如说3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税务局不承认你发3000块钱，他让你做假账，说是你只发了1000块钱，你的成本就不是3000块钱，是1000块钱，那个2000块钱就是利润了，他就可以征收你的企业所得税。像这种关系我觉得是很糟糕的关系，税务局不光是这件事，有好几件事。他只叫纳税人讲诚实、讲信用，他自己不讲诚实，不讲信用。所以我们讲社会的环境影响到企业的诚信问题。当然，不仅是说税务机关，所有的机关都跟我们企业的环境有关系。



那天我看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德国总理施罗德对媒体发表意见，要求更正媒体报道说他的头发是染的，他说我没染头发，我是真颜色的头发，他说我要用我的本来面目对待老百姓。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的政治家对自己的公信力非常的重视，你染不染头发，他都认为是一个很大的事，他要用老实、诚实的面目对待百姓。我们这个习惯好象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有很多宣传就是歪曲的，经不起全面的检查，你全面一看，这种报道纯粹是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这种宣传、这种做法就使得一些单位、一些个人失掉了公信力。一个政治家失掉公信力那是最可怕的，尼克松怎么下的台？是说假话。克林顿差一点下台，也是说假话，但是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假话，还不是偷税漏税，就是作伪证他就有下台的可能，所以人家对于说真话是提得非常的高。有这样一个政府，那么企业自然而然对自己的行为会加以约束。

在这些国家里边，他们对丑闻的揭露是毫不留情的。为什么是叫丑闻呢？因为它对这个社会的信用有破坏作用的，所以叫丑闻。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丑闻就是在加拿大开奥运会的时候，加拿大一个本地选手叫做约翰逊的，他得了百米冠军，后来一查，发现他吃了兴奋剂，他的冠军奖牌给收回了，这就变成一个丑闻了。这个丑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到底我们看到的百米也好、

各种运动也好，是真的力量和技术还是吃了药？是不是大家都受了欺骗了？大家都受欺骗就是丑闻，所以这种丑闻一旦发生，毫不留情地揭露，不允许这种事情地发生。

一个社会的健康是靠这样一种方法来维持的，要通过揭露丑闻来减少丑闻。而且，对于丑闻的责任人要严加处理。我这里说严加处理也要适量，要合情合理地给予处分，我不赞成罚他个倾家荡产，所有的惩罚都要合情合理，他有多大的错就给他多大的处罚，我们每个人一辈子都可能犯错，你犯了一个错误就罚得倾家荡产，我看这也是不公平的，要恰当地处分，分情节的轻重，对丑闻的责任人要加以制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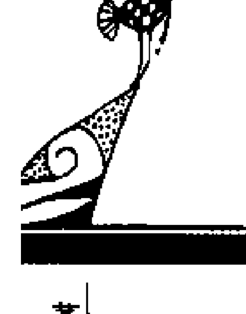
最近关于讲信用的问题，出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我觉得是写得特别好，作者是一个美国的学者，他是日本人，但是出生在美国，所以他完全是美国人，他面孔是日本人的面孔，这个人名字叫福山，他写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信任：社会福利和创造经济繁荣》，他的意思在这本书的标题里面就完全表达出来了，信用这个东西，一方面是一个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又创造了经济繁荣。这本书就是他研究不同的社会信用好坏怎么影响到社会福利和经济繁荣，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研究的方法是搜集了很多历史的事实，然后作比较，作分析，看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他们在信用方面有多大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怎么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他的研究发现，欧洲像德国、英国，他们的信用水平比较高，这种习惯文化一直带到美洲，所以美国的信用也是比较高的。欧洲像意大利这些地方的信用就比较差。比较这两种不同的信用，就可以看到，意大利以小企业为主，而德国是以大企业为主，美国也是以大企业为主。就是说，一个大企业不是生出来就是大企业，他是从小变大。信用好的一个文化，小企业变成大企业，能够生存下来的概率比较高，机会比较多，大家做企业的，可能也都能知道。小企业变大企业怎么变？有不同的合伙人进来，不断地有投资者进来，同时你要处理各式各样的人事关系。而一般来讲，这种生存

概率是越来越低的，1 万个小企业能生成 1 个大企业或者 2 个大企业，所以这是一个概率，这种概率的高低看你社会信用的好坏，德国的大企业为什么多？就是因为这个。他说社会信用最差的就是美国的黑人社会，他连自己的家庭都很难稳定，所以美国很多黑人家庭就是单身母亲，没结婚就生了孩子，有时候跟这个人同居又跟那个人同居。他还发现在美国的黑人住宅区里，黑人开的店人家都不愿意买他的，白人在黑人住宅区开的店生意挺好，为什么黑人不买黑人商店里的东西呢？他彼此没有信任感。

他也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美国黑人的信用不好？并不是这些人天生就坏，而是因为美国的一百多年的奴隶社会，奴隶制破坏了黑人在社交方面的机会，使得他们不懂得建立自己信用的重要性，一直到现在还继续这么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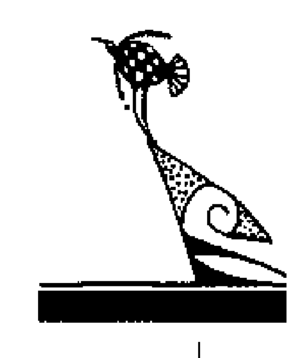
他也分析了儒家文化，就是中国、东南亚这些地方的信用情况，他对我们这个信用情况也是有批评、有表扬，但是总的说起来批评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华人经济家庭式管理较多，中国现在国内还没什么太大的企业。那么香港或者是新加坡、台湾这些地方大企业也是比较少的。台湾的大企业很少，都是中小企业多，这个当然不仅仅是个信用问题，因为台湾的政府提倡小企业，这是孙中山的理论，叫做节制资本，资本不要搞得太大，所以要发展中小企业。

华人社会中间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企业的家族管理。拿南朝鲜来讲，他也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南朝鲜的大企业很多，可是现在发现，南朝鲜的大企业大多数存在很严重的信用问题，他是政府行为造成的，政府硬把这些企业凑起来，其实内部不是很融洽、很协调的。

提高信用的困难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生活在一个有信用的环境里，这是毫无疑问的，你总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骗你的、钻你的空子的一个社会，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一个有信用的地方。但是，那为什么大家还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信用的地方？原因就是我希望你们讲信用，你们希望我先讲信用，或者说每

个人都希望人家讲信用，人家先做。于是，大家就等待，等待的结果谁也不动，我们的信用水平就不能提高。因为这个道理是这样，就是你生活在信用好的环境里头，你是得到利益的，但是你要自己做出信用好的行为来，你是要付出成本的，当你还没有生活在一个信用好的社会里头，你还没有得到利益，你首先要付出成本，这就有点难了。现在别人不讲信用，我讲信用，那么我不就吃亏了嘛。我也这么想，你也这么想，他也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那好，信用就建立不起来，那么像这样就成为一个僵局了。

要突破这个僵局怎么突破呢？只有一条办法，从自己做起，整个社会的信用是由每个人的信用加起来组成的，有一个人的信用改善一点，整个社会的信用就提高一点，不管多小，肯定是提高了一点，个人做了一件失信的事、违约的事，整个社会信用就会降低一点。所以，整个社会的信用不是跟自己无关的，而恰好就是每个人自己所决定的。改善整个社会信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自己做起，可以立竿见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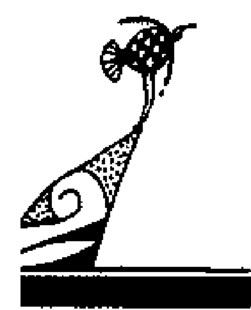


刚才我介绍福山这本书，他讲信用是社会福利和创造经济繁荣，他特别又讲了社会福利和信用的关系，这个社会福利是更广义的一个福利，就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我们希望财富增加这个没什么错误，但是光是财富增加也不见得生活得舒服。你要生活得舒服，社会整个福利多一点的话，光有财富还不够，你还需要有友情、有关心、有融洽、有一个人和人很少摩擦的一种人际关系。从这一点讲，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人这方面确实很差劲。

我前个礼拜从无锡坐火车回来，到了南京车站停车的时候，有一个人背了个行李要上车，但是他没有买票，这个列车员就不让他上，他说我上车补票行不行？不行，就把他关在门外头，车马上要开了，那个人苦苦哀求，他就是不开门，我在旁边很看不惯，我说你放他上来吧，他补张票不就完了嘛，你铁路还增加收入多好。列车员说，不行，这些人不守规矩，我就得制止他。最后火车起动了，那个人也没上车，于是就在底下骂人，完了这个列车员说，有本事你打美国佬去。我又觉得更叫我伤心，为什么要去打美国佬呀？美

国佬和我们有什么仇？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社会福利的环境里头，这种现象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很自然的。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帮助人呢？你想要是让他上了火车，又不损害你，你还增加点收入，干吗不让他上呢？实在不可理解。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地方看，讲人和人的关系，这就是社会福利，它和我们每个人都是直接有关系的，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融洽的、友好的、没有太多矛盾冲突的环境中。不光是有钱，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的得到，要靠我们每个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养。

我今天就讲这些吧。



答问

问（主持人）：接下来我们留点时间和茅教授一块交流一下，我先代表咱们在座的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好象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经济学家也可以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比如说我们现在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或者企业家阶层或者是怎么样一个阶层，我想对这种说法，经济学家他是不是应该作为某一个利益的代表人？如果茅教授认为是，你认为你代表哪个阶层？

答：我觉得每个人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当然每个人代表的大小不一样，人大代表当然代表人多，一个家长可能就代表他家庭，每个人的影响范围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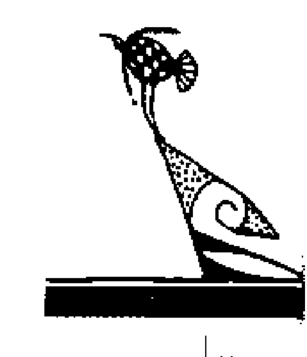
问（主持人）：我打断一下，这个来源于吴敬琏和以肖灼基、厉以宁、董辅礽四位经济学家他们对于发展股市和规范股市的不同看法，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的这么一个利益代表。

答：我觉得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利益都需要保护。当然，有产者的利益不太容易受到伤害，而无产者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很容易被侵犯的。所以我觉得从原则上讲，所有人的利益都要保护。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前

两天，我看到一篇报纸上讲，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出现，我对这个看法是不同意的。什么叫做中产阶级出现了呢？是指穷人的利益得到严格的保护，穷人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这个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以穷人为主体，还是个金字塔，并不是说有一些人有了钱了，就有了中产阶级了，这是两码事。

现在我觉得特别需要保护的是弱势群体——农民，他们的利益需要保护，当没有人们能侵犯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的财富开始积累，最后变成中产阶级，这是我们所希望出现的一个前景。

至于说肖灼基、厉以宁他们和吴敬琏的争论，我这个人对股市不太关心，我只是一星半点的听到一些，我觉得两方面都有道理，但是突出的重点不一样，厉以宁和肖灼基强调的是股市要继续发展，而吴敬琏强调的是，你要想发展，首先得把你这里的毛病去掉。那边说，你一去了毛病，这个发展就要受损失。发展对不对？肯定是对的；要不要把毛病改掉？当然也得要。但是怎么能够把这个毛病改掉，这个我就缺乏研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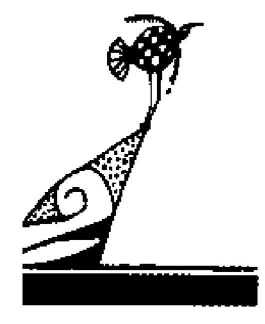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双轨制并轨。国有股减持实际上是一个双轨制并轨的问题，我们看看其他的双轨制怎么并的轨。其他的双轨制并轨的办法就是，计划轨不动，市场轨越来越大，最后计划轨就不显得重要。也许，从长远的来讲，股票市场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并轨。就是不流通的股现在占的比例很大，但是我有更多的好企业上市之后，那部分越来越小了，当然在一个企业内部可能它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在股市中间，它的比例越来越低，绝大部分是流通的。我们中国的股市还要大发展。我这个问题只能说这些吧。

问（主持人）：刚才茅老师都是说到弱势群体，在三月份，我们调查系统组织召开的一次国企研讨会上，两个专家把我们的企业家都列为弱势群体，一个是魏杰，一个是清华的刘冀生教授，他们说为什么企业家是弱势群体呢？就是我们的企业家有一部分不是进医院就是进法院，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各个方面不是很公正，所以我想对于企业家目前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的趋向，他们除了在

经济领域方面之外，在其他方面怎么参与社会，这个方面想听听茅老师的意见。

答：企业家看跟谁比，我们和政治局委员比，当然是弱势群体，跟工人、农民比，我觉得还不是弱势群体。我刚才讲了，不管是哪一个人的利益都要得到保障，农民的利益要保障，工人的利益要保障，企业家利益也要保障。那么现在我们企业家利益能不能得到保障呢？这里头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权力结构里头，很少有企业家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江泽民主席提出要让企业家入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没有这样一个突破，企业家的利益不会得到代言人，你在决策机关里头没有人帮你说话，所以企业家能够入党，不但入党，而且能够进入到权力结构、高层的权力结构里头去，这个过程可能是要长一点，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个社会我们不能漠视任何一部分人的利益，办法就是任何一部分人都有他的利益代言人，我们不回避利益代言人。但是，要尊重别人的利益，这个是一个很融洽的社会，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保障，都得到表达，而且互相都能够容纳大家不同的利益。



问（主持人）：看看其他各位同志有些什么问题没有？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企业家目前的一种精神状况。我们提倡企业家要有冒险精神、创新精神，目前企业家爱业、敬业我觉得做得还不错，但是我们在一次调查当中，有一部分的企业家说他如果再重新选择，他可能不一定选择来做企业家，所以就是说企业家的创造性和工作热情也就涉及到我们企业家更高追求，在这些方面，我想听听茅老师对我们企业家有些什么样的启发？

答：我有个理论就是人的追求就是快乐，而且我的理论和其他的主张快乐的理论稍微不同的一点在什么地方？我主张全社会的快乐的增加，我希望不要影响我的快乐而使得别人也快乐，我希望那个列车员把门开开，让他上来，这个列车员自己也快乐，人家也上车了，也快乐。而不要做那个人家也不快乐，自己也不快乐这种

愚蠢的事。我们都认为企业家是一群追求利益的人，我觉得这样的看法就片面，企业家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他应该有一个均衡的生活，有一个理想，有一个快乐的追求，而且企业家的追求快乐和一般人追求快乐还不一样，他有更大的能力来帮助其他人得到快乐。普通人没有多少这个能力，他只能使他的朋友、他的孩子得到快乐，但是企业家在社会里头，有这个能力使更多的人得到快乐，而自己也得到快乐，像用这种追求的方式来做你的企业，我想你一定越做越高兴，因为你对人类是有贡献的。

问（主持人）：另外，我们茅老师写了很多的书，比如说《谁妨碍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还有包括我们今年二月份刚出版的《经济学家的随笔》，要选择读您一本书的话，你认为哪本书对于企业家最有帮助？

答：这要看我们企业家本身的状况。也许《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对企业家的帮助比较大。这本书里头讲的就是市场经济我们要追求利益，同时也要得到幸福，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各种是非问题，有许多传统的看法需要加以批评、放弃，我们要建立一些新的观念，这些观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影响到我们对人生的追求和自己的感受。有的同志希望多了解一些经济学，他就可以看看《生活中的经济学》，我是对比了美国和中国的两个不同的市场，讨论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对政策有兴趣，那就可以看这个《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这几本书的不同就在于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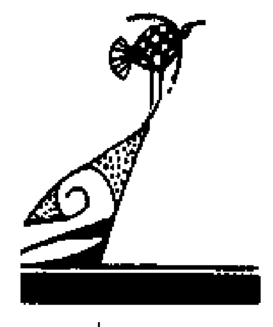
问（主持人）：最近，北京有一条关于茅老师比较大的一条新闻，就是著名经济学家投资办一个家政服务员学校，我想在座的有不少北京的企业家也很关注这条新闻，我们也想问一下茅老师，您是从什么样的一种角度来办这样的事业？

答：从经济学来看，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农民太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富国有这么多的农民。农民多，肯定是富不起来的，所以如果把农民转成一个城里人，我们国家才有可能变富。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这个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减少农民，让他

变城里人。但是怎么让农民进城呢？就办这个学校，现在叫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我们以后还要办各式各样的职业学校，让农民能够顺顺当当的进城来，我们学校负责给他介绍工作，学费等他工作以后拿第一个月的工资来还，学校真正的目的就是给农民一个跳板，能够进到城里来，而且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再回去了，把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通通都接到城里来住，把农民变成城里人，这样才能使我们国家有可能真正富起来。另外我们也希望增加一点快乐，让农民能够多挣一点钱。

问（主持人）：看看我们下面同志有什么问题？

我总结了一下茅老师之所以受到我们在座的欢迎，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茅老师今年是七十多岁，作为这个岁数的人，我对我国的过去、现在都非常地了解，也就是对中国发展的历史相当了解的；另一方面，茅老师七十多岁但是他的外语非常好，经常出国，和国外的交流非常频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说能够找到我们中国和国际的比较差距，这也是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另外，茅老师从事的是自然科学，至于他今天提到的好几个内容都是怎么样思考社会与经济、自然与人类的同步协调、和谐发展，我想这个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原因之一。还有一点，茅老师他原来是在社科院，现在是自己创办了一个民间研究所，他这个天则研究所应该说是目前在中国有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的这么一个民间研究所，所以他的一些观点应该说有很多是独立的，可能会不受某些部门欢迎的这么一些观点。他保持经济独立，从而他的研究思想独立，我想这也是他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想再提一个问题，就是民间研究所在国外很多，就是你可以听这家的经济预测，你可以听那家，你认为哪家说得正确你就可以听哪家，而在国内可能我们的很多研究是垄断的，那么我想听听茅老师对于民间研究所在中国的发展和对我们企业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社会应该认为是由市场和政府构成，其实，现在多出了第三方面，就是非政府组织。市场有许多事情解决不了，要靠政府，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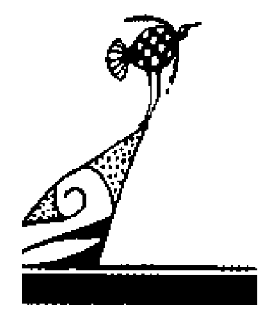
是有许多事情不一定要政府来做，因为政府的特点是有暴力作后盾，政府有暴力，有国防、有警察、有法院、有监狱，这是政府的特点。犯了罪政府要把他抓起来；你拒绝食品卫生检查，政府就要用暴力对付你；你不能危害老百姓的健康；你破坏环境，政府要强制你改正，这些必须有暴力做后盾。但是，社会上有很多需要大家做的事，用不着暴力，比如说李兰同志讲的研究所。研究所干吗要暴力？还有慈善机构，那更用不着暴力了，还有博物馆、图书馆、交响乐团都用不着政府来做。这些机构用暴力来做反而做坏了，因此要有非政府机构。所以，现在这个社会更合理的一个搭配是市场、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发挥了市场和政府所不能的作用。所以，我估计今后我们这个社会像美国社会，非政府组织会越来越多，很多资源都由非政府机构来使用，我相信我们国家也逐渐会变成这样一个比较更合理的搭配，有更多的人关心研究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这些东西不是市场能做到的，但是非常必要的，又不需要暴力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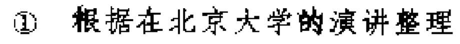
主持人：好，茅老师一个半小时说话是非常平静，茅老师写书文风也是非常平实，但是只要认真听他的讲话，仔细看他的书，我们都会感觉到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也就是茅老师刚才所说的一种公利心，对茅老师刚才所创立的这种家政学校，应该说也是出于他这种公利心和从自己做起的一些表现。所以，我想像这样的一些内容，对我们企业家来思考我们做企业的价值和我们人生的意义，可能都是非常有启发的。对于茅老师的这本书，我们学习俱乐部曾经给每个人都提供过。今天我们又有一本茅老师的《寻求社会致富之道》，如果买到茅老师书的人，我们也欢迎茅老师给我们企业家签一个字，使我们在将来碰到困难或者是思考很多方面的问题的时候，能从茅老师的书里面能够找到一些精神力量。好，我们的第一个讲座就先到这儿，下面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向茅老师表示感谢。

第4讲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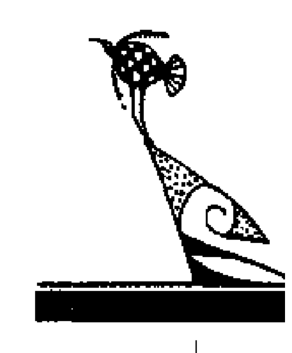


“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看来大家挺关心道德。”茅先生在这样的开场白中开始了讲演。很多人对现今的道德问题有多种看法，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对道德的研究也是千姿百态。首先茅先生指出了三种道德划分：儒家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市场经济道德。接着茅先生又指出了加拿大一位教授用计算机模拟研究社会道德。社会中有好人和坏人，利用囚犯难题模型，在重复博弈最后达到的均衡状况，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道德的人被发现并受到处分的机会很低，那么不道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必将消亡，因为这种社会下，人们互相欺骗暗算，没有仁爱；反过来，如果有一种社会，坏人得逞不了，惩罚函数合理，发现坏人的机会多，这种混合型的社会就能长期存在。所有这些都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道德作出解释的。道德的功利解释就是认为道德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对所有的人有利。从表面上看，道德与利益是相对的，可是两者在全局上是一致的，正如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都讲道德的社会里一样，我们不希望一个对一切人都不利的社会，这是因为对一切人都不利的道德是存在不下去的。



① 根据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

道德的形成是需要长时间的，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从动物变成人最困难的便是道德的形成，因为道德秩序的破坏容易而再生很慢。这是人类形成缓慢的原因之一。道德有这样两种状态：稳定的均衡和不稳定的均衡。稳定均衡是指所有人都不讲道德，社会再坏也不会坏到哪里了，社会处于最低状态。在不稳定均衡中，大家都讲道德，没有人钻营取巧，社会达到最优状态。现实的社会是混合的，既有好人，也有坏人。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是破坏稳定的因素，如果大家都跟他们学，社会的道德就被破坏，不稳定均衡就会很快变为稳定均衡。如果讲道德的人形成优势，社会能够维持不稳定均衡，这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状态。但是不稳定均衡很容易变到稳定均衡，而相反的转变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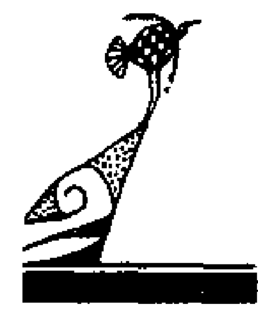
接着茅先生讲了几个道德的例子。日本神户地震时，人们秩序井然，没有人抢东西；洛杉矶地震人们相互争抢，他指出了道德是如何互相影响，并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害。第二个例子是抗战时，日本三千骑兵赶得几十万中国人争相逃跑，逃难中还互相算计偷抢东西，加深了自己的苦难。说明人们的道德水平低，最后吃亏的是人们自己。可是一旦一个人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道德的产生是一个漫长过程，现在还没结束，道德还可能垮下去。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普遍对道德持怀疑态度。很多情况下，做好人的变成大傻瓜。比如在红绿灯下，有很多人只顾自己方便而闯红灯，那些少数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傻瓜。可正因为这群傻瓜，我们的道德才不至垮掉，不至于一垮到底。道德的不断衍化，取决于每个人，应该让每个人参与到这一过程，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从制度变化的规律来看，是少数人能不能把整个社会带入一个更高层次，这些人就是鲁迅所说的脊梁骨。

道德的形成需要权威，对不道德的人加以批评，需要特殊的力量，每一个社会的进步都是如此。人类社会产生之初，便有了等级

之分，等级是道德维持的需要，至少在那时的社会是如此，现在有了成文法律来约束；从等级社会到平等社会，从专制到民主，是人们追求人权、法治的结果。最初，没有人相信人和人平等的社会还能得到治理。孔夫子、柏拉图都不敢相信平等社会是能够治理的，像柏拉图在《理想图》中将人分为金、银、铜、质。孔子将人分成治人的劳心者和治于人的劳力者，或曰君子和小人。

传统道德社会里，要求每个人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把私心看成罪恶的根源，一个讲道德的人必然无私。到了人权社会，在市场经济下，允许私心，以此带动物质财富的发展，让人追求更好的生活，"私"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来源于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一个人不可能做到无私，这是一个经验的判断，进一步说，私并非坏的原因，只有因为自己的私在侵犯了别人的私的时候，私才成为坏东西。真正坏的是侵犯别人的私，把自己的私凌驾于别人之上。道德并不否认私心，社会上很多坏现象，并非追求自己的私造成，而是侵犯别人的私的缘故，特别是一些人利用特权侵犯别人的利益，如不是执行公务时用警车开道，为了自己方便侵犯别人的利益。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置身于平等之外。不但法律管不了他，连批评都不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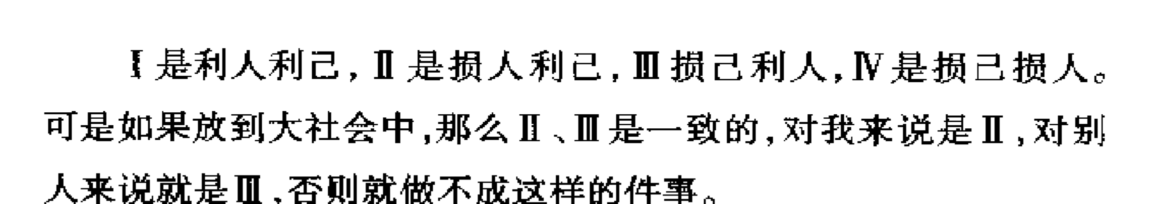


在平等社会，要达到道德上的治理，重要的一点是解决如何正确对待"私"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自己和别人是平等的，自己的私和别人的私也是平等的，我们要约束自己，正因为别人也有私，而且别人和自己是平等的。人和人应该平等，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权利，私并非坏东西，应该为私平反。侵犯别人的私才是坏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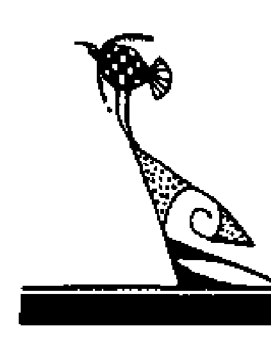
在中国这样做很难，中国百姓习惯于等级社会，不清楚平等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应该如何。比如农民解决纠纷往往诉诸两种方式，一是找人将对方打一顿，二是找大官（当然是和自己有关系的）教训别人。很少以平等关系来解决问题，告之法院。当然因为法院未必能够主持公道，上法院代价太大，而且没有把握。法律不公平是因为每人受法律保护的程度不同。在中国，人和人之间权利

差别挺大的，比如农民和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受法律保护的程度是非常不同的。有这样一则消息：一个人坐飞机从广州到杭州，他是经济舱的票，由于便急而用头等舱厕所，引起争吵，机上工作人员将他铐了起来，交给了杭州公安局。后来他告上浙江省法院，法院以侵犯人权要求南方航空公司赔偿，并登报道歉。由此联想"文革"，那时随便哪个革命群众都可以抓人。相比而言，如今人们可以想到用法律手段来保卫自己。可是他毕竟是一个坐飞机的人，不是普通农民，而且被告方是一家公司不是政府，在普通的情况下又有几人能像他一样受到法律保护呢？更别说那些不能或者不会用法律手段的人。

前面说过，要解决平等社会的道德问题必须解决私的问题，解决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关系，有这样一个表：



		别人	
		有利	有害
自	有利	Ⅰ	Ⅱ
己	有害	Ⅲ	Ⅳ



Ⅰ是利人利己，Ⅱ是损人利己，Ⅲ损己利人，Ⅳ是损己损人。可是如果放到大社会中，那么Ⅱ、Ⅲ是一致的，对我来说是Ⅱ，对别人来说就是Ⅲ，否则就做不成这样的件事。

一个道德社会是不可能通过损己利人来获得的，站在全社会的角度，每个人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人，没有必要损己利人。但是在人和人不一样时，这成为必要，比如富人对穷人的救济，强者对弱者的扶持。当我们进行制度设计时，人和人是一样的，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和人往往是不一样的，是不对称的，在人和人不一样的情况下，道德就成为必要。但这里又有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在人人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还要损己利人，回答是有的，这就牵涉到公众的问题。所谓公众就是克制自己遵守公共道德，损己利人。如前面提到的计算机模拟世界，人和人一样完全对称，要在公共秩序、环保、守法方面要克制自己。

儒家道德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仁”,“仁”者爱人。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礼”,所谓“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君臣、父子看成是社会地位不同的人,是造成几千年人和人不平等的原因。从礼又生出了礼教,也就是三从四德等皇权道德意识。鲁迅有过精辟的论述:儿子跟老子讲话,还没开口就先错了。还没有开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臣对君开口第一句是臣罪该万死,在这些关系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儿子、妻子错了,事情本身的是非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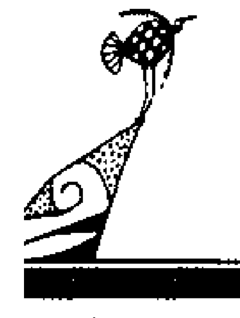
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为特征的,是重礼貌、讲彼此尊重的,要求平等、妥协的精神,这种妥协是超越信仰的原则。在人际关系中,尊重、妥协是极其要的。

孔子的“以直报怨”对我们有着很大的用场。别人对我好,我也要对别人好,这没问题,这是以德报德;要是别人对我坏,我该怎么办呢? 以德报怨,用教化来感到对方,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 这是站在人性善的角度,觉得别人这样做是由于自己做的不够好。当然这有好处,但有时这样做代价很大,等于是在怂恿做坏事,且不说未必每个人都能教化,地狱将要关门,人人都能进天堂。另一种是以怨报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是这里有个问题,首先对好坏很难判断,如对王海,何况冤冤相报何时了。看起来这两个极端都有道理,可又都不太好。这里一种更好的选择便是以直报怨,直就是符合道德,要求社会要有容忍,而不丧失原则,比如对囚犯要关起来,但还要关心、教育,让他有决心改好,有改正的机会。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比较缺乏宽容,对“坏人”一片喊杀声,更不必说对坏人的“专政”。不能设身处地想,难道我们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做错事吗? 你犯了错误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

儒家道德、市场道德是两种道德形式,在市场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制度,道德前景又如何? 茅先生做了两点预测:第一,将来社会里价格必须继续存在,价格是度量稀缺性的尺度,而人类永远处在克服资源与欲望的矛盾中,而价格能够回答什么稀缺、什么不稀缺的问题。生产是财富的生产,而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是价

格，只有产品的价格比投入品的价格高才是生产，否则只能是消费。像在计划体制下，为了西部开发，把工厂搬进山窝，从计划经济看他们也生产了，可在市场经济下就只能赔钱，他们是在消灭财富。换言之，生产不是生产物质，而是生产财富。而价格的产生是供应和需求双方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讨价还价，公平竞争而得到的，所以各自的利益要永远得到尊重。第二，从物质欲望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物质享受饱和后，人的兴趣将转移到非交换品，如健康、求知、友谊等。按照经济学原理，物质享受是一个收益递减的过程，而精神享受是收益递增的，如音乐、艺术等，会不断激发人的兴趣，给人以更高的享受。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兴趣会逐渐转移到道德享受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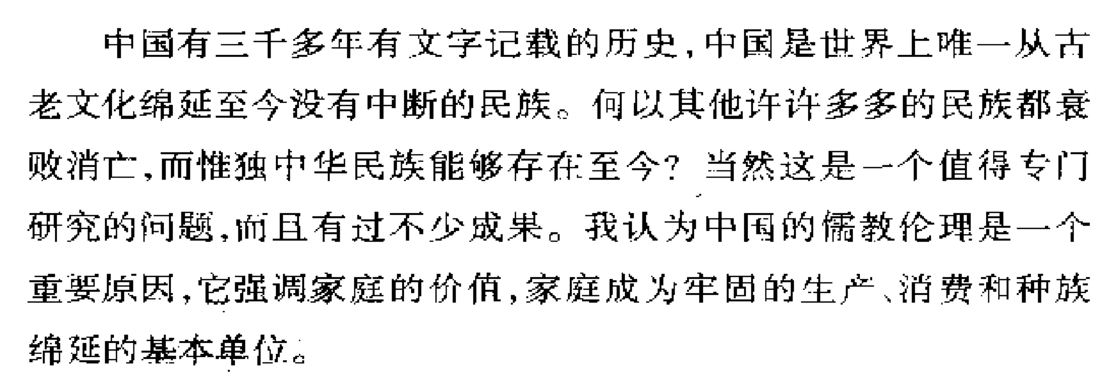




第5讲

中国传统伦理与市场经济之冲突

中国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古老文化绵延至今没有中断的民族。何以其他许许多多的民族都衰败消亡，而惟独中华民族能够存在至今？当然这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而且有过不少成果。我认为中国的儒教伦理是一个重要原因，它强调家庭的价值，家庭成为牢固的生产、消费和种族绵延的基本单位。



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家庭不论在生产上还是消费上都具有极高的效率。在生产方面，家庭成员能够同心协力，互相信任，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十分牢靠，而且交易费用极小。由于成员之间的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消除了彼此之间的猜疑。团结一致的家庭形成强有力的生产力，它可以做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提高生产效率。在消费方面，家庭能够有效地储备食物，调剂丰歉，抵御各种灾害。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大部分年头是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家庭既要支付战争的成本，他们要出壮丁，要缴粮秣；而且又是战争灾难的直接受害者，战争使他们妻离子散，飘泊流离。即使没有战争，家庭也受到官府的横征暴敛，再不就是灾荒或瘟疫。在这许多灾难面前，家庭是毫无抵抗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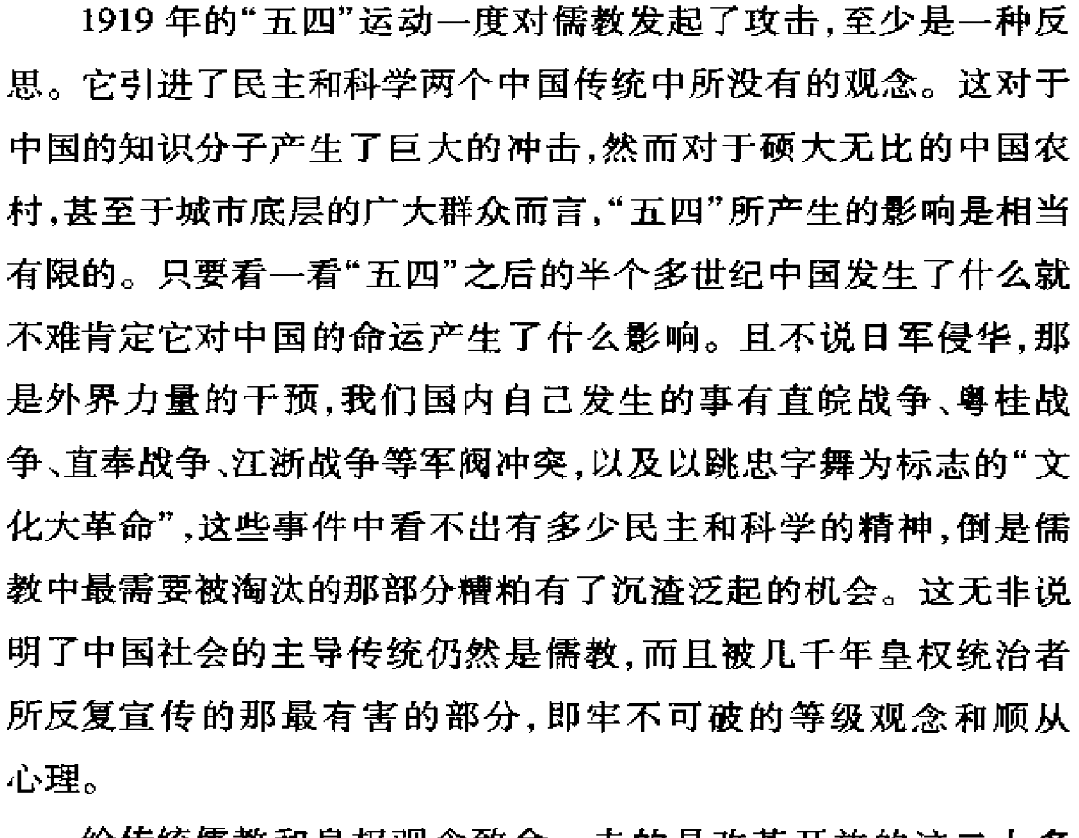
的，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但是一旦条件允许，它就像火中的凤凰，又重新建立起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依靠家庭的无限生命力得以绵延至今。

一方面儒教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至今的重要因素，但是也应该看到，儒教也是阻碍中国跳出皇权、迈向民主政治的重要障碍。中国历史上民不聊生，战乱反复，一直走不出无休止的皇朝循环，此间儒教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儒教的伦理中，社会只不过是放大了的家庭，君臣关系是依照父子关系来处理的。孔子提倡的"礼"就是一整套人际关系的准则，它的核心就是通过等级和顺从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尽管孔子反对不人道的待人之道，但是历代的统治者故意强调等级和顺从的必要性，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放大到超出原来孔子的原意。最后变成了"吃人的礼教"。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孔子的时代，保持社会稳定的办法除了等级和顺从之外确实有很少有别的可用之策。不但中国如此，西方也差不多。古代西方哲人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基于人跟人平等的社会治理之道。古代人想不出社会缺少了权威，怎么能够安定，坏人怎么对付，正义如何伸张。人跟人平等了，就等于没了章法，社会必定是混乱无序。



这并不奇怪，因为民主政治的观念是近二三百年之内才发展起来的。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人跟人平等而社会仍然有权威，对于出轨的人和事有权威机构出面处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发明。虽然在古代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没有可以行得通的民主制度，东西方的区别是西方由于教会权力的独立存在，使得政权的覆盖不可能没有空隙，于是自由和人权的思想得以发展，而且宗教经过了几次改革和调整，社会的意识形态有了灵活性。在中国，皇权的覆盖是无孔不入的，所以很难生长出平等和自由与儒教相异的观念。一直到了鸦片烟战争之后，西方思想进入中国，这才把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成了型的刻板观念打开了一道缺口。即使如此，中国人接受西方人权思想至今还有相当的阻力。这种阻力不能说和儒教思想没有关系，尤其在农村，要讲自由平等，像是外星人说的

东西,皇帝祖宗才是要尊敬的事物。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度对儒教发起了攻击,至少是一种反思。它引进了民主和科学两个中国传统中所没有的观念。这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而对于硕大无比的中国农村,甚至于城市底层的广大群众而言,“五四”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只要看一看“五四”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发生了什么就不难肯定它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且不说日军侵华,那是外界力量的干预,我们国内自己发生的事有直皖战争、粤桂战争、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等军阀冲突,以及以跳忠字舞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这些事件中看不出有多少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倒是儒教中最需要被淘汰的那部分糟粕有了沉渣泛起的机会。这无非说明了中国社会的主导传统仍然是儒教,而且被几千年皇权统治者所反复宣传的那最有害的部分,即牢不可破的等级观念和顺从心理。

给传统儒教和皇权观念致命一击的是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多年。在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都得到了显著的改进,市场上的商品堆积如山,商品的质量和品种比20年以前提高了几个档次。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而且百姓确实比过去富裕多了,银行里的存款比20年前增加了20多倍(扣除物价指数之后)。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成就恐怕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享受到彩电、计算机、飞机、录音机、录相机、的确良衬衫、彩色照片、日光灯等等新奇发明,这在50年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回顾20年前国民经济衰败到了崩溃的边缘,是什么促使了这个伟大的变革?简单地说,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可以说是横扫一切的,是无孔不入的大变化,原来儒教中牢不可破的观念现在也被动摇了。由于这个改革,中华民族有了千载难逢的重组伦理观的机会。但是这里立刻发生儒教伦理和市场经济伦理的冲突。

首先,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就是建立在一个“私”字的基础上,而传统的儒教伦理很大程度上是反对私的。孔子对于私心并不是

绝对地反对。他虽然强调义，但是对义和利并不是完全否定那一方。然而孔子以后的人出于各种动机，扭曲了孔子的思想，把是否反对私心看成是道德的分水岭。尤其是“文革”时期，为了要求普通老百姓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从而可以不受制约、为所欲为地实现某些高人一等的人自以为是的理想和私利，把反对私心提高到不容置疑的高度。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大家都不利己，把利益提供给别人去享受，至少得有一个人不这样做，所有的利益都归他享用，在逻辑上还讲得通。如果连此人也奉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利益就只好出口。可是这样逻辑混乱的伦理观，居然能够被统治者推行而不受阻碍，至今也还有许多人以为市场经济的毛病是私心造成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种种市场经济中不尽人意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坏在一个“私”字上。如果确实如此，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大家放弃“私”心，回复到物质享受匮乏的状态去；或者我们容忍私心，继续追求物质享受，同时忍受道德论丧的不幸。但依我之见，前景并非如此暗淡。不需要放弃私，也可以做到物质上丰富，精神上同样丰富的理想境界。



私，原是人的本性，人类如果无私，不要说违背人的本性，而且无私的动物根本不可能存在。寻求食物，追求异性都出于私的本能。更不要说，动物之进化为人类，也建立在动物的自我保护、自我生存的追求之上。市场经济中追求自身利益是完全顺乎自然的，而且自利是市场经济中最最主要的推动力。上面提到的飞机、彩电、计算机等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也是受利益所驱动，而不是出于追求什么崇高理想的结果。过去我们一度以为人去了私心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这个信念曾被我国从上到下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全国人民甘愿牺牲个人的权利，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可是努力几十年的结果反而距离我们的理想越来越远，吃不上，穿不上，经济面临崩溃。倒是容许私心的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可见私心是不可以放弃的。

然而从历史上来看，人类社会中一切罪恶又都是私心造成的。

所以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哲学家把道德和私心对立起来，以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无私。去掉了私心，社会便没有了冲突，人与人得以平安相处。确实，这一信念不但过去被大家接受，甚至在今天，也还是阻碍大家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孔子兼顾义和利，而且明确提出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义无疑应该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但是他没有分析什么情况下义和利会发生冲突。如果二者能够不发生冲突，一切有利的事同时也符合义，岂不是万事大吉吗？所以，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义和利发生了冲突，又在什么条件下这种造成种种罪恶的私心，能够变为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推动力。

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不仅承认自己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尤其要承认别人和自己一样，也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因此追求自身利益的界限是他人的自身利益。这种原则的基础是人与人在地位和权利上的平等。这一点正是儒教所极其缺乏的。

今天我们可以见到种种市场经济中的丑恶现象，我们往往把它归结为由于人们追求自利而引起的。其实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市场经济中的丑恶并不是因为人们追求自利，而是因为一部分人因自利而妨碍了别人追求自利，是侵犯了他人的平等权利所造成的。强盗小偷自不用说，假冒伪劣，失信违约，贪污腐化，欺行霸市，特权垄断，都是侵犯他人权利造成的。今后我国市场制度之能否顺利建成，绝不在于叫大家放弃自利，而在于能否保证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保护，人在市场上的选择自由得到尊重，特权在市场中被抑制。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能否被尊重的问题。

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所有的社会组织形态，人与人在地位和权利上从来没有平等过。古代血族社会中有巫师和族长，在奴隶制社会中有奴隶与奴隶主，以后有地主和佃农，有帝皇将相和平民百姓。不同的阶级享受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表现为人身自由的不同，最后也表现为财产所有权受保护的程度不同。时至今天这种差别仍旧存在着。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和一

个山区农民在人身自由和财产所有权上得到的保障是不同的。但是在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必须是平等的，否则交换时一方受制于另一方，交换的一方将受损，这就不是市场经济。

儒教伦理的整体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儒教伦理应该加以继承的。然而它的结构却存在缺陷甚至矛盾，这就是人与人的不平等。只要不平等继续存在，仁就难以贯彻到底。因为社会中长期存在不平等，处于底层的人群就难以安身立命，社会就潜伏着动乱的危机。孔子对此的解决办法是施仁政，孟子更加完整地加以发挥，这就是人治。但是人治是完全靠不住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几个皇帝做到了人治？中国历史上几千次的农民起义，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农民难伺候，而是统治阶级的压迫造成的。人上人享有特权，此种特权是不受监督的，所以他们必然走向腐败，走向压迫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结果革命造反在所难免，社会动乱成为必然。而且儒教教义的核心"仁"也无从得到保障。所以说，儒教伦理内部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



欧洲从公元四世纪以后有政教分离的政治结构，在权力被分享、被制衡所形成的空隙中，人本主义有了生长的机会。到16世纪，欧洲出现了宗教改革，人本主义的思想开始产生影响并逐渐得到社会的承认。单独的一个人，只要他存在于社会之中，他的基本权利即被承认并受到保护。在这个基础上逐渐产生出人权的概念。于是人类社会揭开了全新的一页，它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可实现的平等社会。它是消灭了用人的权势地位去控制人、奴役人、剥削人的社会，它认为每一个人在社会中是平等的，而且没有例外，既不存在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也不存在一个可以凌驾于别人之上、对任何人实施专政的阶级。在这样的社会中，"歧视"是最触犯众怒的词，而自由、平等是不可动摇的价值原则。然而，在中国由于儒教加皇权的牢固控制，人和人平等的思想，更不用说人权的思想，从来没有机会发展。

人权直接和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相联系。儒教造成一个低生产力的社会，就因为个人不能得到人权保障。人权的实现首先当然

是个人的生命和自由，然后就表现为个人财产的保护，这一点直接和生产力发生关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有权有势的人想要获得物质享受，最方便的办法不是自己去创造财富，而是去剥夺别人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所以人们争当有权有势的人，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迫于生活，不得不劳苦耕作。但他们的劳动果实随时随地可以被官府或有权势的人用或明或暗的手段侵蚀。那时人类社会的历史基本上是统治者压迫劳苦大众和劳苦大众群起反抗的故事。穷人革富人的命，成功之后少数穷人成了富人，他们学习被他们革命推翻了的权势阶级，再去欺侮剥削穷人，然后再被别人革命，这就是历史的基调。为了夺权，纷争不断。人们的聪明才智和时间、精力很大一部分用在了人与人争斗的非生产性活动中。一旦战乱蜂起，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化为乌有。绝大多数的年代里，人们颠沛流离，挣扎在死亡线上。有几年太平盛世，是历史上罕见的盛事。在这种不断动乱的背景下，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完全是痴心妄想。



相反，一个权利平等的社会，财产得到保障的社会，必然发展成市场经济。因为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未变，现在通过侵犯别人得利的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只有通过合作来获取利益。具有独立人格地位的人，可以自由地与他人订立契约，实现有利于双方的事情。具有独立人格的双方所订立的契约不可能损害任何一方，因为受损的一方可以拒绝这样的契约。商品交换就是这种契约中最通常的一种，所以商品交换是使双方同时得利的行为，是使双方的财富同时有所增加的一种活动，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交换创造出财富。市场经济中每一笔交换都使整个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短短三四百年的市场制度创造出了超过过去几千年人类社会所创造财富总和的十倍百倍。不幸的是在这三四百年中，市场制度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特权经常侵犯市场，商人被诬为有害于社会的人，计划经济的思想几度取代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至今还有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自利行为将导致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当今世界各国，凡是人权得到保障的国家，经济都能逐步走上繁荣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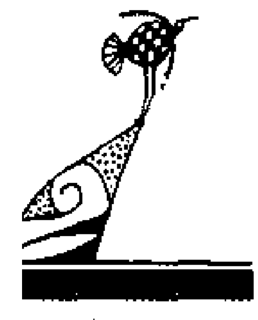
强，而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一不在人权上存在问题。我国改革20年能够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也是因为人权方面有了重大改进，人的选择更自由了，机会更平等了，但是还远远不够。我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无疑是进一步的人权保障，是人人同样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任何改革如果偏离这个方向，最后必定对经济产生负效果。

为了实现这种方向的改革，必须在儒教之外注入新的伦理因素。孔子的儒教虽然没有明确的人权观，但是并不和人权直接冲突。但是，事实上的儒教经过历代皇帝和儒生们的改造，已经和人权格格不入。所以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权的起码观念，它基本上是进口来的。人权观念并不是抽象不可捉摸的，它非常现实地决定我们周围事物的进程。按照人人有平等权利的观念，当一个人受到侵犯时，应该应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但是我国农村里的老百姓受到侵犯时，首先想到的从来不是法律，而是找一个大官为他说话。他很自然地用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且事实上这样的办法可能比诉诸法律更有效。这说明我们的整个环境还有待转移到一个新体制上来，即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制度是周围的人形成的，而周围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行为规范是由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伦理观决定的。所以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清除儒教伦理中违反人权的那一部分，牢靠地建立起人和人平等、尊重个人自由的全新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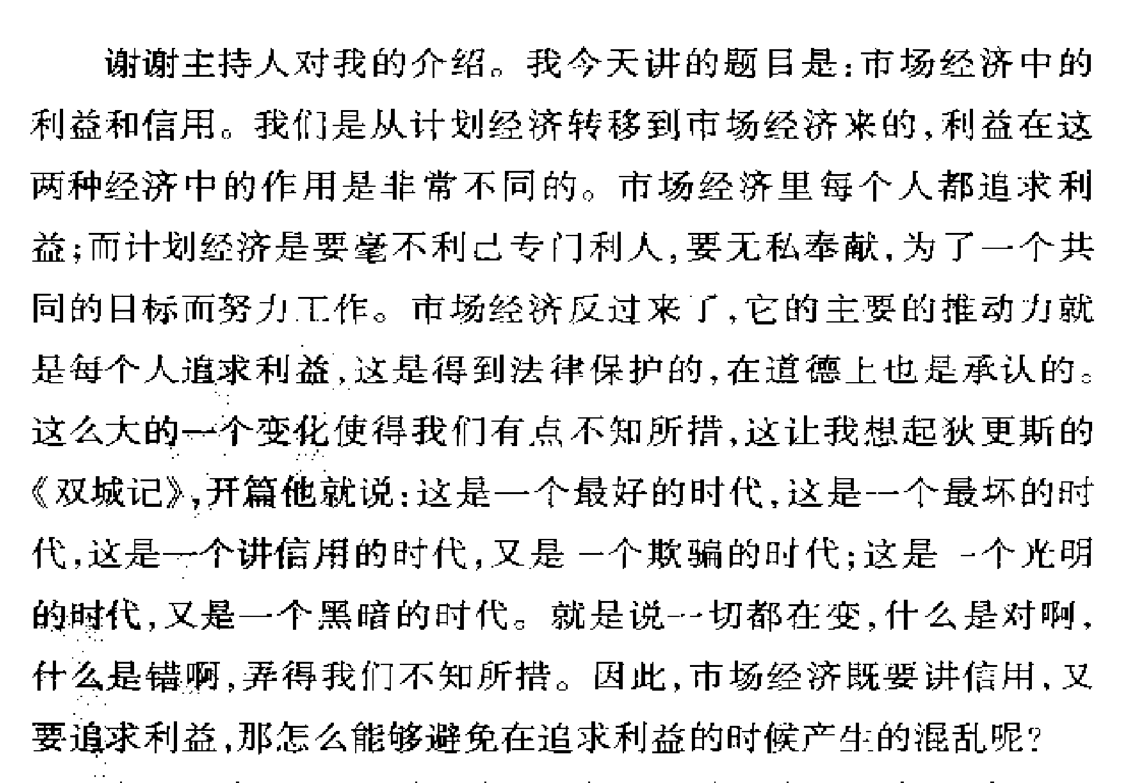


我国的经济改革已将容易挖掘的潜力都开发出来了，现在进行的深层次的改革涉及到更基本的权力的重新调整。这次调整如能成功，中国将踏上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前景非常光明；如果改革失败，等待我们的将是发展的停顿，社会矛盾的僵持甚至激化。而改革成败的根本点在于人人平等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能否被确立。说到底，是一个道德观念的转变问题。如何使这个转变更顺利一些，值得全国同胞认真思考。

第6讲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



谢谢主持人对我的介绍。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来的，利益在这两种经济中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市场经济里每个人都追求利益；而计划经济是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无私奉献，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市场经济反过来了，它的主要的推动力就是每个人追求利益，这是得到法律保护的，在道德上也是承认的。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使得我们有点不知所措，这让我想起狄更斯的《双城记》，开篇他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讲信用的时代，又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就是说一切都在变，什么是对啊，什么是错啊，弄得我们不知所措。因此，市场经济既要讲信用，又要追求利益，那怎么能够避免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产生的混乱呢？

市场经济的二三百年，给人类创造了非常大的财富，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现代技术，如飞机、火车、电子计算机等全都是这一二百年中发明出来的，计算机现在一两年就要淘汰一批，而这个进步，并不是靠一个什么理想，就是靠追求利益得到的，靠竞争得到的，因此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怀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口号，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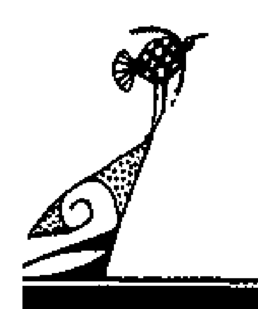
是行不通的，除非有一个人例外，大家把所有的利益都给他享受，这样逻辑上还讲的通，尽管不太公平。如果这个唯一的人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就得出口利益，否则就没法处理了。可见这个口号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是一个逻辑上不通的口号。因此我们要承认，每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而这样一种制度，同时是可以达到均衡的。我并不是说不要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是需要的，但是应该是强者帮助弱者，富人帮助穷人。每个人都毫不利己，穷人去帮助富人，那算什么世界啊，弱者去帮助强者，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我们要有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它的基础就是承认每个人的私心。

现在市场经济中我们看到的许多丑恶现象，是不是因为追求利益而造成的呢？不是。这些丑恶，并不是因为追求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侵犯了别人的利益。所以市场经济的秩序之所在，就在于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要认识到别人跟我一样，他也有他的利益，因此在两个人的利益交叉的地方，要尽量地把它划分清楚，法律就是起这个用处的，它告诉你什么是你的利益，什么是他人的利益，避免出现纠纷。当然，尽管如此，利益界限有时还不是很清楚的，经常有模糊的地方。为了避免纠纷，所以克服私心还是必要的，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要有所克制，尽量不要跟人家发生冲突，这对整个社会来讲是有好处的，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合作的机会。要彼此都是争争吵吵，就没办法合作了。所以我觉得，在市场经济中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看到市场经济是承认利益而且它是不会出现矛盾，它可以是一个有人情的、是一个协调的、融洽的社会，不一定是讲了利益就非要彼此冲突不可。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不应该侵害别人的利益。它隐含了一个意义，就是人跟人是平等的，我跟你、跟他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利益是同样受到保护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利益要得到更多的保护，没有人可以侵犯一点别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中间，是不容许存在这样的人的，这样人的存在就是一种特权，市场经济跟特权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要保障



特权，那你就不要来市场，要讲市场就必须取消特权。我们现在参加世贸组织，就要求国民待遇，我们连外国人都要有一个平等的待遇，何况对中国人呢？所以市场经济需要破除特权，这跟计划经济不一样。计划经济中，有计划的制定者，有执行者，它天生的把人分为不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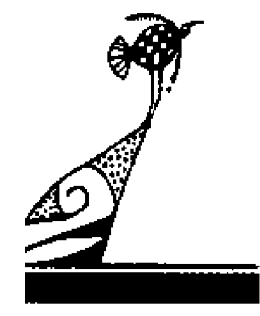
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是平等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发生了问题呢？在信用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发达国家的情况。发达国家的市场的信誉比较好，当然这个好的信誉是经过了一二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老百姓天生就比中国人好，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质好，而是因为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办法。这套办法简单地说来，就是让不讲信用的人吃亏，让讲信用的人得到好处，那么你不讲信用的时候就得掂量掂量：我得花多少成本，我得付出多少代价。要使得这套办法能做到，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这个制度是有利于讲信用的人，有利于诚实的人，对于不诚实、不讲信誉的人，能够给予适当的制裁，这个社会要建立起一个信心，就是要让人们相信：我要是老老实实做事，我会得到保护的；相反，我要是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我迟早要倒霉。我们现在离这个社会还有相当距离。我记得尼克松总统的下台，他是怎么下的台呢，就是他隐瞒了一些事儿，他做了一些违法的事儿，而且他又隐瞒它，最后总统就当不了了，只好辞职下台；克林顿总统也差一点下台，因为他跟实习生莱温斯基有染，但是这个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于他撒谎。身为总统这么高的职位，为什么说一句假话就得下台，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诚实已经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不诚实。像这样一种制度，它就保证了人们的信心，就是我说老实话，我得到保护，我说假话，我马上就可能要倒霉。讲信用、有道德的人在市场经济中应该得到尊重。其实在我们国家，传统上对于有道德的人是很尊重的。一丑可以遮百俊，一俊可以遮百丑，这个“一”就是一个人的信用和道德。一个人如果讲信用，即使他学问少，很穷，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会得到大家的尊重；相反，一个人不讲信



用，骗人，不管他位子有多高，他有多少钱，当面可能人家奉承他，背后就指他的脊梁骨，就会看不起他。所以不论在市场经济也好，在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好，对于一个人的道德要求，一直是放在首位的。有钱的人不要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有人来拍马屁，但是要知道，你真正的好坏，是看你的道德和信用。我们要培养这样一个风气，对于有道德的人，讲信用的人，有道德的公司和企业大家要尊重它。事实上也是这样，在市场经济里面，信用是值钱的，是可以用金钱来度量的。信用表现为一个人借钱时利息的高低。一个人信用差，就只好去借高利贷，利息非常高；信用好，利息就可以比较低。最近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就给出了各个国家存贷款的利息差，这个利息差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一个国家的信用水平。一个国家信用水平好，存贷利率差就小。中国的利息率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利息率是还没有包括高利贷，如果把高利贷也算进去，中国的存贷款利息差是相当大的。这就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信用存在问题。个人也好，单位也好，信用值多少钱，利率差可以很准确地把他量出来，这样就可以鼓励讲信用的单位和个人，能够借到利息比较低的贷款，这就可以使得社会树立讲信用的风气，让讲信用的成本低、收益大，不讲信用要付出代价，对于不讲信用的人和企业，一定要给予制裁，不能有任何的豁免。

但是我也要强调一下，任何一个制裁必须是恰如其分的，不能像我们常常说的那样，罚他一个倾家荡产。这个说法有毛病，他有多大的错误，就给他多大的惩罚，这涉及到怎么对待坏人坏事，这一直是我们每个人处世的一个问题。对于坏人坏事，是对他好，通过对他好来感化他，使他改进自己的错误呢？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你对我坏，我也对你坏，你给我使阴谋诡计，我也给你使阴谋诡计。这是两种极端相反的做法。前一种是以德抱怨，后一种是以怨抱怨。孔子说过一句话，叫做“以直抱怨”，直就是正直，不是歪歪扭扭的，我理解“以直抱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坏人坏事，要有原则，不能你骗我，我也骗你。我也骗你就是没原则；我要“以直抱怨”，就要用符合道德的办法，有原则地来对

待他，对他不能不加惩罚，这就失掉原则。但是惩罚要有原则。我觉得“以直抱怨”也可以理解成为有爱心的制裁，一方面要制裁他，他犯什么错误必须要制裁，不能够姑息，但是另一方面，要有爱心。这爱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不是罚他倾家荡产，让他有机会改正错误。一个社会，需要有一种良好的粘接剂，人们之间要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以直抱怨”的精神。我们普通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犯错误，那么万一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希望人家怎么对待我呢？我希望人家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不要把我一棍子打死，罚得我倾家荡产，一点机会改正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孔子的这个伟大思想，到现在全世界还没有很好地理解。美国对待恐怖主义，就是采用以怨报怨的办法，为什么有人把炸弹绑在身上去炸啊？因为他有很大的冤屈，没有地方去讲，没有人同情他。要从根子上消除坏人坏事，要有“以直抱怨”的精神，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的社会创造一个信誉的良好环境是很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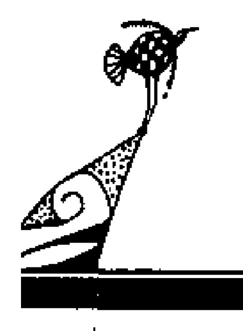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假冒伪劣，我相信做假货的人究竟是少数，但是质量不好，却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碰到一个台湾的企业家，他是做半导体的，他说他在台湾开了工厂，在日本开了工厂，在美国开了工厂，同样的设备，同样的工艺规范，但是就是在日本生产的产品质量最好，废品率最低，其次就是美国的，而台湾的质量最次。他有很多的经验，证明日本产品就是好。从这一点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的产品质量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这两年也有很大的进步，质量提高了，可以与进口产品竞争了，甚至可以出口了，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普遍的讲，我们不光是产品质量有问题，我们的服务质量也有问题，尤其是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是在刁难你，而不是在帮助你。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兢兢业业的把事情做好。如果我们都有这个精神，就完全可以和日本人竞争了，否则只会落后。全社会对政府和法院应该有信心，否则信誉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让大家对做好人有信心，即大家对社会、对信用要有信心。我们政府和法院都应该主持正义，这是政府

最重要的任务。百姓对政府的信心是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江泽民主席说道："要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正义感。当然也不是只有政府才起作用，在学校，老师要做榜样；在家庭，家长要培养孩子建立好的信用和信心。这样，整个社会的信用信誉才能建立。我们往往埋怨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其实这里老百姓也有责任。有位学者说："政府是老百姓的镜子，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官员只是集中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和行为。很多老百姓做平民痛恨贪污，一旦自己做了官员，也同流合污了。所以作为老百姓，和政府官员是一样的，每个人对这个社会的廉洁守信都有责任。老百姓也应该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对自己要有要求。比如说纳税，每个人只有纳了税，才有权利监督政府行为，而对于没有纳税的人，本身就放弃了监督政府的权力。我们现在的社会信用的确很差，发生了如银广厦等事件，现在证监委在严厉地查处他们，他们也惶惶不可终日，包括他们的会计和律师事务所。这样的事情很多，但揭发的越多，也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现在我们的官司是越来越多，说明大家对法律的信心是越来越足。张维迎教授讲过，建立社会信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有耐心，才能享受更多的物质文明。大连市为了防止大家半夜嘀嗒嘀嗒偷水，就设计了一种精密水表，成本很高。柏林地铁由于大家都诚实买票，所以地铁入口处没有任何查票实施，车上也没有剪票员，这样地铁的成本就降下来了。如果天天有纠纷，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消耗在非生产的领域，对社会是很不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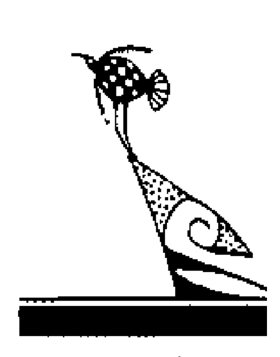
大家肯定都很关心如何建立社会信用。首先应建立个人和单位的信用档案。这个档案不是黑材料，是透明的，大家都能看见。目前重要的是应先给那些重要的人建立档案，如会计师、审计师和承包商等等。另外，我们的传媒应有更多的正面报道，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家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信用社会，从而倡导大家都来讲究信用。每个人只有在享受这项服务的时候才会给社会有相同的回报。小学生来到公园，公园越干净，他越不会乱扔纸屑。信用是

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一种不成文契约。糟糕的社会大家都对它没有信心，所以大家也就不会讲信用。还有就是要建立行会，同一行业中大家比较熟悉，大家可以在行业内互相监督，行业内自己申报为讲信用单位，符合一定条件就可以得到这种称号，享有这一称号的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优待，如低利率，免检等，就有利于以后的贸易，容易得到合同和贷款。最后我认为，建立信用，身教重于言教，履行远远胜过在讲台上讲。如果我们共同切实努力，我们的社会肯定能建立很好的信用机制。谢谢！



第7讲

货币、金融、WTO[①]



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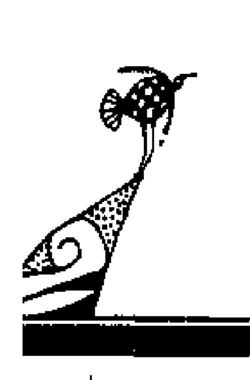
最初,货币只是方便交换的工具,它可以避免许多物物交换所带来的不便。比如物品的不可分割性,携带的困难,尤其是可以降低寻求交换对象的信息成本。货币是流动性最高的物品,交换中没有人会拒绝它,而某一特定的商品往往会被别人拒绝。有了货币作为中介,交换不一定要找到互相需要对方货物的对象,只要对方需要货币就行。但是用货币作中介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人们为货币而生产,不是为消费而生产。结果发生价格的波动,经济增长的周期,投机造成的泡沫。这些都是为了得到货币的方便性所要付出的代价。

货币是从一般商品演化而来的。它能够参与交换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价值。用金银作货币,就是因为金银本身的价值。然而用商品作货币有一重大的缺点,即它的生产成本发生变化时,物价水平跟着发生波动。比如黄金因技术进步或发现新的黄金资源而生

① 在石家庄华夏银行的演讲

产成本降低之后，金价降低，以黄金作货币的商品标价会上升，也就是物价水平上升。而且当因为交换增加对货币需求增加时，黄金未必能跟着增加其产量，造成货币供应不足，金价会上升，结果是物价水平降低。这样的事确实发生过。

后来出现了纸币，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最初以为纸币要有价值，必须有实物作担保，持币人可以随时随地将纸币换成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所以有金本位、银本位之说。美元就可以在银行兑换成黄金，所以叫做美金。后来人们明白这是多此一举，取消了美元和黄金的兑换关系，但是美金的习惯称呼还保留了下来。纸币由政府或者中央银行控制，限量发行，而它的需求则由商品交换的频率和交换价值所决定。有了供应和需求，就会形成价格。当纸币供过于求时，纸币的价值降低，物价水平上升；而供不应求时，纸币的价值上升，物价水平降低。要想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只要保持货币的供求均衡就可以了。中央银行一手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另一手控制利率，影响货币的需求，使得物价水平平稳不变。此时纸币的价值得到可靠的保证。然而有权发行纸币的政府或中央银行往往为了应付支付危机，滥发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轻则经济混乱，生产下降，重则政府倒台，改朝换代。纸币的出现固然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危险。



在市场经济中，货币最重要的功能，恐怕是它能够度量价值。但货币度量价值的功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市场必须达到一般均衡。即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浮动到了供需均衡点。在此情况下，一切商品要买可以买得到，要卖可以卖得掉。所以任何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货币交换，变为另外一种商品。其交换的比率反比于它们的价格。两件一元钱的商品可以交换一件两元钱的商品。如果有某些商品价格没有浮动到供需均衡点，货币度量价值的功能就被破坏。在计划经济时代，许多商品价格扭曲，要买买不到，要卖卖不掉，货币失掉了度量价值的功能，人们不认为价格和价值有多大的关系。价值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已过时的劳动价值论又被翻出来。其实一般均衡理论彻底

解决了价值决定的问题。它的奥妙是不需要任何别的证明，交换本身证明了均衡价格是惟一在实践上可行的商品价值。除此以外不存在任何别的行得通的价格。价值等同于价格，这是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它使得经济学能够科学地将各种不同的商品转换到同一个量纲上来，从而它们可以相加减，相比较，相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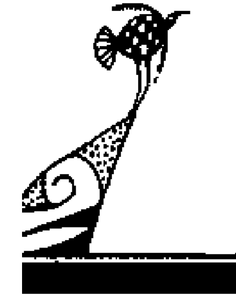
广义的一般均衡不但是一切商品的供求均衡，而且纸币本身也达到供求均衡，此时纸币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它比储藏黄金等可靠和安全得多。因为黄金的价格可能发生激烈的波动，而纸币却不会。黄金可能被盗被抢，而纸币可以转换成记名的方式来保存，别人偷去了也不能用它。储藏纸币还可以通过例如银行存折之类的证券方式。此种储藏方式不同于直接储藏纸币，它成为一种投资，可以获得按银行规定利率计算的回报，但是也经受着银行倒闭的风险。



纸币的使用本身产生了许多经济问题。它的基本矛盾是安全和方便。要安全不得不牺牲方便；反之亦然。因为纸币是不记名的。它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就说明它属于谁。这大大地增加了使用的方便性。设想如果纸币上都写上了名字，使用时要核对身份证明，好像使用支票一样，这样固然增加了安全性，但是要带来许多不便。纸币的无记名固然提供了方便，可是万一我的钱不管是什么原因跑到了别人的口袋里，钱就成了别人的。所以才有抢钱、偷钱等现象。经验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交换中的方便比安全更重要，所以纸币还没有记名。大家宁可冒被抢被偷的危险，在日常的交换中仍然使用不记名的钞票。

但是当交换涉及数量较大的金额时，安全上升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所以大金额的交换仍然使用记名的支付工具如支票而不用钞票。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几千元上万元钞票的原因。这里发生一个经济学问题，最大的钞票面额应该是多少？如果不考虑安全，钞票面额越大越好，因为大面额钞票减少了储藏、携带、点数目等的不便。尤其是减少了钞票印刷、检验、运输、保管等的成本。一张

面值500元钞票的印刷等成本，和一张100元钞票的成本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是它可以顶五张100元钞票同样的用场。只是因为对安全的考虑，才不用大面额的钞票。最大钞票的面额从各国的经验看大约在100美元上下。例如港币是1000元，马克和加拿大元是1000，英镑是50，法郎是500，日元是10 000，折成人民币都大大超过100。可见我国钞票的面值太小，给人们带来很大的不便。我曾经作过一个简单的估算，如果增发500元大钞，每年能节约十亿元以上。我曾经说过为什么中国穷美国富，就因为美国尽可能消除了一切浪费，而中国有许多浪费大家视而不见。上述钞票面额的浪费，平均每人是一块钱。全国有成百上千类似于这样的浪费，每人每年的损失可达千元以上。



大面值的钞票会增加找零钱的麻烦。但是它带来的方便超过了这种麻烦。所以大面值的钞票是需要的。人们花钱的时候总是先花零钱，零钱不够时才会破整钱。这证明了人们喜欢大面值的钞票。如果不是怕找零钱困难，大家不会在钱包里准备零钱。准备自己不喜欢的零钱，这成为一种成本。谁有找零钱的义务，或者说谁承担这种成本，法律上没有规定。习惯上都是由接受钱的一方准备零钱。

金融

人类社会要不断地扩大其生产能力。这要靠科技的发展，劳动力的投入，制度的创新和资本的积累。在这些要素中资本是必不可少的，不论科技、劳动、制度都要有资本的配合，而且资本往往能起到粘合剂的作用，把其他要素组合起来。

资本是从储蓄而来的，金融市场的作用就是将百姓的储蓄引导到能够创造财富的项目中去。从长远的眼光看，一个社会，一种制度，如果不能有效地将储蓄转变为能赢利的投资，最终这个制度将失去增长的动力。将储蓄转变为有效投资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西方报刊上几乎有一半的篇幅都是有关股票、利率、保险、养老金、基金、汇率和行业兴衰、消费趋

势、金融风险等消息，其目的无非是帮助家庭选择好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方式。一个社会要花极大的成本才能做到这一点。计划经济的失败也正因为它无法判断如何选择投资。

金融市场的任务是将钱安全地引导到能够赚取高额利润的地方去。所谓金融市场是否有效率，就是指它能否以较低的成本做到这一点。对资金市场的这种解释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同样一块钱，它的盈利能力是不同的，这取决于这一块钱是由谁来使用以及把它用于什么目的。对于资金盈利能力的研究不但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有重大的政策意义。不懂得钱在不同的状态下其盈利能力是不同的，就可能由于无知而在资金调拨中降低了钱的这种能力，使社会丧失一部分生产能力。

所谓钱的盈利能力，就是钱的生产力。这和劳动的生产能力可以相比拟。现在需要强调的是钱的生产力在不同状态下是不同的。我们要研究的正是如何使钱能从低生产能力的状态转移到高生产能力的状态去。这种转移是有阻力的。因为要克服这种阻力，所以就发生转移的成本。如果不需要克服阻力，好像水从高处自然地流到低处去，那就用不着任何金融市场。资金市场所起的作用，就是将钱从低生产率的位势推进到高生产率的位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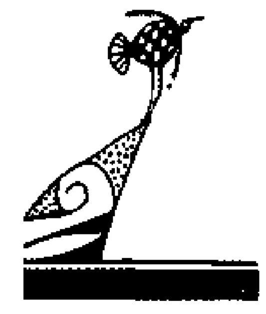


举例来说，当一个家庭将他的全部收入分成消费和储蓄时，被分在用于消费的这一部分钱，不具备任何潜在的生产能力，但准备用于储蓄的钱却具有潜在的生产能力。换句话说，当钱从消费转为生产时，它的生产力潜能就增加了，但如果这笔钱暂时仍放在个人的钱袋中，虽然它已具有了潜在的生产力，但它没有进入市场，所以没有任何市场价值。事实上它和用于消费的款并无多大区别，说不定哪一天主人又决定将它用于消费了。以上的分析无非强调了一点，即用于储蓄的钱比用于消费的钱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储蓄比之消费对社会发展经济更有用。

如果主人在各家银行之间作了比较，分析了存款的安全性和利率高低之后，决定将这笔钱存入某家银行赚取利息。钱一旦进了银行，它的生产率潜能开始体现出来，银行存款的一块钱比之家

庭手中的一块钱有更高的价值，因为他有更高的生产潜力。事实上银行花了钱做广告宣传，而且支付了利息才得到储户手中的钱。所以虽然从账面上看储户一块钱转到银行的账上仍旧是一块钱，但其价值是不同的。其差额就是银行的广告宣传成本加存款利率，再加手续费。可见货币的生产率不但可以从性质上可以区别，而且可以定量表示出来。银行对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有不同的利率，说明它们的生产率不同。定期存款的生产率显然比活期存款的高，这准确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生产率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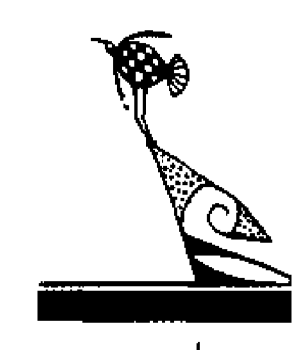
银行吸收了储户的钱，这钱并没有生产出更多的钱来，仅仅是它具备了生产的潜力，这个潜力还没有成为现实。要使潜在的生产力成为现实，必须将这笔钱转移到组织投资或其他能获利项目的企业家手中，或者说，要将钱从银行贷出去。为了实现这一步转变，银行要对申请贷款的人和项目逐个进行审核和评估，这要花费银行不少成本。这笔成本转移给贷款人，成为贷款人所付利息的一部分。贷款人从银行借到一块钱的贷款，他必须为此支付相应的利息，他要花费高于一块钱的代价才能得到一块钱的贷款。一般人不能理解同样一块钱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正是因为在会计账面上它都是同样的一块钱，它是没有区别的。然而如果不懂得钱在不同状态下具有不同的生产力，就无法理解资金市场的运作。



企业家借到了钱，将它用于可以赚钱的项目。一般要买地、造房、购设备，等等，大笔的钱投下去。这时投下去的钱还没赚到钱，要等企业开始运转起来，买进了原料，招聘了员工，生产出产品并销售出去，这才可能赚到钱。这些活动都需要资金的支持，这就是流动资金。所以流动资金是最富有生产力的钱。这解释了有时候企业家缺少流动资金，不惜借高利贷。从高利贷借到的钱必定是最具有生产力的钱，否则没有人会愿意支付超乎寻常的成本去得到钱。

钱从居民手中兜了一个大圈子来到企业家手中，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居民手中转移到企业家手中呢？这样不是可以节约许多成

本，大大地提高投资可利用的资本吗？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居民对企业家并不了解，把钱交给一个不了解的人，风险太大，很少人会肯这样做。不要说把钱交给企业家不放心，交给银行也还要考虑一下这家银行的信用是否可靠，这说明了资金流动的障碍在于信用问题。信用越好，流动的阻力越小，表现为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将钱的生产能力提升上去。信用好的银行可以用较低的存款利率从居民手中吸收存款；信用好的企业家也可以用较低的利率从银行借到钱。借贷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换不同，它是一手交钱，另一手交的是一张借契。这张借契规定未来若干年内连本带利归还给借出方，但这个允诺是否能兑现是很没有保证的。这就是资金流动困难之所在。资金如果不能流动，储蓄便不可能转变为投资。我国当前的因投资不足而形成的总需求不足，正是信用不足造成的，如果法律不完备，或虽有法而不能公正地执行，社会上不守信的人可以通行无阻，骗了这里还可以到别处去骗，就必定造成资金流动的困难。所以我说，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信用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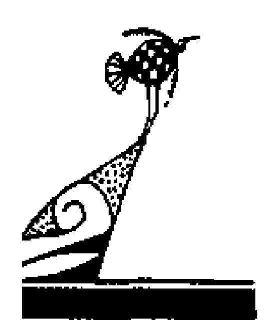
居民的直接投资是将钱从储蓄转变成投资，例如拿钱去开一个小作坊、小商店或者拿去买股票。但对于大多数居民而言，每人都有自己的职业，不可能人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去开小作坊、小商店。股票固然人人都可买，但要了解股市，区别哪一家上市企业有更好的前景，决非普通百姓所能胜任。所以出现了专门从事投资的基金组织，投资于股票的居民多半将钱交给基金组织去经营。这样做同样发生信用问题，和存钱到银行并无本质的区别。

为了建立更多的渠道使低生产力的、储蓄的钱能转为高生产力的、投资的钱，应该建立多样化的资金市场，如民间信用合作社、亲朋之间的借贷会、扶贫的小额贷款基金，但我国过去发生了许多“乱集资”的欺骗性案件。但应该说，也有更多的成功的集资项目。将集资都加以否定，将不利于提升资金的生产力。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加强信用监管，同时开辟更多的资金融通渠道。

资金流动的障碍也可以说是交易费用问题。低生产率的钱转移到高生产率的状态去时所克服的阻力（可以从利率的差定量地

测量)，就是资金转手时发生的交易费用。但用交易费用来描述过于笼统，它并不能指出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将它明确为信用障碍，则我们可以认识到提高社会的信用水平将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

投资不足，货币的生产率差异，信用决定了利率，这一系列概念有助于回答宏观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固然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市场经济国家也会发生需求过旺、劳动力供应不足的形势，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是需求不足、失业严重。在外贸政策上表现出来的是保护主义，都希望少进口，多出口。需求不足的现象和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相悖的。所谓理性经济人的意思就是人总是倾向于更多的物质享受，更多的物质享受只有通过投资才能够实现，所以人们也会倾向于多投资。在计划经济国家中绝大部分储蓄通过低工资控制在政府手中，投资也由政府决定，不存在任何信用问题。政府总希望通过更多投资来扩大生产，所以投资总扩大到用去储蓄的最后一块钱。这就是所谓的投资饥饿症。但由于政府既管储蓄又管投资，所以在总量上总能保持均衡。国家计委的主要功能就是砍掉各级政府报上来的过多的投资项目，保持储蓄与投资的均衡。宏观的均衡保证了我国计划经济运行约 30 年中除了三年灾荒之外，完全没有通货膨胀。但在微观上因价格不起均衡供需的作用，有许多东西供不应求，又有同样多的东西供过于求(居民只感到货物的供不应求，感觉不到供过于求)。然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现实却是经常性的投资不足。这种消费欲望无限和投资不足的矛盾，只有通过信用不足才能比较合理地给予回答。



凯恩斯企图回答宏观上需求不足的原因。他比古典理论认为利息率可以平衡储蓄和投资前进了一步，即发现了投资的利润前景同样会影响二者的平衡。当利润前景不良时，即使利率很低，储蓄仍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可是他并未能回答何以投资的利润前景经常处于低弥状态，以致需求不足成为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以后许多经济学家试图用经济的景气周期来解释，但无论从理论

上或经验上周期理论都不是十分令人信服的。

投资前景确实会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市场有波动,它影响到投资前景。由于政治形势变化,人口变化,新技术的出现等,市场和投资前景会发生波动,但波动不能解释何以需求不足是正常状态,它是和理性经济人的最基本假设相矛盾的。现在有了信用阻碍储蓄转变为投资的补充,可以解释二者不能均衡的原因。信用问题也可以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这种不对称是贷出方对借入方的了解总不如借入方对自己的了解。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使宏观均衡出现总供给经常超出总需求这种相应的不对称。信用问题导致信息不对称并没有否定凯恩斯理论,只是在他的理论上增加了由于信用阻碍储蓄流向投资,使发生经常性的总需求不足。但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因为市场有波动。当因政治、人口、技术等原因使市场十分活跃时,需求强劲,可能克服信用的障碍使经济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但市场的波动未必是决定宏观均衡的恒定力量。恒定力量是人们扩大生产享受更多的物质的欲望和信用不足阻碍了货币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的流动。市场的波动是有起有伏,未必总是偏向需求不足的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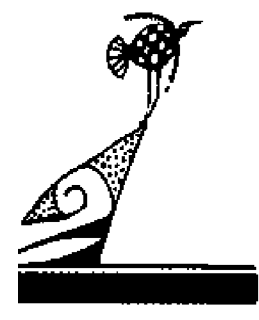
凯恩斯根据市场有起有伏的特点,提出了在市场低潮时政府可以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市场,让市场活跃起来,让企业家恢复信心,投资便会增加,宏观的供需可以恢复平衡。这种对策只有当市场制度比较健全,社会的信用基础比较牢靠时才能奏效。但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投资的不足并非一时的经济起伏,而是信用制度不健全,储蓄的钱流不到企业家手中。如果用凯恩斯的对策,固然能对市场起到短时间地推动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用问题,而且误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前年一方面政府举债 1000 多亿用于扩大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又增加了 1000 亿税收。从数字上看二者都是 1000 亿,大体上互相抵消,但从钱的生产能力来看,企业用自己可支配的钱去交税,这部分钱原本是企业可以扩大投资、扩大营销、提高技术的钱,是生产力最高的钱,将它变成了生产力很差的

政府项目，是社会生产力的损失。一般的经验是减税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比财政政策的作用大，正是这个道理。在宏观上总需求不足时鼓励家庭多消费少储蓄，可以使经济活跃。通过凯恩斯的乘数法则，消费所花的钱能够促使工厂生产出几倍的产值，此时消费的钱也具有生产力。

WTO

入世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对于金融业的影响将如何，已经有不少文章作了探讨。下面想就金融制度和入世的关系谈谈一点看法。

世界贸易组织是从关税贸易总协定 GATT 演变而来的。关贸总协定的目的是促使世界贸易迈向自由化，逐步降低乃至取消关税和各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使得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消费者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供应商；生产者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出价最高的需求者。所以对消费和生产双方都能带来利益。这种利益的来源是由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举例说，中国进口中南美洲的香蕉，因为相比较中国而言，那里的气候土壤更适合于香蕉的生产。我们不能进口他们的土地和气候，所以进口他们的产品。中国进口粮食，因为中国土地更稀缺，我们生产粮食没有比较优势。我国出口各种劳动密集产品，因为我们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于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使得投入同样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得到的产品数量大大地增加，或者成本大大地降低。例如，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费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二十，生产粮食的劳动力和土地都大幅度地减少，可是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降低了几乎一半。其中有科学技术的作用，也有国际贸易的作用。它使有粮食生产优势的地方更多地生产，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勉强生产，结果成本当然降低。



GATT 发展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将自由贸易扩大到了技

术、信息和服务。我国进口日本生产的汽车，并不是因为日本的土地或气候，而是因为他们的技术比我们强。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进口他们的技术，而进口他们的产品呢？技术不像土地和气候是无法进口的，技术应该可以进口。但是事实说明，有些技术确实可以进口，但更多的技术很难进口，那是人家几十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从全球技术市场来看，这是一个充满着竞争的市场，不进则退。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不断增加，说明在一些初级技术领域内，特别是能够和劳动结合的产品方面，我们的竞争力在很快增强。但是在复杂技术的领域内，我国在近十年内很难超过别人。尤其是优势劣势是比较而言，我们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我们不可能出口一切技术产品，如民航客机、巨型电子计算机、核电站、石油勘探设备等等，而什么都不需要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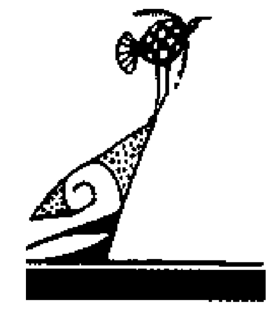


世界贸易组织也把知识产权等信息产品包括进了自由贸易之中。这就引发了更多的问题。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图书版权、音像产品版权等，它们完全是人为造成的，而且和一个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有关。二十多年以前，我们还在忙"文化大革命"，搞窝里斗，知识分子都被赶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哪有什么知识产品？而今要讲知识产品的自由贸易，我们肯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强调知识产品自由贸易的人也有他的理由，如果不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并且在世界范围内自由交易，知识的拥有者不能得到回报，谁还愿意花费精力和金钱去创造知识产品呢？再说，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知识产品，世界贸易组织同样加以保护，规则既然是公平的，就很难提出反对意见。不过信息产品不同于一般产品，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第二个人同样地消费。而且每一件知识产品都是唯一的，因而也是垄断的，其他产品不能代替。在一个国家之内，垄断产品要由政府定价，在世界贸易中，却没有这种规定。这肯定对消费者是不利的，是不符合全球福利极大化原则的。

世贸组织把服务业也包括在自由贸易之中。服务业的自由贸易又如何改进了资源的配置呢？它既不涉及气候土地，也不涉及

知识技术，以我之见，它涉及的是一套规则和制度。以金融业为例，它并不使用非常复杂的设备，也没有什么很难学的技术，但是外国的银行、保险、基金、证券公司等，与我国的相比较确实有他们的优势。这个优势是什么？就是规则和制度。这些规则和制度是人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培养起来的，我们想学，三年五年也未必能建立得起来。对这些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而言，规则和制度的核心是信用。信用确实不是短期内所能建立的。因此人家的比较优势就确确实实存在着。我们要迎头赶上，但不是说赶就能马上成功的。

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像农产品的对外开放利用外国的气候土壤一样，利用全世界范围内规则和制度的优势，来改善资源配置。使同样一件业务能够在全球成本最低、质量又最好的地方去完成。由于通讯技术的发达，金融服务中有一部分业务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去完成，但是另一部分还必须人对人地进行。此时外国机构要为中国人服务就必须在中国开办分支机构。他们在规则和制度方面的优势必须能够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起作用。他们不但会面临中国的法律环境，还有中国的顾客和中国的同行。规则和制度是人们共同形成并维护的。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他们优势的发挥。他们还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



对顾客而言，金融服务最重要的是安全，其次才是效率。我国银行业的出问题也出在安全上，国际银行业信用评级考虑的也重在安全。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他们的优势主要也在安全。我们要和他们竞争，首先要改善金融的安全性。银行风险来自市场、顾客和内部。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酿成大祸。这方面外国银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尤其是如何防范内部风险。当然，安全是没有止境的，过分强调安全就会失去效率。我们首先要找出既不安全又没有效率的习惯做法，其次要深入研究如何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得总效益为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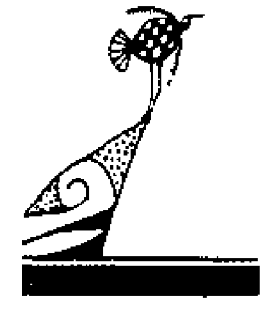
入世是制度和规则的竞争。而制度和规则又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提高人的素质是银行业竞争的落脚点。华夏银行大多是

年轻人组成的，没有老的包袱，希望在这场竞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第8讲

WTO与制度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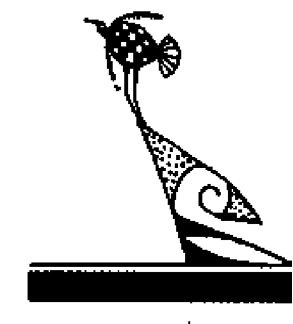
WTO的原则是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

世贸组织总的原则是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其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使各种资源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使每个国家都能发挥优势，避免劣势。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为什么这种方法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呢？这个问题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回答，也可以用最普通的常识解释。

劳动分工带来了交换，如果不是一方受损一方得益，而是在平等、自愿原则下进行交换，则必定会给双方带来利益，因为有损于任何一方的交换是做不成的。双方都能得利，必须有新的利益产生出来，否则是不可能同时给双方都带来利益的。过去认为交换并不产生利益，只有劳动才能产生利益，一柄斧子换一头羊，结果还是一柄斧子、一头羊，并没有新的利益产生。现代经济学理论则认定交换可以产生出财富，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用斧子换羊的人可以用他擅长所打的斧子去得到他不擅长生产的羊；养羊的人也可以用擅长养羊的技能得到不擅长生产的斧子。社会分工可

以使交换双方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不仅使技术越来越精湛，还能产生规模效应，即仅仅为自己打一柄斧子和为大家打10柄斧子，每柄斧子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交换产生利益的根本原因。

选择什么人交换最合适呢？就要看交换双方的比较利益能否得到最大发挥，要找到合适的对象。这就需要在公平、自由的竞争基础上进行选择。如果有人被排除在交换之外，不能被选择，减少交换对象就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益。国际贸易的好处在于交换的一方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合适的交换对象，卖东西的能以比较的高价格卖出，买东西的能以比较低的价格买进。每个从事交换的人都想在市场上寻找到最合适的交换对象来交换，这就提高了效，也创造了财富。为什么赚钱就是创造了财富呢？这可以用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当商品价格达到一般均衡的时候，既没有供不应求，也没有供过于求，想买可以买得到；想卖可以卖得掉，钱和物可以充分流动，这时钱变成了度量价值的单位，也就变成财富的计量单位，赚钱就是创造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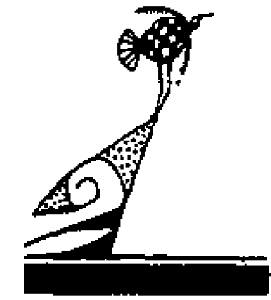


世贸组织讲求公平和自由的原则是以两个假定作为基础的。第一，假定人是自利的，即人是追求利益想赚钱的，因此在选择时一定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交换对象；第二，假定人与人是平等的，如果有人可以控制他人，就不可能是公平竞争。如果没有这两个假定，世贸组织就不会有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也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市场经济为人类带来公平自由的发展阶段

世贸组织的产生是市场交换高度发展的结果，市场经济从无到有再到非常发达，这个过程可以说就是人的自利得到承认、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得到保障的过程。我们习惯上把世界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我有另一种分法，就是把人类历史分成两个阶段：**即没有公平和自由的竞争阶段和有公平和自由的竞争阶段。为何如此划分呢？首先，自利得到承认就是一个历史**

的进步，过去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自利是不被承认的，总认为追求利益就不是高尚的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市场经济则要求人追求利益，不追求利益还犯了规。世贸组织甚至把人的自利变成一个规则，不允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东西，这叫倾销，倾销是犯规的。为什么历史上从来都认为自利是坏的，而在市场经济中却变成好的呢？其实人的自利是不容否认的，想把自利取消也是不可能的，动物的本能使人在繁衍后代、获取食物时都有自利的冲动，如果不自利任何人都很难活下去。需要强调的是自利并不会造成伤害，只有侵犯别人的自利才造成伤害。当然这个问题需要更仔细的研究，我在此只把自利作为市场经济的运作基础来谈。



市场经济不但要求自利，还要求平等，即每个人的权利是相同的，这个自利的范围就是不能侵犯别人的自利。如果一个人侵犯了别人的自利又可以不受惩罚，他一定是个特权分子。特权与平等是相反的，正因为取消了特权，人类才进入到市场经济社会。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不是自利造成的，而是侵犯了别人的自利。自利与平等和不能侵犯别人是互相联系的，自利是每个人同样的权利，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平等的。如果允许一部分人自利，而要求另一部分人无私奉献，这个社会就不平等，就变成一种人可以侵犯别人，另一种人只能奉献。如果一个社会让所有人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有一个人例外，那么所有的利益统统归他享受，至少是行得通的，尽管不公平。如果这个人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利益也得有另外的出口。可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这只能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提出的口号，他让一部分人牺牲、奉献，而让另一部分人享受、为所欲为。其实“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少数人可以侵犯别人的人权，可以随便以叛徒、特务为名把人抓起来。

承认自利是历史的进步，自利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经**过近三百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积累。自利变成了市场经济的巨大推动力，它使得人类走上了**

一个富裕阶段。现在飞机造得这么好，计算机两三年就更新换代，这都是赚钱、竞争带来的结果。现在人类的寿命正在延长，享受之丰富、教育之普及统统是自利推动所致，而不是某一个理想或某种奉献精神所推动的。

自由和平等的制度建立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在人类社会开始有组织的阶段就出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家族里有长老，宗教里有神父、巫婆或者是巫师，这些人因为有特权而与其他人不一样。在这个阶段利益变成了少数拥有特权的人的专利，普通人要想追求利益也只有通过得到特权这一条途径才能实现。因此这个社会的故事就是争权的故事，不管是哪一个人都想要得到权力。毕竟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特权，想拥有权力就得用尽心思，用各种阴谋诡计，使用各种不道德的甚至是最残酷的手段获得权力。过去中国的朝廷那么黑暗、残酷，就是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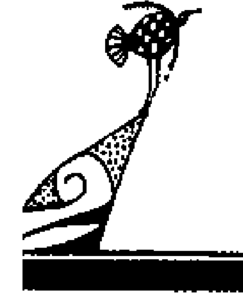


权是具有排他性的，而钱不具有排他性，你有我也可以有，穷人也可以变成富人。当特权被废除，人跟人之间只有平等的人权的时候，社会就起了本质的变化，于是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此来看，人类历史又可以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即有特权的阶段和没有特权只有人权的阶段。什么是人权？就是没有特权。我们不用争取人权，只要反对特权，人权自然而然就出现了，根本用不着去争取。一个社会如果有一些人有特权，其他人就不可能有人权；如果每个人都有人权，也就没有了特权的容身之地。特权是一种引起冲突的权利，人权不会引起冲突，你我他都有人权不会造成冲突，但是你我他都有特权就会造成冲突。当然也有一些特权不造成冲突，比如参加一个学会，按理说也是一种特权，但这种特权并不造成冲突，我讲的特权是指超越法律之外的权利。

有特权和有人权这两个社会阶段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生产力是完全不同的。人都是追求利益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得到利益，是通过侵犯别人的手段得到利益，还是通过创造、发明和合作来创造财富？在有特权的时候，人要得到利益就是追求权力，有了权就可以欺骗别人，软硬兼施地把别人的劳动果实弄过来。没有

权力的人，就总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当特权被完全取消之后谁也没有特权了，所有人只有通过合作、通过创造的办法得到利益，这就迎来了市场经济的阶段。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合作和创造使得财富增加的一个社会阶段。所以，有没有特权对于人类生产力发展来说是一个本质性的、决定性的因素。

交换可以创造财富，因为交换并不等价。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一头羊换一柄斧是因为劳动时间相等，如果劳动时间相等为什么还要去交换？可见交换不是等价的。最妙的就是交换的双方都觉得自己赚钱，都觉得我赢了。其中的原因就是交换创造了财富，它发挥了比较优势，而且有规模经济效应。而发挥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就是人与人的平等。



自由和平等是相互关联的，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怎么能够使人得到自由呢？每个人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他自由的环境里，这个时候他就得到了最大的自由。没有人干涉的自由就是每个人都不干涉别人的自由。自由的概念并不是为所欲为，恰好是有很多事不能做，不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真正含义。什么人可能干涉我们的自由呢？家庭里可能是父母，或者是丈夫、妻子，在学校里可能是老师，在社会上可能就是政府。我曾主张政府官员必须是“自由主义者”，他要懂得不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我写了一本书叫《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有人纠正我说，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你没有权利不给别人以自由。要不要给敌人以自由？有时候人之所以成为敌人正是因为你侵犯了他的自由，否则是朋友。如果近到对待日常生活远到国际关系，人人都能用这种心态对待所有的事情，这个世界就会完全不同了。

人权与财产所有权得到保障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平等、自由、人权相互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制度里，人追求利益的后果是不同的。如果一个制度允许特权存在，人人都去抢权，无所不用其极，采用的是最坏的手段

得到利益;如果社会上公认没有特权这一说,大家就转了心思,从抢权变成创造与合作,这就是人权社会。人权就是生存权、言论自由权等,凡是不会影响别人自由的行为都属于人权。一个人只有侵犯了别人才是犯罪,他不侵犯别人,想什么做什么都是他的权利,思想自由更不用说了。过去我们要汇报思想,那时思想就没有自由,你想什么都得讲出来,别人再通过你的汇报来批评你。我们现在不但不用汇报,还有隐私权,这都是非常大的进步。

今天世界上凡是富有的国家,都是人权得到保障的国家。当然也不是说他们的人权就没有问题,但人权问题比较少,而国家越穷人权问题就越严重,所以现在人权成了联合国最为关注的问题。今天报纸上有一条消息,我们有一个外交官说"不要把人权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我非常赞成。美国人批评我们的人权不好,他帮助我们改善人权环境,我们应该感谢他。我们也应该为美国指出他们有哪些人权问题,这样一来,国际关系就变了。为什么人家帮助我们,我们还要拒绝呢?



下面谈一谈经济发展与人权的关系。是由于经济发展了才有人权,还是先有人权经济才得以发展呢?从历史的发展以及从不同国家的比较来看,我想两者应该是互相促进的。人权思想的出现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财富增加也同样促进人权的改进。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权思想的出现,在西方历史上皇权和宗教权一直是两个最有影响的权利,两者中间就有产生人权思想的空隙。而中国只有一个覆盖一切的皇权,没有空子可钻,因此中国很难产生人权思想。人权思想出现的地方,也是经济开始增长的地方。市场经济最早出现在荷兰,荷兰也是人权思想比较盛行的国家,现在荷兰及北欧一些国家仍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英国的人权与皇权、教会的斗争,使得英国的经济走上了有保障的发展之路。人权思想是在西方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发展起来的,"人权"这两个字已经有两三百年了,作为一个普遍公认的人人平等的权利,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现在人权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恩格斯讲过一句话，当一个民族受到剥削、压迫的时候，他根不得异族侵犯。这就证明了主权不是最重要的，而人权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的不是主权，而是人权。日本人侵略中国，我们要奋起反抗，因为中国人变成了亡国奴，可以随便被抓，被打，被关，完全没有了人权。香港老百姓则不同，他们不是亡国奴，人权得到基本的保障，本地人和英国人打官司未必都是英国人赢，所以他们没有民主的要求，因为他们没有感觉到是受了压迫。相反，香港人在回归的时候带有很多怀疑，当然，现在这种怀疑已经取消了。那时跑了很多香港人，现在又回来了，香港还是得到原来的制度保障，有言论自由，也有了民主意识。所以我的判断是主权服从人权，主权的目的是为了人权。如果没有人权，要主权干什么？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才能保障人权呢？从历史上看，政府是人类社会对于秩序的需求才产生的，有些人犯了规做了坏事，需要有特权的人来维持，如果对坏人不能治理，这个社会就得不到安宁。在古代社会，从孔子、柏拉图开始，人类所设想的理想社会都是有特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但他们所设想的特权分子都是善良的人。可是这个想法落空了，因为不能保证当权的人都是好人。要保障老百姓不受欺负才出来一个政府，可后来恰恰是当权者在欺负老百姓。于是就出现了各种政治理想，出现了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没有特权却能使社会得到治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发明，虽然政府还必须有权威，但是政府要受监督，不能欺负老百姓。在这种取消了特权的社会，人权才可能存在。

在人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财产权。为什么财产权显得如此重要呢？因为财产权是一种不会引起彼此冲突的权利，人拥有所有权的权利是平等的，你可以拥有，我也可以拥有。只有保证了物权才能保证所有权的平等，而且每个人拥有的所有权是得到法律保障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时的财产权就变成了一种防止冲突的权利。我所定义的人权是相对于特权而言的，特权是会引发彼此冲突的权利，所有权之所以不属于特权，因为它不但不引

起冲突，还可以避免冲突。

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类历史又可以分成有特权的阶段和取消特权变成人权的两个阶段，或者划分成所有权可以随便被侵犯和所有权得到严格保护的两个阶段。所有权被侵犯就是因为有特权存在，这种特权阶层享有极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而任意侵犯别人的财产。在这种社会里，总有人侵犯别人的财产，甚至侵犯别人的人身。一个社会的财产权利得到严格保障，是一个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谁的财产权容易被侵犯呢？那就是弱势群体，所以弱势群体才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才渴望得到法律的保护，强势群体则用不着强调财产的保障。比如我们国家农民的财产权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所以才有“减轻农民负担”一说，仿佛农民的收入、财产权是一块橡皮泥，放在手里捏着，一会儿可以加重，一会儿可以减轻。如果他的财产权得到法律保护，谁也不能加重或减轻。因此“减轻农民负担”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财产权需要得到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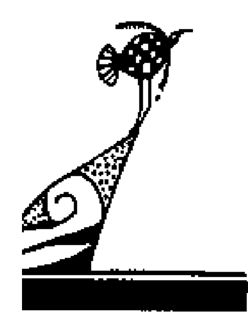
国外有一个学者说：“所有权是道德之神。”起初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后来才明白如果财产的所有权不明确可以随便侵犯，那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只有当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起码的道德才出现。首先是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这时对弱势群体来说财产的所有权就变成了一个可靠的东西。如果弱势群体的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有点钱就被剥夺了，那么他们就永远是穷人。市场经济出现以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好几千年，由于财产权没有保障，这几千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财产权的争夺史。穷人受压迫受剥削，实在不能忍受了就铤而走险起来造反，造反的方法就是侵犯富人的财产权，把土豪打倒侵犯他的所有权，分他的财产分他的土地。这种用侵犯所有权的办法建立起来的社会，连富人的财产权都没有保障，穷人的财产权就更得不到保障了。所以周而复始地改朝换代。不管怎么变，穷人还是穷人，富人还是富人。

但是当市场经济出现以后，最容易被侵犯的弱势群体的财产权也得到严格保障，这个社会就就起了质的变化，穷人就不再永远

是穷人,而有可能变成中产阶级。原来占人口大部分的穷人变成了中产阶级,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体,社会就安定了。只有把财产的所有权严格保障起来了,人想要致富就不能再通过剥削、欺骗、掠夺而只能通过创造和合作。

WTO与中国的制度变迁

谈到加入世贸组织与我国的制度变迁,首先就会遇到如何取消行业特权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收入分配上看。在我国某些行业、领域之间存在的特权尤其是垄断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一个人的待遇好不是在市场中的贡献大,只是因为在有垄断优势的行业里工作,这种不公平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实际上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国营与民营企业的待遇不同都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怎样的收入分配才算合理呢?一般来讲,没有特权的市场收入分配是比较合理的,虽然这种分配也会造成相当大的贫富差距,但这个差距并不会造成很大危害。因为这个差距并非特权造成,它不但无害反而有益,因为这样就有可能让穷人通过努力变成富人。但是要求这条渠道必须畅通,不能给穷人变成富人设置各种障碍。比如教育机会,如果穷人没钱上学得不到教育,这种机会就不平等。为什么国家拿钱搞义务教育,就是让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可以接受教育。



再一个问题就是国有、民营企业平等对待问题。这些年我们在此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非垄断行业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而像银行、邮政、铁路等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力度也在加大。入世以后这种改革更是势在必行,因为并不是所有国有企业都应该得到发展,相反还需要进一步改制。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国有企业一般都是占GDP产出的10%左右,最多不超过20%。从前我国国有企业占了几乎100%,目前还占到38%。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能降到20%以内,我相信国有企业可以有比较高的效率。关键一点是国有企业从经理到工人,都要从市场上招聘,或者说国有企业的人、财、物、信息、资本等都要在市场上和民营企业同样竞争,或者从民

营企业里交换。比如说国有企业的老总应该到民营企业中聘请，并形成一个市场，这时候国有企业的行为跟民营企业的行为是一样的。但目前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很少是从民营企业或从市场中请来的，而是在政府官员中间选拔为多，这样就很难改变国有企业的面貌。国有企业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应把整体规模缩小，而且人、财、物、信息、资金也能充分地交换。如果只是换了人，而制度、环境不变，人在这个制度里还是受限制，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如何改变制度环境呢？就要看整个国家经济结构是以国有为主还是以民有为主，如果以民有企业为主，整个制度结构会逐渐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双向的作用，制度环境决定了企业的行为，而企业的比例又改变了制度的环境。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民营企业等于零，那时的制度环境跟今天的制度环境显然不同。现在却可以听到许多民营企业的呼声，这些呼声会影响到整个制度环境的改变。但现在因为政府手里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资源，因此，我们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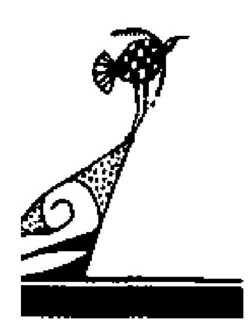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过去我们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学习西方，这个争论持续了一百多年，入世等于给这个争论划上了句号。为什么要学习西方跟国际接轨？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一个合理、平等的制度。世贸组织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政府逐渐明白了法律的重要性，政府也要守法。过去老百姓不守法，政府来管，政府不守法却没有人管，我们缺乏对于政府的监督管理机制，虽然也有某些机制但是不健全。加入 WTO 在这方面会有很大的进步，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有些事政府是不能管的。

20 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归根结底追究这种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哪些是"母制度"即最本质的制度，哪些是"子制度"即次要的制度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变化就是要建立起保障人权和相应平等自由的财产权的制度，若这个制度建立不起来，别的统统谈不上。可以看到，经过改革我们在自由、平等及人权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与"文革"稍做对比就能感到这种变化有多大。那时的人不能自由选择职业，每个人都是革命的

"螺丝钉",拧在那儿再也别想动。而现在人身自由扩大了许多,选择的权利多了,可以自己挑工作,可以考公务员,还可以辞职下海,也可以到国外找工作,那时却不能,辞了职就是背叛革命。那时农民也不能进城,现在农民可以进城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法律上平等的权利也比过去多得多,打官司的人也多了,因为大家对法律的信心在增加,受了冤屈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得到伸张。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正在朝这方面全面迈进。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布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司法就是独立的,他也不能干预司法。江总书记的这个表态很重要,这标志着加入 WTO 之后我国司法独立真正开始了。

这样大的变化说到底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这个过程与国际交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假想中国完全没有受到西方影响,很难想象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国际的信息、能源、学术等方面的广泛交流,没有商品的交换,资金的流动,中国继续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们可能不会有任何进步,还生活在清代。我们已经如此生活了几千年,没有外界的影响,很可能还是老样子。



加入 WTO 之后面临的一些问题

最后讨论一下世贸组织的平等、自由有没有毛病? WTO 是一个成员国组织,它并没有强制性的力量。如果愿意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承诺将世贸组织规则视为自己的规则就可以成为它的成员国。这种承诺是公平、没有特权也没有例外的,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得遵守一样的规则,应该说规则是很平等的。但是现在世界上有强国、弱国之分,在规则相同的条件下就会导致结果的不公平。同样的竞赛规则,对于弱小的国家肯定是不利的,它不可能比强国更快到达终点。我想世贸组织规则公平的结果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的起点不公平,这是一个事实。

世贸组织是追求利益,是平等自愿的。所有的国家参加到世贸组织里,一定会得到利益,否则也就不参加了。但由于国家之间强弱的差异,世贸组织有一些条款就是为了照顾这些弱小国家的,

比如关税税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税税率是不一样的，允许不发达国家对幼小工业给予高关税的保护。还有一些条款也是照顾发展中国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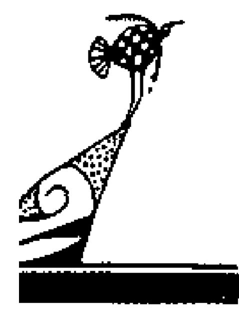
与世贸组织相比，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其它一些国际组织是不同的，它们都是非盈利机构，其目标不是利润而是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因此对贫穷、弱小的国家是特别照顾的，世界银行专门借钱给一些穷国。而世贸组织不同，虽然有这么多条款，但不经过艰苦的谈判，就不能给这些落后国家任何优惠条件。世贸组织不是在帮助弱小国家，它的目的是使全世界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如果要得到照顾，就破坏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原则。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里我们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吃亏，也没有办法摆脱吃亏。当然，我们应该利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各式各样的机构来发展我们自己。但一个国家的强盛说到底还得靠自己，靠国际帮助只是起了一个辅助作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得到过国际帮助，而帮不起来的是大多数，因为它自己内部存在问题。



世贸组织对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要分类对待。到现在，有些国家还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有些国家则是在一定条件下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世贸组织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要区别对待呢？市场经济的价格是自由浮动的，因此出现了均衡价格，这个价格是价值的真实表现。而计划经济价格是扭曲的，它没有一个参考坐标能够测量其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中国在计划经济时就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该出口，什么该进口。现在搞清楚了，出口能赚钱就出口，进口能赚钱就进口。赚钱就是发挥了比较优势，避免了比较劣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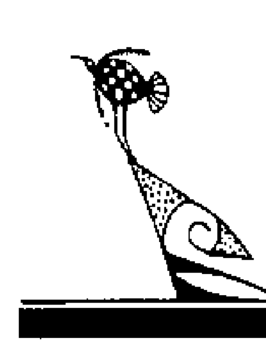
同样的道理，国内经济领域里的平等和自由是保证国内市场能够达到均衡的一个条件。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呢？很多学者研究过我们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从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标测量来看，浙江、广东等地是发达的，最落后的是青海、贵州这些省份。尽管我们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要变成规范的市场化经济还要做很多工作。首先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平等对待问

题就需要解决，一些垄断领域要允许外资进入。比如说银行业和保险业，现在民办银行、民办保险业还没有。民生银行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民办银行，它还是以国资为主的。可见金融等垄断行业的改革还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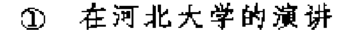
第9讲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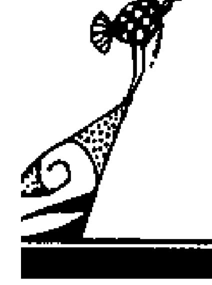
我们改革20年的成功就是制度的变化所造成的。20年的成功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在座诸位都是二十来岁，在你们出生的时候，老的制度已完全变成一个新制度，而且变化还没有完，还在继续变。虽然老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毛泽东时候的社会主义跟现在的社会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如果我们还是在斗私批修，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我们还是一个老样子。20年以前，一般家庭连黑白电视机都没有，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有彩电。我们的生活大大改善了，教育普及，寿命延长了。变化的取得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响应，每个人亲身参与的。回顾变化的成果使得我们现在非常有信心，而且我们还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改革。所以，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我曾给《北京青年报》写过一封已刊登的信，其中写到首都机场一杯咖啡卖88元。我和几位朋友在那里喝过，喝完后，一看账单，觉得非常不合理，于是就给《北京青年报》写了封投诉信讲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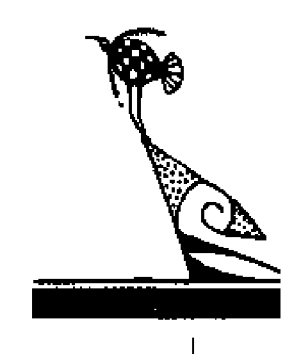
① 在河北大学的演讲

事。我们觉得不能付这么贵的咖啡，于是和服务员辩论，这位女服务员不慌不忙，彬彬有礼和我们讲道理。这要制度分析才能看出后面的道理，可以看出她很有经验，经过这种事不只一次。可她为什么受这份气，她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对，可她仍为此辩护。因为服务员卖这么贵的咖啡，她是有分成的，这就是制度，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她一定从这咖啡中拿到钱，不论多少。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要从利害关系，从表面看到背后的制度。不仅是服务员，飞机场与这个咖啡店也有利害关系。88 元的咖啡，飞机场肯定知道，但允许它存在，我猜想一定是飞机场用很贵的价格出租柜台给咖啡店，同时默认乱收费。这些说明经济现象后面人的利害关系决定人的行为。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在表面现象后面控制着人和人关系的学问。



我再举个例子说明制度怎么和日常生活有关。德国一些城市，柏林、法兰克福，他们的地铁使用自动售票机，买完票以后，直接上车，无人或机器检票。而北京有人在进口检票。其它一些地方，如香港、华盛顿、新加坡，都是机器检票，它有一个闸，把票放进去，那个闸才能自动推开，没有票闸推不开，人过不去。但柏林、法兰克福没有任何检票设备，要是你不买票也能上车，一般车上也没有查票的。我在柏林呆了一个月，天天坐地铁，也没碰上查票的。这个制度它能在那里行得通。如果北京地铁采用同样制度，估计行不通，恐怕大部分人都不买票。但使德国人老老实实买票，这样是德国地铁省了检票员和机器，成本降低了。靠每个人都遵守规则，这样每个人也都从中得到好处。这个好制度在中国行不通，其结果使每个柏林人享受到很低的票价。举一个反例，大连是一个沿海城市，但非常缺水。大连市政府规定每家每月只许用 3 吨水，约一天 100 公斤，水价为 1.6 元/吨。显然一天 100 公斤水很不够用，于是很多家庭偷水。就是晚上放一个大桶在自来水管下面，自来水管只开一小点，但水表不走，一天能偷一二百公斤水。自来水公司于是请大学教授商量对策，大学教授提出设计制造一种精密水表，也要让所有家庭都装这种水表，但水表很贵，这样会使所有

人都倒霉，即使不偷水的人家，也得装这种水表。大连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它的毛病出在水的价格不合理，你限制他用3吨，他现在用四五吨，不是偷水，光明正大的，你凭什么理由罚他？如果他是偷水，你可以罚他。惩罚也是一种制度问题，不是你手里有了权，你就可以随便惩罚，要有道理、根据，一个不合理的惩罚，后果非常不好，现在就是一个例子，你变成1.6元/吨，而老百姓用偷水的办法对付你惩罚价格。当然偷水不好，但你的惩罚搞错了，不能用惩罚的手段对付买卖。你应把价格定在水的成本上，因为得到水有很多办法，大连可用海水淡化的办法，一吨水据资料约需3元。那水价定到3元/吨，问题不就解决了？老百姓用到水了，很自然不会偷水，按3元价格调整自己的用水量。这就是经济学解决的办法，即价格等于成本，成本在经济学上讲应是边际成本。现在大连的地下水已经紧缺，应建海水淡化场，淡化水的成本比普通水要贵，3元1吨，我就定为3元1吨，这叫边际值。就我外加的，我再增加一些水的生产，水的成本3元，原来水的成本1元，不需要分前3吨每吨1元，到第4吨后就每吨3元，通通的价格都是边际成本。因为你分不清你这吨水是地下水还是海水淡化，所以经济学要求的一个最有效率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P = MC，P就是Price，M就是Margin，C就是Cost。这是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这样一个价格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同样道理也可用在煤矿上。有的地方煤矿很深（70米），有的很浅（30－50米），你少用一吨，就减70米矿井煤的生产，所以我们始终在边际上进行调整，你多用一吨、少用一吨只是在边际上进行调整，那么成本按边际成本定。这是经济学上重要的结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市场上买东西是不是边际成本？我拿一样东西上市场上卖，我知道进货成本或生产成本，但卖时，在成本上加我的利润，这时我报的价不等于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成本。你有什么办法让报价报出成本价？这是个制度问题。用什么办法使供应商亮出底线？超市就报了价格底线，因为商品都是明码标价，而且不能讨价还价。超市为什么不能加一价码？因为有别的超市与它竞



争。如果只有一家,做不到价格等于成本。但有好多家,价格要通过竞争降低到边际成本上,谁也不敢把价格定得太高。由此可知超市对改善市场配置起非常大的作用,减少交易费用,特别是把价格底线亮出来了。如果到国外买东西,又怕吃亏,那么上超市,保证不会吃亏。超市一定是真实成本价格。超市如果价格等于成本,赚不到钱,谁还干?超市一般不容易赚钱,但不赔本。所谓等于成本,并不等于进货价格,差别很大。超市管理费用很高,头一个是偷窃,另外还有复杂的仓库管理。但这并不等于超市一定不赚钱,通过竞争,管理上采用新办法,在竞争上它比别人强一点,节省劳动力,管理好库存,保证供应。如果有断货,将会丢失赚钱的机会。总而言之,通过创新、竞争有一个平均水平,但它比别人高,它就赚钱。超市为老百姓提供非常便宜的商品。而中国有些超市比外面高,超市正在发展之中,有些管理、进货、配置问题还没解决。像美国超市是最便宜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薄利多销,厂家、消费者均得到好处。超市迫使它把自己价格底线亮出,价格是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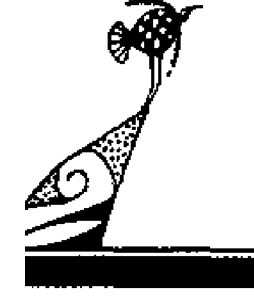
大连的例子说明定价错误造成资源的浪费,定价准确可节省资源,价格不能扭曲,否则会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所以,我们要追求好的价格,能达到供需均衡。在经济学里,有一条往下倾斜的需求线和往上倾斜的供给线,两线交点决定商品价格。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供过于求,价格下降。供需均等,是好的价格(商品均衡价格)。一个商品达到均衡,叫局部均衡,所有都达到叫一般均衡。从数量上,一般均衡是所有都均衡,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一个均衡点,任何一个商品均可买到或卖掉。如果我有这种商品可以变成那种商品,任何商品都具有这个特点。这时,钱变成度量价格的单位。甲换成乙,甲价是乙价两倍,卖掉甲可买两个乙。钱代表价值比例,甲乙价格比是 2:1。一般均衡理论是唯一的价值判断,它的道理是实际证明的,一般均衡彻底解决了经济学里最根本问题,什么是一个商品的价值。

我们生活在地心引力里,谁也不觉得重要,但地心引力很重

要，就像我们生活在价格里并习惯价格，也就感觉不到价格重要。没有价格，无从判断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稀缺。价格给你非常准确的度量。你无法精确度量他的价值是多高，稀缺性是多少。发电可有很多办法，要根据当地情况计算，选择成本最低的，你在比较时要用到一系列商品的稀缺性。建一电厂，要用各种投入，都有稀缺性，要计算发电要用多少社会稀缺性。不同商品有不同度量单位，无法相加，但在经济学里只要是商品都能加。一尺布和一斤铁可价格相加。建电厂，什么东西都可相加，这样的可比较。结果同样一度电，消耗最少的社会财富，没有价格你就会决策错误。更多成本，意味你消耗更多稀缺性。价格重要性在于保证我们用最少投入得到产品。大连海水淡化3元/吨是通过方案比较得出，绝不会用4元/吨方案。所以一个方案比较，离不开价格。计划经济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价格，没有均衡价格（市场保证的）。从价格重要性可推断人类社会离不开价格，计划经济行不通，因为没有价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结论是科学的。创造新的方法，用较少投入得到更多产出（经济学上意思）。人类越来越面对稀缺性。美国比我们富不止十倍，但也不满足。如果人总是追求物质，总是需要价格。除非有一天人不追求物质，此时价格无用。人会对物质追求减少，但不会永远不需要。回到原始社会，住在山洞里，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到那时，科技也无用，人都披一块兽皮，住在山洞里。

人类社会离不开价格，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不管社会怎么变，必须产生价格，必须有产生价格的各种制度安排。价格每天都在变，去菜市场可以看出，早上和下午价格不一样。西瓜价格与纽约股票市场价格产生道理差不多。产生价格机制，制度安排是必要的。产生价格有好些制度，人在市场上，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有进入和退出自由。进入自由指本来不买这个东西现在买或本来不是生产这个现在从事这个生产；退出则反之，本来生产西瓜明年不生产而退出。价格产生必须有进入和退出自由，而且要有选择的自由。你限制某人必须到哪儿买，价格就扭曲了。不但如

此，而且要有信息交换的自由。我在这儿买东西，还要知道那边用什么价格成交。东京股市和纽约股市必须连上网。如果割断信息沟通，股市价格就会扭曲。特别是每个人都关心自己利益要讨价还价。消费者总想买个便宜货，生产者总想卖个好价钱，人必须关心自己利益。价格是人关心自己利益讨价还价形成的。它的背后是个利益问题。因此，我们放弃利益，就没有价格，资源配置错了，就变穷了，生产萎缩，生活越来越困难，各式各样条件越来越差。我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里一开始就讲：人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没有价格，这个社会是非常危险的。"9·11"事件中拿飞机去炸楼，这个人连命都不在乎，这个世界就非常可怕了。为什么我们大家敢于坐飞机？因为知道驾驶员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他对自己的命还是很在乎的。如果驾驶员像恐怖分子一样，连命都不要，你还敢坐飞机吗？所以，我们天天批私，提倡"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批判"私字一闪念"，说"私"如何如何坏，其实这个"私"还帮了我们大忙，没有私是非常可怕的。谁都不敢坐飞机，所有的事你都不敢干。现在所有设计都是按照人有私心来安排的。警局破案首先要确定犯罪动机是什么，没有这条线索将无法破案。



最后，我们从一般经济理论讲到价格重要性，讲到价格产生的制度安排，讲到人的本性，讲到人的私心，它固然有坏的一方面，也有好的一方面，而且好的大于坏的。私有时有害，当它侵犯别人的私时，就变得有害，如果它不侵犯还成就了别人的私，那就是好的。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很多哲学家认为私是万恶之源，所有世界上坏事都是私造成的，把私除去，世界就太平了，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他没有看到把"私"抛去后，世界将更不太平。而且他看错了，世界之所以丑恶，并不因为有私，而是因为侵犯了别人的私。如果我有私，而且知道你也有私，那么我们一起想个办法，大家都得到好处。使各自的私都得到满足，这个世界将是很好的社会，利人利已。可怕的是，我虽然知道你也有私心，但我的私膨胀到侵犯了你的私，这就变成了坏事。要使我们社会安定，就要让每个人追

求利益，同时不侵犯别人利益，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任何一个行动，都要想一想，我这一行动有没有侵犯别人的利益。私的坏不在它本身是个私，而在于它本身侵犯了别人。按照私心，你只要不侵犯别人，这个社会就可以有秩序的组合起来。相反，一个没有私心的社会将无法组织，这个社会所有秩序安排都基于人有私心，同时防止个别人私心膨胀到侵犯别人时，这个社会就有秩序。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侵犯别人的私，我们在马路上走，把人家道给挡了，这是最普通的事，我们天天都能看到的。在国外，这样的事很少。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最能体现老百姓的素质。不但中国和国外比，就是大都市和一些小城市比，也有这个差别。大都市里人比较守规矩，遵守交通秩序，这也是个学习过程，慢慢地知道守规矩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有时，我也走，你也走，堵在一起，谁也走不动，对谁都没好处。好像坐地铁，谁也不买票，最后地铁关门了，大家都坐不上了，对谁都没好处。所以，要强调私的界限。我们不要盲目地反对私，利用私的主要特点，不要侵犯别人，而且要帮助别人实现他的私心。孔子讲"君子成人之美"。人家有个愿望，你帮他实现，你就是好人，是君子。



已经宣布了再不讲阶级斗争，可是你说为什么一个人会糊涂到那种程度，对自己没有好处、对人家也没有好处的事，要去干，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发了精神病啊？但是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就是那样粗心，"文化大革命"可不是神精病干的，是正常人干的事。为什么会干出这样非常错误的事？他们脑袋是不是有问题？这事现在还有没有？现在还有。不仅有，还相当大程度的存在，非常严重的影响到现在的一切，不是趁人之危，是跟人过不去，比如说"得理不让人"。我劝大家要得理让人，这样才有朋友，人家才喜欢你。你得理不让人，就会变个臭蛋，谁都不愿理你。不光人际关系是这样，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政府之间也是同样的道理。可惜现在的政府，很多政府都不是掌握在聪明人手中，都是被一些莫明其妙的人掌握着，他们尽干些傻事。非常感谢大家的鼓掌，我相信你们都理解我说些什么，你们将来长大了，做些事，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局

面，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真正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和平的世界。

首先我们要从根本的道理上想通了，你的行为模式，你过去习惯的思维方法都会改变，你现在感觉到"我要调整自己"，这个调整对你是有好处的，一辈子受用不尽，你会懂得怎样待人接物。在有些地方你搞错了，许多成功的地方就丢掉了，许多合作的机会就没有了，你到处都碰壁。

好了，我们回头再讲制度经济学，我说价格的扭曲会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或者说人人按照价格来追求利益时，这个价格必须是不扭曲的，价格必须是一般均衡价格，在这个时候，人按照自己利益来行动时，他的选择是符合社会目标的。我再重复一句，在一个一般均衡价格引导下，人按照自己利益做出的正确选择是符合社会目标的，也就是说他做的事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有好处。这个道理经济学老祖宗亚当·斯密就看到了，但他没有证明，到现在他的《国富论》发表200多年了，他的理论现在已得到严格证明了，证明人出于私心，按照价格行动的话，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个人选择符合社会目标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对个人选择不要加以干涉，让他们选好了，这就是说为什么经济学家大多主张自由，道理就在这里，他懂这个道理，懂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他在那时只是观察，并未给予逻辑证明，我们现在给它最完整的逻辑证明。它是基本的公理，就像我们学几何一样，欧式几何有五个公理，有了这五个公理，几何各式各样的定理就推出来了。经济学也一样，也有几个公理，所谓公理是没法证明的，只能承认他是正确的。有了这几条公理，经济学的大厦才得以建立，成为一个理论体系了。这个经济学公理第一条就是"经济人"的假定，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的，人是有私心的。还有一条就是缩位递减，这条它没有证明，只能当成公理。有这样两条经济学才得以建立，所以真正懂经济学要义的人都是自由主义的和信奉自由主义的。因为他知道在价格不扭曲的情况下，你追求自己利益才符合社会目标。那么我现在仍要问一句，如果价格扭曲的话，你按照扭曲的价格追求利益，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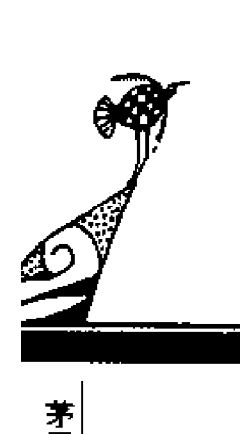


符合社会目标啊？是的，如果价格是扭曲的，你按照扭曲的价格追求利益，对这个社会是有害的。但是这个事情奥妙就在这儿，当你按照一个扭曲的价格来行为时，如果这个制度允许价格调整的话，价格会恢复到均衡状态，除非你不允许它进行调整，政府管制了。我们能常常看到一个情况，政府能管制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扭曲了，于是许多人从中得到了许多不该得到的利益。从前的价格双轨制就是这么一个现象，两个价格，一个高一个低，有些人就是低价格买进来，卖到高价格时，个人得到利了，社会受了损。但是如果政府不管制价格，当你按照扭曲价格追求利益时，这个价格是会调整的，调整到一个均衡价格上去，这也就是一个均衡价格的存在性，这在经济学里头是可以证明的，存在一个均衡的价格，这个一般均衡利益是如何达到的，就是人追求利益达到的，所以我们按原来讲的，一般均衡价格下，追求利益符合社会目标，退一步哪怕不是一般均衡价格下，人追求利益也是符合社会目标的，因为人追求利益过程中，价格会恢复到均衡状态，这个证明就是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而且它还证明这个解不但存在而且是稳定的。稳定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发散，它会收敛，收敛过程不会有震荡发生，不会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所以，一般均衡价格是存在而且它是稳定的。在经济学领域里，过去认为这个理论证明是没用处的，中国改革正好就应用了这个理论。当然，我们改革的总设计师也不见得懂这个理论。但事实上，我们利用了这个道理，我们原来的计划价格是一片混乱，通过逐渐的开放来理顺。大家有选择的自由，政府对价格的干预越来越少，通过开放，价格逐渐调整到了均衡价格，现在这个价格 30% 都达到了均衡，但是未达到一般均衡，一般均衡我刚才讲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它有质量的变化。因为任何一个商品价格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的所有商品的价格，这价格是互相牵连的，只要有一个商品价格不均衡，其他商品价格就不是真的均衡，你只要一般均衡，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价格才是真正的均衡价格。所以我们现在有许多价格不均衡，它影响到一大片，它造成了我们整个价格系统还有相当程度的混乱，也就是说我



们现在资源配置效率还不够高。

许多价格不具备竞争性，比如说公共产品的价格。公共产品就是指社会服务产品，如道路、公安、警察、国防、天气预报等，这些产品都是公共产品，这些产品它不能通过竞争来实现均衡价格。另外还有外部性。有些价格的利害，牵扯到第三方利益，叫做外部性。比如说养蜜蜂，就是有外部性的，因为养蜂的同时，附近的农作物是能够增产的。还有一种外部性就是中间产生污染。第三个就是垄断，就是一家产品，火车就是一家，就使这种产品达到不了一般均衡价格，自动实现不了，要有人去管他。因为有外部性，有公共产品，有垄断这些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政府来管价格。但同志们不要认为有了政府管，就解决了问题，没解决。我最近写了篇文章批判韩愈的《马说》，很多同学都学过韩愈的《杂说四篇》。第四篇，没有题目，一开始就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是什么意思？它说好的马是很多的，但是你认不出来，只有伯乐才能辨别千里马，因为没有伯乐，这千里马就不被人赏识，吃不好，得不到训练，被马夫欺侮，打它。它连吃都吃不饱，怎么会有千里的本事呢？它说半天就是要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但谁是伯乐？我们不知道；谁是千里马？要有伯乐就知道谁是千里马了。谁是伯乐呢？那么有两个人都说自己是伯乐，而两个人看的马还不一样，那你怎么判断？谁是真的伯乐，谁是假的伯乐呢？韩愈开了个大玩笑，它用解决一个更难的问题来解决一个较容易的问题，找伯乐比找千里马更难。为什么说这件事，我们都有韩愈同样的错误想法，把一件事交给一个智者——伯乐来解决。可是谁是智者，谁也不知道。刚才我讲了因为有这些产品外部性、垄断问题，所以要请一个政府出来，请一个智者出来，但是谁是智者，政府是智者吗？政府跟我们一样，只不过它当了一个公务员，就变成了一个政府了，伯乐可能有不同，政府可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它去解决，它能去解决得好吗？当市场失灵时，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韩愈这种思想方法是非常有害的。它把我们面临的困难问题交给一个并不存在的智者来解决。计划经济就是这么



一套想法，它认为有一个聪明人它能够把计划做出来，大家都按计划去实现，经济就搞好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国家计委几百人做计划，他比我们聪明吗？他的计划经不经得起推敲啊？绝对经不起推敲。他说明年经济增长率为7.5%，七点几，你的根据在哪儿？他根本拿不出来，他胆子大，像我就不敢说，胆子大还能说，极不负责任。但是大家还挺信任他，仅因为他是大官这一点，你不敢跟他挑战，如果你跟他挑战，他哪个计划也站不住脚。要放弃！计划经济是骗人的东西啊！绝对是骗人的东西！对于千里马问题，我们要用到哈耶克的理论。哈耶克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了"自发秩序"理论，反对人为安排的秩序。所以说是不是千里马让它们出来跑一跑，你就能发现谁是真正的千里马了，你不要把它圈在圈里，要让它有机会施展才华。判别千里马，不是靠伯乐，而是靠实践。所以，我们的很多习惯想法（如韩愈这篇文章）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一部分，但非常误导人，他与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唱反调。我们改革成功，就成在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自发秩序。不是说我先设计好一条路，哈耶克就反对这个。我们改革成功不是谁设计哪年哪月干什么东西，而是走一步看一步，这就成功了。这里肯定有学费和错误，但它没有出大问题，在小问题上错了赶紧就回头了。不管国家大事还是个人小事都要有灵活性。总之，个人选择是自发秩序的基础，自发秩序的形成靠每个人按照追求个人利益且不侵犯别人利益的原则在里面活动。

每个人都有自由的一种愿望。如何实现你的自由？那就是不要有人干涉你的自由。你周围每一个人都不干涉你的自由，你作为周围人的周围也不要干涉别人的自由。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每个人都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当你周围人都不干涉你的自由时，你就得到最大的自由。另外一个人也得到最大的自由，因为你不干涉他的自由。每个人既是自己，又是别人的环境，别人的别人就是我。我要得到自由，我希望别人不干涉我。我成为别人的别人时，我也不能干涉别人。所以，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就能得到自由。



每个人约束自己不干涉别人自由，这时每个人就得到最大的自由了。我最近写了一本书《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因为每个人都会爱一些人，但你爱的方法要对头，你可不能干涉别人自由。虽然你因爱出于好心，但可不能干傻事。有时，父母会干涉子女婚姻、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当然父母的劝告是必要的，可是劝告归劝告，自由是另一回事，不能干涉。"人民政府爱人民"，你就要给老百姓自由。信仰是自由的，谁也不能干涉。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自由是人的权利，你有什么权利去干涉人家自由。干涉了势必造成很多麻烦。互相干涉自由就是"文化大革命"，互相斗个没完。所以，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你要尊重人家，自由是人天生的权利。也要给敌人以自由，这里的敌人是指因你不给他自由而成为你敌人的人。他本来是你的朋友，但因你干涉他的自由，他变成了你的敌人，并不因为别的。当然，日本人侵略中国，这个敌人我们要反对。但有很多所谓敌人并不是那么回事，因我们干涉了他的自由，他才反对我们，你一旦给他自由，他就会成为你的朋友。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矛盾缘于干涉别人自由，你得尊重人家。这个道理适用于个人、国家之间。

产生价格的制度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所有权——财产的所有权。因为市场经济或产生价格是靠交换的。交换的前提是要有所有权，所谓交换只不过是所有权的交换。一个物的所有权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可能这个东西没移动，但交换已完成。所以，无所有权就无交换。所有权不能保障就会使交换无法进行。所以，发展市场经济要有交换，要有讨价还价，保护人的私心，保护人追求利益的权利，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护财产的所有权。我们知道，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得到利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侵犯别人的利益；另一种是不侵犯别人利益，通过劳动、与别人合作、创新，也可得利益。如果有机会侵犯别人，满足自己的私心，就不会去劳动。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允许一部分人去侵犯别人的话，这个社会将会是争权夺利的社会，大家都不希望通过劳动得到利益，而希望通过依靠权力侵犯别人利益得到利益。

这个道理极其重要。从历史上看,经济是在人侵犯别人的成本越来越高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因你觉得不合算。财产的所有权得到保护时,你侵犯别人利益,就不容易,那还不如自己去生产。人类社会生产力之所以会发展,就是因你侵犯别人劳动越来越困难,还不如自己去生产。所以,保护财产所有权关系到一个社会的进步。人追求利益,如果侵犯别人代价高,他就选择自己劳动。但一直到市场经济,人权才被尊重。在这以前的历史,人类社会每个阶段都有特权阶级,可侵犯别人利益。中国过去是个皇权专制社会,不重法律,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因此,谁都想当皇帝,皇帝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把他赶下台。一直到毛泽东为止,这个社会不曾改变。林彪曾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说得很透明。因此,谁都要权。毛泽东害怕自己的权被人夺了,首先把彭德怀弄下台,然后把刘少奇弄下台,因为他自己觉得没保障。也确实有很多人处心积虑想造反,把皇帝拉下马。每个人都想得到安全,就要有权,没有权,就没安全。

改革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领导层有人权。头一个下台的是华国锋,他有人权,现在活得好好的,连赵紫阳现在也在打高尔夫球。现在领导层的人权比老百姓的人权更重要,领导层有人权,可以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不致于被整掉,顶多当不了官,但人身安全无太大危胁。领导中间有可能有不同意见,表达民主声音,这有多重要!人权对每个人都是极端重要。随便侵犯你的权利,你就无安全感,革命从来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无权无势的人造有权有势的人的反。造反,首先破坏所有权,建立一个新社会。穷人造富人的反,连富人的所有权都得不到保障,你穷人的所有权能得到保障吗?所以,革命、造反的结果只破坏所有权,穷人还是穷人。只有当穷人的所有权得到保障时,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进步。我们说保护财产所有权,往往以为这是对富人有利,富人有钱,才需要保护,富人的财产至少比穷人得到的保护多。但是,我们说财产保护往往针对穷人,穷人自己要明白,我要尊重所有权。首先,富人的所有权你得尊重,连有钱有势人的所有权都得不到保

障，你当一穷人还有什么保障？可惜是每次革命把所有权都破坏了，结果穷人还是穷人，得不到保障。现在社会，农民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他的负担变成一块橡皮泥，一会儿减少，一会儿加大。因为农民财产得不到保障，何以减轻其负担？一个农民到北京打工，弄不好就被遣返，路费自己出。人权得不到保障是个大问题。只有无权无势的农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我们这个社会才会进步。因为你不可能通过侵犯他们得到利益，那只有自己劳动、创新、发明得到利益。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需走很长一段路。现在农民可以进城找工作，虽然受到鄙视，找工作受限制，只许干粗贱的活，但总归比以前有很大进步。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进。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一个效率最高的经济。全世界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富国。当然，有很多国家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好处，想搞市场经济，但做不到，因为它们缺少平等和自由。印度有四个种姓，人与人很不平等。印度财产分布男女不公平，每年要烧死好几千女的，因为她们出嫁时嫁妆太少。印度虽号称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民主搞得非常糟糕。我们以为民主了，贪污就没有了。实际上，印度贪污比中国还厉害。不要以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就能解决问题，不那么简单。但保障人权确实能解决问题。人与人权力差别很大，我们国家就有这个问题。农民与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差得太远了，省长的车过路卡不交费，人与人很不平等。要做到人与人平等，这是马克思的理想，但很不容易。美国算是一个比较自由、平等的国家，但美国这方面问题也不少。大家知道美国前两年有一个辛普森案，一个人把他离婚后的妻子的情人给杀了，连他妻子也一起杀了，最后他作案的血手套从他寝室搜出，但他有钱，请了一个很好的律师为他辩护，最后无罪释放。一个普通穷人是无法做到的。但美国社会有一好处，这件事谁也瞒不住，所以后来他在民事诉讼里败诉了，民事诉讼判定他杀了人，对他进行民事处罚。一个人不能逃脱法律制裁。所以，这个社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它制度上比较懂得这点。

现场答问

问:若人人都为自己利益着想而不防碍其他人的利益,社会则最优。这种理想国能够实现吗? 又怎样解释那些侵犯别人利益的托拉斯跨国公司给整个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大利益?

答:理想国,看是什么样的我说它实现不了,但我们可能接近它,而共产主义这个理想国就实现不了,我刚才已证明了。公有制不行,产生不出价格来,计划经济是不行的。我们人类不能没有理想,而且要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我们不希望成为为理想而奋斗的人,我们希望都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懂得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



问:你说托拉斯跨国公司对社会有什么好的作用?

答:这有好多争论,我也说不太清楚。

问:请问中国面临信用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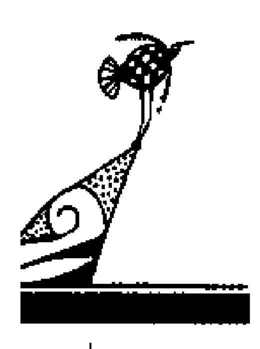
答:有很多原因,制度安排有毛病。我们往往使不守信用的人占便宜,结果守信用的人吃亏。这种制度鼓励了不守信用。比如,对假冒伪劣的处置,过去对于海关走私的处置。假冒伪劣就是把假产品没收,海关走私就是罚款,但很少。结果,走私比不走私赚钱,顶多罚个款,还不是罚款,就是把税给补了,这么一来就鼓励不讲信用。德国人很守规矩,但并不能得出结论,德国人比中国人守规矩,德国人都好,中国人都不好。人都是一样的,问题是个什么制度。现在问题出现在我们的制度对不守信用的人没有适当的处分。我们这个社会往往有一种过头情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种说法应非常谨慎。我们这个社会不把说假话当回事,从政府开始说假话,老百姓也开始说假话。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行的,克林顿一句假话就差点下台,尼克松因说假话下的台,伪证是犯法的。

问：请问大连政府会接受你关于自来水价格的建议吗？为什么？

答：我的建议太多了，很少有人接受。我并没正式向他提过建议，我只是现在提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问：我是经济学新生，如同一个忠诚的宗教徒一样对经济学有狂热的崇拜，我有一个欲望，就是通读经济学著作，具有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所谓欲望的抽打下诞生成功。作为一名经济学学生，我应具备哪些素质？

答：用不着读遍所有经济学名著，但要真正选择一本名著读，真正地把它读懂读透，而且我不赞成对经济有狂热。我过去认为经济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我认为一件事对于人们提高物质享受有好处，这件事就是好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经济不是最后目标。每个人的快乐的感觉是最后目标，它比经济重要。虽然经济是可看得见，经济就是钱，钱就是度量价值，一个人经济改善了，他钱多了，但钱多是不是使得一个人幸福呢？那倒未必，看你会不会用钱，有很多幸福与钱是没有关系的。当然有的也有关系，但是有更多的幸福是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们跟朋友交往，不见得都需要钱，我们要懂得不花钱也要懂得快乐。



问：请问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依然盛行外汇管理？

答：我觉得是这样，苏联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失败，实际是因为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开了。其实，没有新规矩就把老规矩破了，那就变成规则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野兽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没有规矩了，人就随便行为了。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它是有步骤的。外汇管制已经改了 10 年以上了，现在还在改，改得很有步骤。我觉得中国在所有改革中，外汇管制是很成功的。每年都有好几个改变方法，但不是一切放开的。我们知道，1977 年恢复高考，用不了好多年，两个月。但外汇管制不是，是慢慢地改，不能一下放开，但最后肯定要放开，需要时间。

问：劳动力价格在西方不仅呈现阴性，而且很多取决于工会与

资方之间力量的消长，能用简单的供求均衡价格去解释还是不能用？

答：是的，这意见很对，劳动力是很特殊的商品，一般的商品，价格上升，供应就增加，而劳动力提高，供应就随之下降。若一个人一个月拼命干挣1000元，那若给他5000元，他就不愿多干，所以劳动力提高，供应就下降。这个问题在中国下个二三十年后会发生很大问题——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问：市场中更多表现为信息传递的不充分影响价格机制发生作用，而这种信息不充分也是绝对不可以避免的，以你的经验，是不是完全信息的充分假定？

答：这个完全信息很难做到，几乎不可能。但我们尽量接近，取消一些不必要的信息传递障碍。



问：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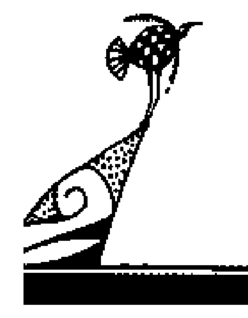
答：这个问题很大。各个民族、各个文化有其自己的特点，但市场经济的规则不管是哪个文化哪个传统，它必需调整过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不能适应需要的，或者调整，或者灭之。现在的趋势，整个来讲，承认市场经济的各种安排，调整自己。

问：你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合理吗？普通的工薪阶层会成为农场主吗？如何成功？

答：这个问题，我不是专家，很难回答，只直观感觉回答。从效率上讲，自由买卖是有效率的，但从公平来讲，自由买卖可能会出问题。我去看过一个 smoking mountain——冒烟的山，菲律宾的。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垃圾堆，菲律宾很热，太阳一晒，一下雨，那地方臭气冲天，但在这个垃圾堆上，住了30万人。他们为什么不住别的地方？他们是农村无地农民，到城市打工工作找不到，只好搭塑料棚，过非人的生活。我看了之后，改变了想法。我本来赞成土地自由买卖，但现在认为，农民的唯一社会保障就是这块土地，没有别的。

问：方才谈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我想问苏联和东欧的巨变问题。我们都知道，它们的经济正处在困境之中，所以有些人平时否定了它们的改革模式——休克疗法。但还有人认为它们已经改革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方面。因此，它们必定会渡过难关，而且会后来居上，而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有所麻烦。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就东欧这些国家，每个国家情况还不一样呢！对中国讲，我估计苏联要恢复市场经济秩序，很不容易，我看十年也不行。包括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一个守规矩的老百姓，一个有信用的市场，这个不是短时间建立起来的。他走到这条错路上，要回过头来，我觉得难着呢！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现在正在解决中。特别是这次我们参加世贸组织，这是向全世界、全中国人民宣布：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所以，有这样一个政策保证，我觉得中国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问：中国电信改革成功，中国的电力、供水等部门应怎样改？外国有无经验借鉴？

答：外国有很多经验。说老实话，对垄断部门没有一副万灵药。政府有政府的问题，市场有市场的问题。所以，一般都是用综合治理的办法——政府加上消费者协会、新闻的监督等综合办法。每个国家的办法是不太一样的。

问：互联网带来的新经济对传统经济造成影响，那么均衡价格就是价值在这个领域内是否应用？

答：我想应该是，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问：你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在我们发展国家的经济中利弊何在？

答：我觉得中国人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不平等。中国人的历史中没人权观念。人权观念是从西方产生的，民主自由的想法不是中国产生的，中国一直是几千年皇权专制思想，这个东

西根深蒂固。现在农村这种思想还是相当强的,我认识很多农民朋友,他们受到冤屈,就写信给我,希望我有办法。这是什么意思呢?不相信法制。当然法制对他们成本非常高,这是互为因果的,他也根本不相信它。但这种想法在农民里面很普遍。他认为我要有个青天大老爷,他总寄希望于别人,而不懂得出路就在于我自己。"我要捍卫我的权利"这一点观念比较淡薄。

问:*您个人怎样评价改革后的腐败现象?*

答:我们应该这样看,发展中国家全有腐败,没有例外。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国的腐败同外国的腐败很不一样。从严重的程度讲,我觉得不算最严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腐败就应该。但是,这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且中国还没滑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有的国家就是无可救药,整个烂掉了。现在中央纪委还是起作用的,如果哪一个干部被写了封信,他是很害怕的。这说明他们还是起作用的。



问:*我是学法律的,你能对我们说几句要求吗?*

答:我觉得学法律要凭良心办案子。

问:*请问茅先生,你认为我国目前价格体制主要弊端在哪里?应该如何改进?*

答:现在主要弊端就在于垄断。

问:*你认为我国金融市场能否均衡?为什么?*

答:我觉得目前金融市场离开放的金融市场差得太远,首先利率不能幅动。但是要逐步达到均衡是很难的,我估计至少要10年时间。

问:*请问:你居然说价格是必要的,是否对任何东西都必要呢?怎样才能杜绝一次性筷子的使用?是否要对它进行定价或定较高价?*

答:其实,这种筷子是可再生资源,所以只是管理不当,问题不在筷子上。我专门做了研究,在市场的力量下来发展我国的林业,

我们发现这里有很大的潜力。如果我们把这个潜力稍微挖一点出来，那些筷子根本不在话下。看起来，消费很大，其时还是很有限的。关键问题像这种再生性资源，问题不在限制它的使用，而是鼓励它供给，我们要增加它的供给。

问：*就我国的实际情况，你认为如何给千里马施展的机会？谢谢你劳累为我们作报告。*

答：我觉得现在已经给我们很多机会，农民可以进城，公务员可以下海、出国，路子多得很。同美国比，机会没有它多，中国人到美国，只要懂英语，活下来一点儿都不难，有的是机会，开通渠道。

问：*你认为中国入世后，我们金融制度应怎样安排才是最好？*

答：头一条，要让老百姓开银行。这个金融问题还是出在垄断上，银行是国家垄断的，没有人同它竞争。

问：*请问，河北的城市规划应该怎样安排？*

答：从原理上讲，一定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那才可以做。

问：*你是学理工出身的，你如何看待经济学的数学化？*

答：通过数学学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办法。我的看法同很多人相反，许多认为学数学很费劲。不学数学，也能把经济学学好，但这样，绕了很大弯路，通过数学掌握经济学是一条捷径。

问：*农民权利没有保障同农村土地所有权有关吗？*

答：我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可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农民权利的根本问题，首先其人权问题得不到保障，说抓就抓，他到哪儿申诉？这是根本问题。

问：*自发秩序的探讨一旦失败，责任由谁承担，是由社会吗？*

答：问得好！按理讲，自发秩序在一定条件下是能成功，但也有失败的可能。一个社会，若有一个独裁者，那就没有自发秩序，是不是一定很坏，不见得。最后的制度是上帝独裁制，上帝独裁，无所不知，很公正，爱护每个人，最好一旦发现偏离就换掉它。方法



二：民主，乱哄哄的民主。你是老百姓你做主，我是老百姓我做主，吵个没完。非律宾的民主就是这样，啥事干不成。非律宾绑架事件很严重，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到了绑匪，到法院一判，几年都没判下来，最后无罪释放。

问：你认为社会制度上的约束与人道德上的约束在社会上应该怎样平衡？另外制度应怎样制定与实施？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答：我不是，我主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社会制度与道德共同约束，一个好社会一定要讲道德。

问：现实中我国经济状况是供给大于需求，下岗人员庞大，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参考美国20世纪60年代，罗福斯采取的宏观政策，我国应该大力借鉴，但你一再强调价格理论的重要性。请问二者有没有切合点？在哪里？



答：中国现在需求不足，是制度上有问题。我们投资这部分是计划经济，造成我们需求不足。另外，我们的社会信用不行，资金流动有困难，资金流动要靠信用，信用不好，资金就无法流动，结果，供给大于需求。

问：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威胁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原因是什么？你能说一下或推荐几本书吗？

答：说不清楚。在国际社会中同在国内一样，强国往往欺负弱国，所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国际上很难做到，当然现在比过去强了。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国家在联合国中受到同样的约束，这个还做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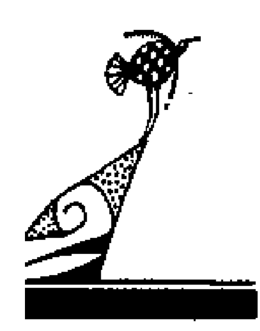
问：你方才说尊重自发秩序，而你也承认市场失灵，而你认为政府干预并非制裁行为，况且又不可能利用制裁来解决问题。你认为如何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答：没办法解决，我们只能够用补救的方法，包括政府、舆论界、道德的约束，用各种办法来补救它，相对于充分竞争的商品讲，不用管它。它自然而然就达到均衡，它不会失灵的。但对于垄断的

外部性产品，简单一句话，用各种办法凑和，美国也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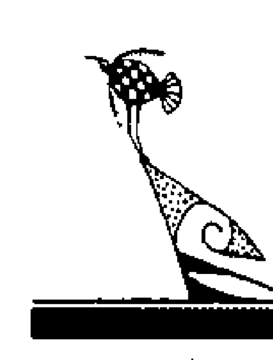
问：请用简练的语言评论一下“市场营销”这门专业？

答：它是很重要的，是沟通消费和需求的重要环节。



第10讲

宏观形势如何影响到每个企业



我主要谈中国宏观形势如何影响到每个企业的。宏观形势又是每个企业共同造就的，不是外国人强加给我们的。1994年—1995年中国市场什么都好卖，现在什么都不好卖，宏观影响企业，这不是外国人的影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1993－199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14%，从此一路下滑，1996年持平，1997年又下滑，2000年抬了一下头，2001年继续往下走，而且一个季度不如一个季度，所以2002年不能太乐观。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这2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六·四"后那一年是2%。9%给我们创造了辉煌，今天有这样的经济规模，都是20年的积累。今年提出7%，其实维持7%都不容易，所以国务院说7%左右。我国经济增长从客观上、主观上有什么条件？又有什么障碍？不但我们大家关心，是连国际上都关心的问题。高增长时，什么都好卖，还不能满足市场总需求，物价上涨24%；现在是卖不掉，整个生意不好做。过去是消费者受不了；供应就那么多，我买了你就买不到；现在相反，即便你买得再多市场上还多，消费者舒服，生产者困难。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造成物价下降1%左右，这个大变化从政府到企业，各方面都有影响。

总需求和总供给希望平衡，不要使消费者为难，也不要让生产

者为难。现在需求不足,有钱也不买东西,舍不得买,如何创造需求与供给平衡。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总需求由什么组成:需求的构成有三方面,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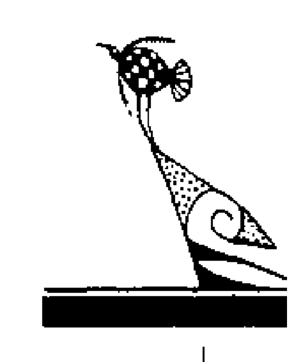
一是消费,全国每年所生产的财富中,60%用来消费,另40%储蓄起来了。消费不足,所以鼓励出口的政策出台,用外国人的消费补足自己的消费。但今年世界形势不好,出口困难。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显。而且要求别的国家进口超过出口有逆差,别的国家是负的净出口,我们出口多,别人进口多,这会造成贸易摩擦。中国2001年外汇储备超过2000亿美元,占世界第三位,引起争端,想用外国人消费补充我们的不足不太现实,也不是长久之计。

2001年各省出口变化来看,浙江省发展非常快,超过50%,形势特别好。分析其中原因有:放开民营企业,生意自由,有选择机会,这是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反过来,政府管得太多,限制百姓的自由,经济必定受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发展就是自由》。自由既是发展的工具,是发展的道路;自由本身也是发展目的。他讲的就是老百姓的言论自由、选择自由、移动自由等等,自由越多,发展越顺。中国20年改革的经验,就是自由度加大。包括言论自由、民营企业自由。要想经济增长,必须在自由上下功夫,而且不是政府给的,是自己去实施。所以宏观形势是自己创造的不是政府给的,是老百姓创造的,当然你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只有我的自由,没有你的自由,那是霸道,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自由又和平等相联系,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每个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自由的环境中时,每个人(而不是少数人)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说到底是尊重别人的自由,这是理解自由的核心。

总需求构成之二是投资,即消费后余下的钱存进银行,如何再借给企业家用来创办企业,这就是投资。消费本身不扩大经济增长,要想经济有增长,必须有投资,而投资来自储蓄。中国一年生

产出来的财富中60%拿来消费,40%拿来储蓄。现在的问题是这40%的储蓄没有完全转化为投资,所以总需求没有达到100%。中国的储备率占世界第三,仅次于新加坡和南韩。如果把储蓄的40%财富变成了投资,下一年就可多产生10%的财富,也就是10%的经济增长率。即今年投入4块钱,到明年可能生产1块钱,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经济增长很大程度靠高储蓄,高储蓄维持高增长,世界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靠外资,一但外资撤走就陷入困境,中国没这个问题。

高储蓄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低消费,现在的问题是高储蓄如何转变成投资。现在银行里有两万多亿储蓄转化不成投资,在银行里沉淀下来了,造成投资不足。其原因是大部份储蓄的钱进了银行(当然也有不进银行,进了证券、债券、购房子),如何再借出来,这个环节卡住了,两万多亿在银行没借出去,所以市场冷落。现在想的办法是让政府去投资,政府把钱从银行借出来,扩张性的修机场、修公路。但是将来怎么还?这些项目如果能有效益,政府从中增加了收入,将来还钱不成问题。但是我看项目的效益多半很低,最后又是一个财政的大窟窿,现在经济学家已经发出了疑问,较好的办法还是动员企业家投资。可是企业家为什么不投资?一是政府服务不到位,甚至设置障碍。投资有许多环节,融资,批地,立项,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政府。政府不合作就成了障碍。政府应该服务好,现在谈不上服务,不设置障碍就不错。所以形势不乐观。二是企业界自身出了问题,借钱不还,银行有顾虑。



经济中的问题除了投资不足,还有收入分配问题。这两年收入分配差距大增,有个专门术语叫"基尼"系数,当这个系数等于1时,即一个人拥有所有的财富,当这个系数等于0时,财富绝对平均。世界银行公布了最近的基尼系数,中国这个系数相当大,达到了0.403,与美国一样,巴西更糟糕为0.6,即少部份人拥有大量财富。但中国和美国不同,美国收入的差距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我们是权力造成的。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大家都想当官,当了官还想再升官,而官位是有限的,一个省不能有两个省长,你当了省长

我就不能再当省长。由于权可以变成钱，结果成了少数人掌握了巨大的财产，这是成了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现在农村收入增长率只有2%～3%，占全国人口70%的人只有2%～3%增长率，而全国平均是7%，可见城里人的收入增长超过了17%。这样造成社会不安定，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率的问题了。中国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我们有巨大的劳动力，有大量的钱，有两万亿的储备，又有非常大的市场，客观条件都存在，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要素组合起来变成生产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事来促进这件事情，如市场不热闹的原因是产品信誉不好，假冒产品太多，消费者有心理障碍。企业不敢与生人做买卖，合同条款控制不住，经常打官司，企业愿意与外国人做生意，害怕和中国人做生意，于是丢掉了许多国内生意机会。有的企业还欠工人工资，闹出许多纠纷，更无信誉。所以，改善大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起作用，每一个人都在造就宏观形势，我们每个都好好工作，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感的话，宏观形势就变了。每个人都可以起作用帮助政府走上正道，不要向官员行贿，不要把政府引到歪路上去。我们应该建立百姓是纳税人的观念，是雇用公务员到政府中做事，不是政府领导老百姓，这个观念必须树立。所以，每个人都能起到一定作用。我们提倡从个人做起，来提高整个社会素质。在发展国家，老百姓是什么素质？在德国坐车无人检票，如果换成北京多少人会自觉自愿地买票？北京的地铁已经通车十多年了，至今我们还没有学会先下车后上车。所以在这个转变中每个人都来推动它，使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变成发达国家。有一个误解，认为“一切取于领导”。有些人让我把意见转达给江总书记、朱总理，以为中央没看到问题。其实解决的办法就在我们自己手里，公民素质决定了政府素质，有人说：“政府是人民的镜子。”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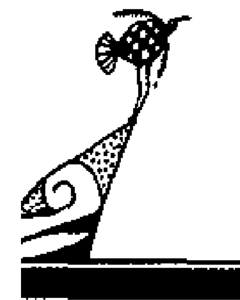
第 11 讲

跨世纪中国环境问题的思索



我们在环境方面取得的成就跟20年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经济增长，使得我们有更大的人力财力来改善我们的环境，而且这也是一个公民素质提高、跟上现代化思想的一个表现，是环境发展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另外，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跟我们的开放有关系。我们环境工作的许多经验都是吸取国外的经验，环境方面的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多，同时国际援助也很多。所以我觉得，环境的改善也得益于我们的开放政策。今后要使得我们环境能继续改善，还需要坚持环境方面的开放政策。环境标准的提高，是紧密地跟随着经济发展的。你看全世界环境好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相反的一些穷的国家呢，就搞得很脏、很乱，环境、生态的破坏非常严重。所以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不能够忽视经济的发展，同样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忽视环境。从长远来看，环境会影响到发展，环境坏了也搞不了发展。但是从某一个具体的事件来看，它是互相矛盾的。你要求环境你就得牺牲发展，你要求发展你就得牺牲环境，所以对于每一个做环境决策的人来讲，他面临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厂该建不该建，或者该关不该关，那就是对环境与发展的选择问题。所以从经济学来讲，我们在每一个决策的过程中，都要考虑到环境和发展的选择，做出正确的抉择。

比如说淮河流域关了好几千个造纸厂，如果现在该关，当初为什么要建呢？当初建就是错了。就是说，我们要发展，但是不要做傻事。因为以后要关的，现在还要建，那就是干傻事了。所以我觉得要使得我们走上一个前后一致的，既有利于环境又有利于发展的这样一种政策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得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决策人物懂得在环境和发展中间怎么样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对环境工作者提出来的一个新要求。其中有个重要规律，就是环境标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而提高，人均收入很低的时候，你还吃不上饭，那就谈不上有多好的环境，先顾着吃饭再说。吃饱了肚子，就要讲一讲环境了，至少环境上要能过得去。等达到小康更富裕了，对环境享受的水平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说环境和经济是相匹配的，我们没有可能超越经济水平的发展要求一个过高的环境水平。归根结底，要解决环境问题，要有钱、有人、有物，而这些东西都得靠经济发展。我们过去 20 年之所以环境上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说到底还是跟我们的改革开放这条总的方针有关的。如果我们片面地只顾发展不顾环境或者是只顾环境而牺牲了发展，这都是不行的，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调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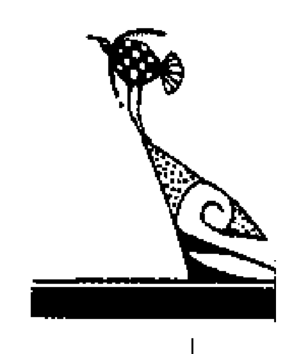


这就是几代人中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未出生的人他还没有机会发言，所以我们没办法跟他面对面讨论我怎么跟你分配利益，那只能靠我们的这个软件，我们的这个良知。所以说，到底环境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它关系到人怎么能够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能够满足其他人跟下一代人的环境要求。因为环境这东西有点像钱，花掉它就没有了。当然你可以再去赚，你也可以改善环境，但是它牵涉到很多利益问题，这个利益问题就要有一点道德来约束，不能够只顾着自己或者当代人的要求，这也就是原来谈的公众参与问题。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这儿，要发动每个人内心对于环境的一种责任感，每个人爱护环境，实际上就是一种奉献，就是用自己的人力财力，去为了整个的环境做出贡献。他跟赚钱不一样，赚钱是用我的力量为了我自己，而保护环境则是用我的力量、用我的钱，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大家，所以说公众参与实际上是一个

道德教育的过程。

保护环境为什么要讲道德呢？我觉得它的特点就是我做了贡献但享受不仅是我本人，是大家都享受，那么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每个人都得到了好处。如果只有一个人这样做，其他人都不关心环境，那这个问题一个人做也白搭，所以这个要大家共同努力，而且要有一种领先的意识而不是搭便车，最后你没去改善环境，我什么劲也不用费我就享受了环境，这显然是不行的。相反我要领头，我要作出我的特殊的贡献来改善环境，那么大家有了一个模范，大家跟着他走，这个环境就会越来越好。

对环境的保护制定个标准，这就变成法律了。那有人就要问了，你这个标准从哪儿来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应该说，环境标准的根据，是建立在经济上的。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减少排污，那就要比较每一种减排方法哪一种成本最低，那一种成本高。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减排的就应该叫他多减一点，少排一点；对减排成本高的，就只好让他多排一点，这样就可以达到同样的减排总量而耗用较低的成本。所以对环保措施应该有一个经济上的比较，拿经济比较的根据作为立法的依据。否则，我们可能在一些治理成本特别高的地方费了很大的劲去治理，而只减少了一点点污染，而很容易治理的，减少排污成本很低的地方，标准又定得太宽了。这样就会使得我们治理环境付出的代价高，而达到的效果小。我举一个例子：北京治理大气污染有十几条办法，恐怕还不止，我知道的就有十几条，比如淘汰老的车辆啊，控制尾管的排气啊，取消小锅炉啊等等。每一条都有它的成本，我们再做比较，哪一条成本比较高，那么这一条我可以不执行，哪一条成本低，那么我就大力地推行它。这样你就可以用比较少的钱，实现比较好的环境。所以一方面是法律限制，而法律的基础呢还是一个经济上的比较。



目前除了法律手段之外，还有一些经济手段，像美国实行排污权交易的气泡政策。就这样一个气泡，设想着在一定范围之内实行总量控制。如果这个厂要多排，那么那个厂就要少排。为什么要调整呢？就是使得减排成本低的地方多减排；因此可以减少减

排成本高的地方的减排任务。在减排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就可以节省减污染的总成本。从这里可以看出有很多市场的办法。其实排污收费也是一个市场的办法，就是企业有权利选择是交钱排污还是自己治理而不交钱，比较哪一个更节省一些。

如果把这个排污收费的标准定得太低，那意味着你允许排污造成对健康、对建筑物等的各种损害，这个排污收费的标准定在什么水平呢？定在一个对于它排污造成的损害跟减少排污的成本相等的水平，应该定在这个标准上。

严格讲，经济活动造成污染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只是有大有小。如果你要彻底消除一切污染，那么我们就得取消所有的工业，变成原始人。所以我们现在追求的是物质享受和环境享受的一个均衡。我们不能放弃所有的物质享受而只要环境，如果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回到石器时代了。我们需要的是，一方面有相当的物质生产，它必然要产生污染，这个污染我们把它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这个环境标准随着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也不断提高。怎么达到这一点呢？可以通过污染收费或排污收费来控制它的排量，将排污控制在一个水平上。企业可以选择排污，也可以选择治理。如果选择排污的话，则所交的钱应该恰好等于它所造成的破坏。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均衡环境和发展。就是我一开始说的，环境和发展是一个选择，选择的点在哪儿？就在排污收费的标准上。我们现在做不到，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们做不到意味着我们容忍排污所造成的损害。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的老百姓是有人类持续发展的意识的，这个都不是空话，最后就落实到我们的政策法规和日常一言一行上。所以我觉得环境问题不能单纯靠市场解决，最重要的是一个靠法制，一个靠道德。当然这个道德也好，法制也好，都要有它的经济基础。为什么要这样做？从法律上讲我已经说了。为什么国家要规定这样的罚款标准，这样的污染收费标准，总量控制多少，这都要有经济分析。每人要寻求一种对自己来讲用小的代价能更多地改善环境的方法，所以需要懂得改善环境的知识。



这样就可以实现降低成本而更好地改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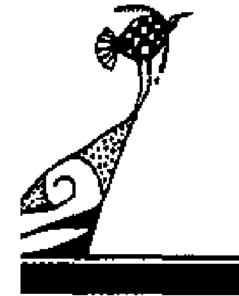
我觉得我们对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要有一个适当的均衡，什么意思呢？首先环境不允许我们像美国那样的生活。美国的生活所消耗的地球资源非常巨大。如果中国也达到这个水平，地球根本就承担不起。世界上的石油三五年就要用完，用完之后用什么？我们还没有发明可替代的东西。不光是石油，各式各样可以耗竭的矿产，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这一代还没有，下一代，再下一代，其实要不了一百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要有一个较长远的眼光。因为人的幸福不只是物质享受，还有非物质享受。比如说我创造一个东西，钉个小板凳，这是我做出来的，我做的跟买的那个小板凳我的感觉就不一样，我有一种创造欲望的满足。当然不是光钉个小板凳，我可以办很多事，可以组织起来去改善环境，这也是一种事，是吧？普及教育，帮助有困难的人，这都是一种创造欲望的满足，还有求知的欲望。



中国现在人口控制得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这两年的人口年增加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八几，这个跟美国的水平一样，美国现在差不多也是百分之〇点九的样子，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稳定，因为过两年可能会出现第二个生育高峰，但总的说起来，在发展中国家，我们是相当不错的。其实人口控制的问题，说到底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意识到我自己不能生得太多，因为你生孩子生得太多，尤其在农村，孩子生得多，打起架来拳头也多一点，所以他暂时希望生孩子，而且希望生儿子，但这样一来你一个家庭可能短时间得到好处，但是对于整个人类，对于整个社会，对资源的消费，就有坏处。所以像这些事你说不用道德约束用什么来约束？刚才我讲到全球环境的这个责任，也是一个道德问题。说到底这个环境问题，只有道德才能约束。你法律约束不了，你市场经济也约束不了，因为法律还需要控制，他可以和你打官司。你费了好多劲，能减少多少污染？经济也是一样。经济只是指出你怎么样做更合算，更有效，但你做不做还是一个道德问题。所以这个环境问题对人类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就是要人懂得约束自己，对物质欲望的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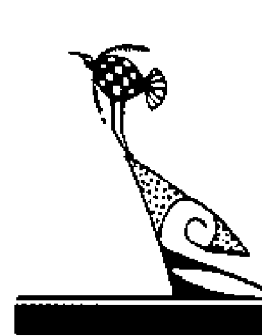
束，这才是人类长远发展的道路。从人类历史上看，有许多民族，它最后的消亡就是生态破坏到最后没办法了，而且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沙漠化、一些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人不能生存，就是沙进人退，或者水土越来越被破坏的地方，人就没有生存的来源了。像这种事在历史上是曾经发生过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糊里糊涂的，没有任何清醒的认识，那么确实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人类能不能生存下去就是我们的子孙将要面临的问题。

看起来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相当严峻的，但我感觉我们也不必悲观。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有足够的财力来组织力量对付它。所以现在重要的是行动。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但是马上立竿见影能够使环境得到改善的，还是我们每个人的具体行动。所以，我们应该大家同心协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来改善我们的环境，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有个比较好的生活条件。



第 12 讲

最要紧的是让农民进城①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清华大学明理楼就中国农村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制约农村发展的有体制和政策上的原因，入世对中国农村和农业利大于弊，是农业发展的历史机遇。茅于轼指出，目前最紧要的是让农民进城。

“粮食自给”是不恰当的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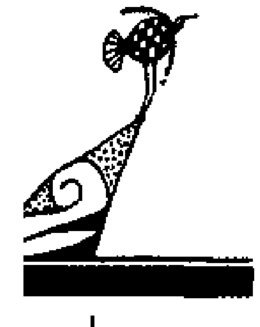
我国多年来一直提“粮食自给”的口号。一般认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能否养活自己，这不仅是中国自己，也是全世界一直极为关注的问题。早在 1995 年，就有过一篇著名文章，提出了中国能不能养活自己的问题，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很大的辩论。当时，许多中国学者以及中国政府得出了一个比较倾向性的意见认为，从中国的历史看来，中国是能够养活自己的。现在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过剩了。而且现在中国政府担忧的是因粮食过剩而造成的粮价太低。

茅于轼认为，“粮食自给”的口号是不恰当的。一味的强调粮

① 根据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整理

食自给，不利于粮食贸易的发展。由于对粮食问题存在错误看法，使得粮食政策也一直错误，例如，冻结耕地量、不断提高粮食收购价。这样，不适于种粮的地方也千方百计种粮，不利于因地制宜，降低粮食种植的成本，也不利于开发优势农业。

茅于轼指出，粮食问题的解决要靠市场。台湾原来也大力发展粮食种植，大量种植常规作物，但到市场上一点优势都没有，后来渐渐搞精细农业，如养殖、加工等，向外出口，就赚钱了。大陆在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上也根本没有优势，规模小，耕作方式落后，技术也落后，成本就远高于发达国家。而美国的小麦不仅价格低，质量也高。不能拿自己的劣势产品与别人的优势竞争。那么，大陆也可以发展精细农业，如花卉、养殖、食品加工等。



针对有人担心不提“粮食自给”不安全，茅于轼认为，一部分进口，一部分自给，两个来源和现在“粮食自给”一个来源比，哪个更安全？所谓不安全，无非是与那个国家产生摩擦。与这个国家有摩擦可以进口别的国家的粮食嘛，如果很多国家都不出口给你，那就是自己发生问题了，怪不得别人。

最要紧的是让农民进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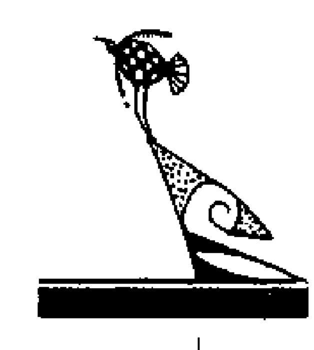
最要紧的是让农民进城，农民进城对农村和城市都有好处，对农村，节省了土地，现在农村每家都有宅基地，基本上男孩长到一定年龄就会分到宅基地，这些就占了不少土地。如果到城市住楼房，就能节省很多土地。

现在有人担心，这么多农民进城，城市岂不是更拥挤了？交通岂不是更困难？治安岂不是更混乱？茅于轼说，这些想法是片面的，没有全面看问题。一个真正经济发达的社会，是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社会。农民进城，不仅仅是来赚钱的，也是来花钱的。来花钱也就同时为城市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就业机会。

以东北的鹤岗市为例，这个城市原来是一个纯粹的煤炭工业城市，煤挖完后怎么办？城市就该解散了？而鹤岗市又靠买房地产使城市复苏了。开始房价卖得很低，很多人都来买，买房的同时

获得城市户口。这样,装修等建材市场也跟着起来了。接着,进城的人还要生活啊,于是各种商业、服务业也接着兴旺起来了。

在入世后的未来10到20年间,将有5亿农民要进城。入世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利,有人受益,有人会有所冲击,没有优势的行业要减产。在农业方面,大米没有问题,因为大米是劳动密集型的作物。种小麦、玉米、大豆的农民肯定要受损。但整体上看,入世对农业和农民是有好处的。但农民要作调整,使自己适应市场,摈弃劣势、发展优势。所以,入世后,农业不是全面退却,而是要进行结构调整。茅于轼说,农民受法律保护的程度太低,农民和城市居民(更不用说官员)之间存在着权利不等的情况。农民的权利受到侵害后,告状很难,甚至是告状无门,这在许多地方都比较普遍。现在最要紧的是让农民进城,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机遇,在城市中找自己的位置。



在现在情况下,农民是不是要经历一个"破产—进城"的痛苦过程呢?茅先生说,破产可能会有一些,但农民进城会有一个自然调节和淘汰的过程,哪些适应城市,哪些不适应,要经过这一过程才知道。所以,允许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为其保留耕地,以保证其在城市实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可以回到农村。

信用危机,使得农民想用钱也借不到

现在的农村,还有很多放高利贷的情况,因为农村金融存在问题很大。农民们存入农村信用社的钱被借出去了,而借款人(包括政府部门)不还钱,农民的一点储蓄被吸干了,自己要搞生产用钱时,反而没处借,很可怜。由于管理混乱,农村基金会被国务院取消了,但没有替代机构,致使农村金融没搞活,搞死了。于是,高利贷热了。储蓄被吸干,农民借高利贷,又必然造成社会不稳定。

为什么借钱的可以不还钱?这是信用危机的一个表现。资金的借贷是很重要的,钱在我手里没有用场,但到另一个人手里,却被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创造财富的一种方式。问题是钱怎么从没

用场的人手里流到用它的人的手里？只有相信一个人还钱你才会借给他。

中国有两万多亿的钱借不出去，而农民需要大量的钱，大约一万多亿。两万多亿的资金呆在那里，不能生效益，就是社会信用不好造成的。美国没有高利贷，因为信用好，任何人都能借到钱。你看，美国人几乎是把全世界的钱都借了。而在我国，会计师大都会做假账，做完之后换个地方仍然做。为什么？没有记录。所以有人说，现在是老实人吃亏，奸人占便宜。

信用的建设，需要全方位努力，包括政府、金融界、学校、家庭等，都得讲信用，政府的责任最大。



贫富差距不可能消除，判断生活过得好歹的标准是"大家都高兴"

贫富差距是不可能消除的，具体到个人之间，总有差别，知识和能力不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收入上必然会有差别。重要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茅于轼说，我认为，标准是"是否大家都快乐"。一个良好的社会状态是像《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富人与穷人那样。富人都有同情心，乐于帮助、救济穷人，而穷人则都知恩图报，内心感激、愿意报答。这样建立起来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就能够让人感到人间的幸福与温暖。如果救济都由政府来做，就成了一个强制性的、冷冰冰的行政行为。富人的救济出于被动，穷人也不知道去报答谁。那种快乐和感激没有了。再说，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全都救济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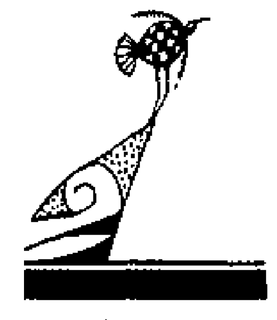
盛洪有个不错的理论：一个社会是不是合理，主要看它对穷人、对弱势群体的态度，看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否及时、到位。如果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良好的保护，优势群体就会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剥削、压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长此以往，优势者只有堕落，很难指望他们去创造财富。如果弱势群体的利益被保护得很严密，不容易被剥削，那么，强势群体只有通过与弱势群体合作共同创造财富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双方都有收

益，这样，整个社会才有进步的希望。判断生活得怎么样的标准，最重要的是“看大家是不是都高兴”。



第13讲

经济落后地区如何赶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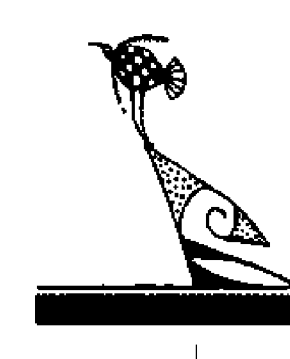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到贵州来跟大家一起商量西部开发与西部经济赶上东部经济的问题。

西部经济落后在什么地方呢？落后在一个“穷”字上，或者说，每个人生产的财富少了。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多生产财富，使得每个人的钱多起来。这个问题应该说没有什么争议。要赶上去，就必须有钱嘛。那什么是财富呢？这个问题就有争议了。我们搞一个项目，投了许多资，最后却赔了钱。东西生产出来了，比如生产出了电力、煤等各式各样的东西，但却赔了钱，那么，这是不是生产财富呢？或者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生产就赚了钱，这是不是生产财富呢？比如说，我在一个东西便宜的时候买进来，等到贵的时候卖出去，我赚了钱了，我生产没生产财富？因此，究竟什么是生产财富，是有争议的，是需要讨论的。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赚钱就是财富。当然，这个钱是赚来的，而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是按市场规律赚来。我刚才讲，便宜时买进，贵的时候卖出，你赚了钱了，你就是创造了财富。反过来讲，你生产很多东西却赔钱，那你就是消灭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

两年前我到山西省，山西是煤炭大省。我在会上讨论山西的发展战略时，提出一个看法：我说，山西要减少煤炭生产，为国家创

造财富。从来都是增加煤炭生产，创造财富，我这个意见是没有被接受的。但现在他们后悔了，因为煤炭生产过剩，煤价一直往下落，煤价一低，成本就不能收回，所以煤炭就是全行业亏损。一年好几十个亿呀！煤炭是生产了，物质是生产了，但财富却没有生产。

刚才跟田主任谈了很多项目，政府投资的项目。这些项目能否赚钱，有很多是要打问号的。有很多民间投资，外商投资，他们肯定赚钱，不赚钱他不会投资。可政府不一定，政府有政府的想法，有各种理由，开发西部呀，经济基础结构的改变呀。但不管理由有多硬，如果你是赔钱，你这个项目就没理由上。所以，赚钱是生产财富这个观念要牢固树立起来。还要再证明一下，为什么说赚钱是生产财富呢？这个要用到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一般均衡理论（我们知道经济学有一个叫一般均衡或叫总体均衡的概念）。一个商品均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缺了就涨价，多了就降价。这个时候，价格完全调整供应和需求。涨价之后，需求减少，供应增加，最后一个商品的价格可使商品的供求达到均衡。这个道理不用任何证明，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那么，一般均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所有的商品统统都达到供应和需求平衡，这就是（商品都达到）一般均衡，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质的变化就是任何一种商品都可以买得到或卖得掉，因为它没有供不应求，也没有供过于求。任何一个商品想买都可以买得到，想卖都可以卖得掉，因此，任何一个商品都可以转换成另一个商品。你把它卖掉再买进来，它的转换的比例就是按钱计量的价格，所以，这个时候价格（钱）代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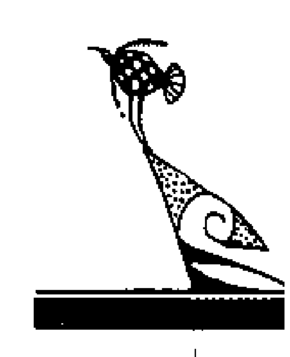


同志们都学过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价值？它必须是一般均衡下的价格，有了一般均衡的概念，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一般均衡价格就是商品的价值，除此发外，没有任何别的价值。你怎么能够证明它呢？其实不须要证明，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存在的），在一般均衡状态下商品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它唯一的度量就是价格，这个时候钱成为度量价值的

一个单位。这就是，经济学中最难解决的问题，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了。我们只要承认一般均衡的存在，当然一般均衡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是经济中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是可以证明的，而且它能证明这个存在是稳定的，就是说，(你)有一点波动它能恢复到稳定状态，不会一波动(它)就发散了。如果钱代表价值，赚钱就是创造财富，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应在观念上逐渐调整过来。有许多财富，它没有任何物质形态，但它确实是真正的财富，赚钱确实是为社会增加财富。举个例子：大家知道金融业是个很大的行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其中工作，每年创造的财富可达上万亿美元(是创造财富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是非常重要的行业。我们看看外国的报纸，大概有一半的篇幅都是讲跟金融业有关的事情，讲汇率怎样、利率怎样、股票、房产怎样，都是跟金融有关的。金融业赚的钱在哪儿呢？它有时候连张钞票都看不到，它就是一笔账，你什么都看不见，它就创造财富了，而它确实是存在的，你拿这个钱是可以买东西的。所以，我们原来的一些观念，原来计划经济的时候是一定要创造物质财富，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有些财富不是物质的，有许多是信息的。而人的消费越来越消费非物质的东西，以前我们觉得消费一定是物质的消费，吃东西一定要吃到肚子里去，但现在我们看财富不一定是吃，他富有的话，他物质的消费越少，但是他消费的信息、他消费非物质的东西——服务越来越多。服务也不是物质 ，你去理发，理发有一点点物质，如剪刀、推子、梳子什么的，但它主要不是物质的，主要是劳务。原来理发只需 10 元钱，现在理发变成美容了，要花 100 元，那 100 元就是财富。因我美容花 100 元，你赚了 100 元，是可以买东西的，理发所享受的服务变成财富。所以我们要逐步改变生产的观念，不光生产物质，尤其是生产非物质的财富，而且这一部分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大。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总产出的比例是 70% 以上，我国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贵州更低一些。所以说要使一个地方富起来，我们是要**创造财富，这个财富就是钱。当然我说的这个钱不是靠偷靠抢靠骗，是创造出来的。通过交换钱多起来了，那就是创造财富。**如果

偷、抢、骗能够不受制约的话，那比辛辛苦苦去创造财富要容易得多。你把人家创造的财富弄过来，那何必辛辛苦苦去创造财富呢？在市场经济中，正因为用这种非市场的方法得到财富成本越来越高，你要付出代价，要坐牢，在社会无容身之地。因此，人们只有一个办法去赚钱：通过交换，通过市场，通过合作。

其实人类历史发展经过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对于财产的保护。在此以前，你很容易侵犯别人的财产，有钱的人很容易侵犯别人的财产，没钱的人只好被剥削。因此大家都想变成有钱的人，不要去做那个被剥削的人，想办法变成一个剥削别人的人。到后来，剥削别人不可能，抢和偷都不行，你想变成有钱的人，只好通过创造财富。当然，我还要讲为什么交换会创造财富。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由于个人的财产得到保护，侵犯他人的财产不容易了，这才有了市场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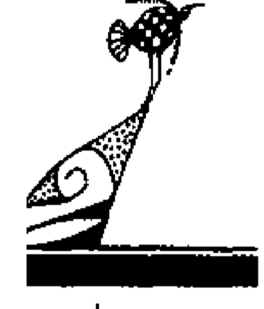
我们看中国现在的情况，中国哪些人的财产得不到保护？农民的财产得不到保护。他们的利益经常被侵犯，很多人靠想办法去侵犯农民的利益来致富。农民的利益是橡皮泥，被捏来捏去，一会增加一会减少，他不受到严格的硬性保护。所以，我们农村问题很大。我敢说，我们农村问题要最彻底解决就是农民财产得到严格保护。你向农民要钱，只有法律的途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理由拿农民的钱。

我们虽然想要发展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发展上受到什么障碍？财产得不到严格保护。我们政府经常关掉民营企业，没有什么理由把它关掉了。他投了很多资，费了很大的劲，建成一个企业，现在，政府把他关掉了。当然，似乎有它的理由的，例如破坏了环境。它犯了什么错，你治它什么罪。它环境保护不好，你治它的环境；破坏资源，你要他交资源税；它偷税漏税，你罚它的税。你没有理由把它关掉。一个企业可以随意关，那谁敢来办企业？所以，政府要依法办事，不能乱来。

刚才我讲了，人类历史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财产能不能得到保护。这几年我们有很大的进步，表现为我们打官司很

多。打官司就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个人财产是应该受到保护的。我可以到法院使我的财产得到保护，而且大家相信这个法院能够为民主持公道。昨天，我们听说“老干妈”就打赢了官司。政府为你主持公道，法院为你主持公道，这就说明我们的财产逐渐得到保护。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观念需要仔细想想。我到深圳、大连，那里的桑拿浴给关掉了，理由是浪费水。这不是笑话吗？那人家用水就不浪费，它用就浪费？你怎么衡量水的浪费？用水大户根本不是桑拿浴，而是农业。你怎么不关掉农业呢？很奇怪。我们脑子里缺乏严格按规律办事，法律对财产的严格保护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

刚才，我讲了为什么交换能创造财富。交换以前和交换以后，从物质上看它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我拿一头羊跟你换一柄斧子，交换以前是一头羊跟一柄斧子，交换以后还是一头羊和一柄斧，物质上没有什么变化，哪财富从哪儿来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我的羊跟你的斧子来交换，说明我会养羊，你会打铁。如果（你）硬叫养羊的去打铁，那就为难了。所以我用养羊的方法得到一柄斧子，这就是交换的优惠。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他的优势，避免他的劣势。



为什么要有国际贸易？因为国家之间各有优势，这叫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便宜，中国劳动密集产品就有优势。我们有些东西没有优势，高技术产品，我们就没优势。你会生产超音速飞机吗？或者亚音速飞机、喷气飞机？我们生产不了。不但国际贸易是这样，国内贸易也一样，任何一个贸易都是比较优势在起作用。通过交换比较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整个生产成本就降低了。否则，养羊的要用斧子，还得去学打铁，那这个社会成本就高了。现在通过交换，每个人都可以用他擅长的去生产，就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产品。交换产生分工，养羊的人越来越明白羊怎么养得好，打铁的人也一样。这样就发展出专门的学问来。现在世界生产的学问，放一个图书馆都放不完，你 10 辈子也学不完。但是，你可以享受一切先进的技术，你用不着都会。我们每人都会坐飞机吧，但用不

着你会制造飞机。这样，财富就增加了，人们的生活就提高了。我们说资源配置，就是养羊的专管养羊，打铁的专管打铁，我们不能让他们乱换，那就是配置错误。在“文革”的时候就是叫老师到农村去种地，叫工人到大学里去管大学，然后叫军宣队管工厂，拿地毯当窗帘，窗帘当床单，床单当台布，整个资源配置错误。现在我们地毯是地毯，窗帘是窗帘，台布是台布。

那么怎么不使它们混乱呢？有两个方法：一种是计划经济的方法；一种是市场经济的方法。计划经济说，我看这个地毯是地毯不应该做窗帘，所以把它当地毯。要是有一个人出来说，我看未必，这个地方的窗帘可能就要厚的窗帘，跟地毯一样。这个问题就变成争议问题了。市场经济怎样解决呢？谁是主人谁决定，用不着别人去管。市场经济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是由权威来决定资源怎样配置，决定怎样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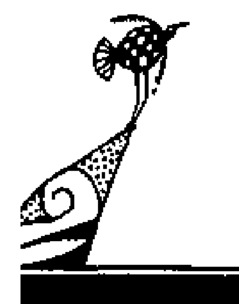
对交换的任何阻碍都是有问题的。别人要交换，我制止人家交换，不容许交换，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这里的学问挺大的，有的确实有必要，例如没有经过健康检查的人卖食品，这就要加以制止。但总的说起来要慎重。现在对交换有许多的限制，这些限制有的是有道理的，但很多是传统的想法，是有问题的。

前两三年，各地政府要取消农产品的进城的中间环节，说农民的蔬菜农民卖不了多少钱。可各地城市人口买蔬菜很贵，这个中间差价太大，因为有中间环节。所以政府想了一个办法，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办法，取消中间环节，让农民直接进城卖菜。其结果怎样呢？菜更贵了。中间环节跟旅行社的作用一样，中间环节有一个批发市场，农民把菜卖到批发市场，批发市场再把菜卖到超级市场等各个市场。批发市场知道各个市场的供应和需求，它也知道比如说黄瓜，什么地方的黄瓜更好、更便宜，就从哪儿进货。没有中间市场，就缺乏比较，有了中间市场，它的资源配置就合理了。所以说，中间市场在创造财富。它重新配置资源，但它没创造物质，虽然它什么物质都没有创造，黄瓜还是农民种的。在市场中间，每个人都想办法赚钱，它看见有利可图的地方，它就来了。来了之后

改变了资源配置,减少了社会的浪费。靠了旅行社的作用,引导旅客,重新调配航班,飞机的空坐率减少了,每一个飞机差不多都很满员,它就起了这个作用。

为什么美国社会的效率高?因为任何一种浪费,都会有人把它消灭了。谁消灭了这种浪费,谁就能从中赚到钱,这个社会就没有什么浪费了。

我们这个社会,这方面还有很大余地。就拿航空公司跟旅行社来讲,我们在飞机票打折扣的问题上争论好多年了,到现在还没有争论到点子上。飞机票打折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不满座的机票要打折扣。有一次我乘飞机,早上七点钟从北京出发,五点钟出门,那飞机上就没几个人,整个像是空的。你把机票打个对折,也不亏损。你增加一个旅客,才增加多少钱的成本?但一张票可以卖好几百元钱,我们没有加以利用。我们现在资源配置中间存在许多浪费,这个浪费如果有一种自由选择和平等进入的机会,每个人都想办法去赚这个钱,这个浪费就没有了。因此,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使得每种浪费都能被填补,能避免,最后这个社会效率就提高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什么同样的劳动美国赚的钱比在中国赚的钱多。你是理发师,你在美国拿多少钱?在中国能拿多少钱?你在饭馆里面洗碗,大概在美国一个月能拿一千美元,在中国连一千块人民币都拿不到,这是简单劳动。至于复杂劳动,当教授、当医生,在美国拿多少钱?在中国拿多少钱?差别就更大。同样的劳动从数量到质量都一样,在美国值钱在中国就不值钱,所以很多中国人都想移民到美国去。原因在哪儿呢?要是说财富或价值那都是劳动创造的;同样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应该创造同样的价值吧,但事实证明它不是。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社会存在浪费。煤炭生产过剩了,你还去生产煤炭,这不是捣乱吗?没有生产财富却消灭了财富,我们就有很多这样的劳动。美国就没有这样的劳动,它是市场在那里起作用,而不是哪个计划在起作用。所以,我们说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这句话就有问题了。添砖加瓦未

见到财富，反而起了个反作用。所以，不是添砖加瓦而是去赚钱，为社会主义赚钱。在经济领域里，应该拿能不能赚钱做判断标准。

一个项目该不该上，首先要看赚不赚钱。现在我们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基建问题，很多的大项目是没有效率的，赚不了钱。生产的产品没有地方卖，这个项目根本不能成立。但是这些项目建设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理由，惟独不能赚钱，结果是造成浪费，市场经济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浪费，也有个别的投资错误，但不是很多，它至少在一开始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想得很周到。所以，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让每一人自由选择平等参与，这个经济就发达繁荣起来了。

我们西部经济为什么落后？就是这个环境不具备。相对东部来讲，西部的问题就是市场环境不好，政府有很大的责任。当然，东部是不错，但跟美国、英国、欧洲的国家来比还是不如。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才能变成一个公平竞争、自由选择的市场。我们很快要参加世贸组织了，这个对我们建立市场环境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好多事情我们自己推不动，现在让外国人来帮我们推。中国这个市场建设，外国人是帮了很多忙的，这一点我们应该看到。说老实话，整个市场制度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最早是荷兰人发明的，后来是由英国人完成这个市场制度的建设，美国人照搬，拿过去用，又把它发展了。



我们应用了很多国外的经验。甚至拿宪法来讲，它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是外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提出来的。我们用的许多都是外国的方法，很多制度包括大学怎样管理，我们过去管不好；一个交响乐团怎样管理，过去一个交响乐团一年演奏十次、八次，现在采用了艺术总监制，每年演奏二百多次，它的变化是运作方式变了，机制变了。我们用的很多都是国外的一些办法，这里头我们节省了很多的学习费用，不然，我们得从头摸索起。银行它也是外国制度，我们只有钱庄，但钱庄跟银行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怎样看一个市场完善不完善，就要有一个市场化的指标。樊纲博士作了一个研究，研究中国 30 个省、市市场化的比较，结果

是：贵州省排在第25位，很落后。市场化指标表现在哪些方面？表现在它是一系列指标体系。好几十个、上百个指标，其中有国有经济产值的比例，这个比例越高，市场化指标越低。政府预算在这个GDP中间的比例越高，市场化指标愈低。有外资在总投资中间的比例，如果你市场好，外资就进入多。还有，就是外来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例。外来劳动力多，说明人口流动比较畅通无阻，受到保护，那么市场就比较发达。还有私营企业的比例、个体户的比例，这一系列的比例，决定市场化发展的程度。

樊纲作了1997、1998、1999三年各个省市的市场化指标的比较，他得到了结果：广东第一，浙江第二，然后是上海和江苏。这前四位，三年中没有多大的变化。最落后的是青海，三年都是倒数第一。然后就是宁夏、新疆、西藏，再就是贵州了，贵州是第25位。这是他们研究得到的很重要的一个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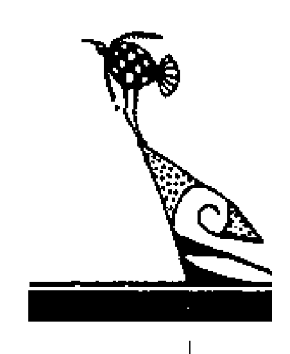
我自己研究了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私营企业加上个体户，对各个省、市作一个比较，我的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跟每一个省市的人均收入是直接相关的。这个关系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线，这条线就是私营企业跟人均收入的关系。私营企业越多，在其中就业的越多，这个地方的经济就越发达。私营企业的就业比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增加1600块钱。这不是说，这个百分之一的私营企业职工为全省每个人生产1600块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是标志着一个省市的市场的活跃的情况。

西部各个省，就存在市场不活跃、大家围绕政府转而不是围绕市场转的问题。现在开发西部，必须有利于市场的活跃。如果我们用加强政府的办法来开发西部的话，结果一定是不好的。我敢预言：就是政府来主导、政府来批项目、政府来拨款，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想赚钱，这个不用说，最后就是大家瞄准了政府，围绕政府转。争取批文、建立个人关系、走后门，计划经济的毛病就来了。如果是市场在起主导作用，大家都围绕市场转，了解市场信息，看人才在什么地方，技术上怎么得到改进，他想的就是这些。

所以，是以谁为主导这决定西部开发的成功与失败。

西部本来就是政府太强，市场太弱，樊纲的研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开发西部还是加强政府的作用，我看结果是要失败的。

发展私营企业的障碍在哪儿呢？障碍首先是投资环境问题，就是政府对待私企的态度问题。现在事实上私企是受到各个方面的歧视。首先一个歧视，就是融资困难。很多私企千辛万苦想办法把企业建立起来，也能够运作了，但在运作的时候，需要用钱，要流动资金，而这个流动资金他没处去找。开办一个私企，很少是银行贷款。根据我的统计，开办私企的资本95%以上都是自筹的，开办起来以后，他在运作的时候他需要资金，他得到一个定货、一份定单，就要投资买原料，没钱就不敢接定单。这样，私企就很难发展起来。其实，这一种性质的融资应该说是相当安全的。它不像开办一个企业，那个融资是比较不安全的。第二，在司法方面受到歧视。一个私企如果破产，他的房子就得拍卖，职工住在里头就得搬出来。一个国营企业破产，从来没听说职工要搬出宿舍的，执行就不一样。一个私企如果说是欠了税，该交的税没有交，可能老板就得蹲监狱，但国营企业老板没有交税的从来不会蹲监狱，这是司法方面的不公平。还有就是进入。有很多私企不让它进入，最近打了好几个官司，就是关于信件的投递是否允许民营。像北京现在就有很多投递公司，但是邮政系统不让他们办，说信件投递是专营的，邮政专营，私人不能经营，就是不让私企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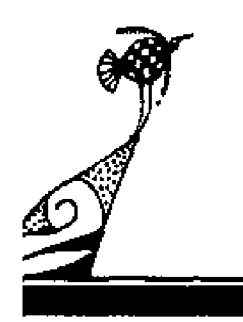


私企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财务不透明。很多私企都是三本账，银行一本账；税务局一本账；自己还有一本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偷税漏税，其结果就是拿不出一个透明的财务报告，你就很难融资。你干得很好，资金不够，想要扩大生产，你想要吸引新的资金和得到银行贷款，你首先要拿一本可靠的账。人家要看看你真赚还是假赚，一看账都是假的，矛盾百出。大的合同，人家也要看你的财务情况，你拿不到大合同。还有一个私企间互相欠账。交了货拿不到钱或者是给了钱拿不到货，这样

的问题在私企互相之间也存在的，造成我们现在企业运行困难。很多企业宁可跟外国人做生意，因为外国人付款比较痛快。

私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国营企业跟他竞争。本来竞争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国企有政府支持，所以国企赔钱也干，私企赔钱他就干不了。所以，你跟一个不怕赔钱的企业竞争那还有好吗？现在国营企业受到政府的各种支持、贷款、融资、社会保障，这都是私企很难得到的。

最后，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扶贫基金怎样运作？我们知道扶贫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输血；一种是造血。输血就是给了钱就完了，造血要生产出财富来，就是我一开始讲的。我们各种经济活动要生产财富不能消灭财富，输血仅仅是财富的转移而不是财富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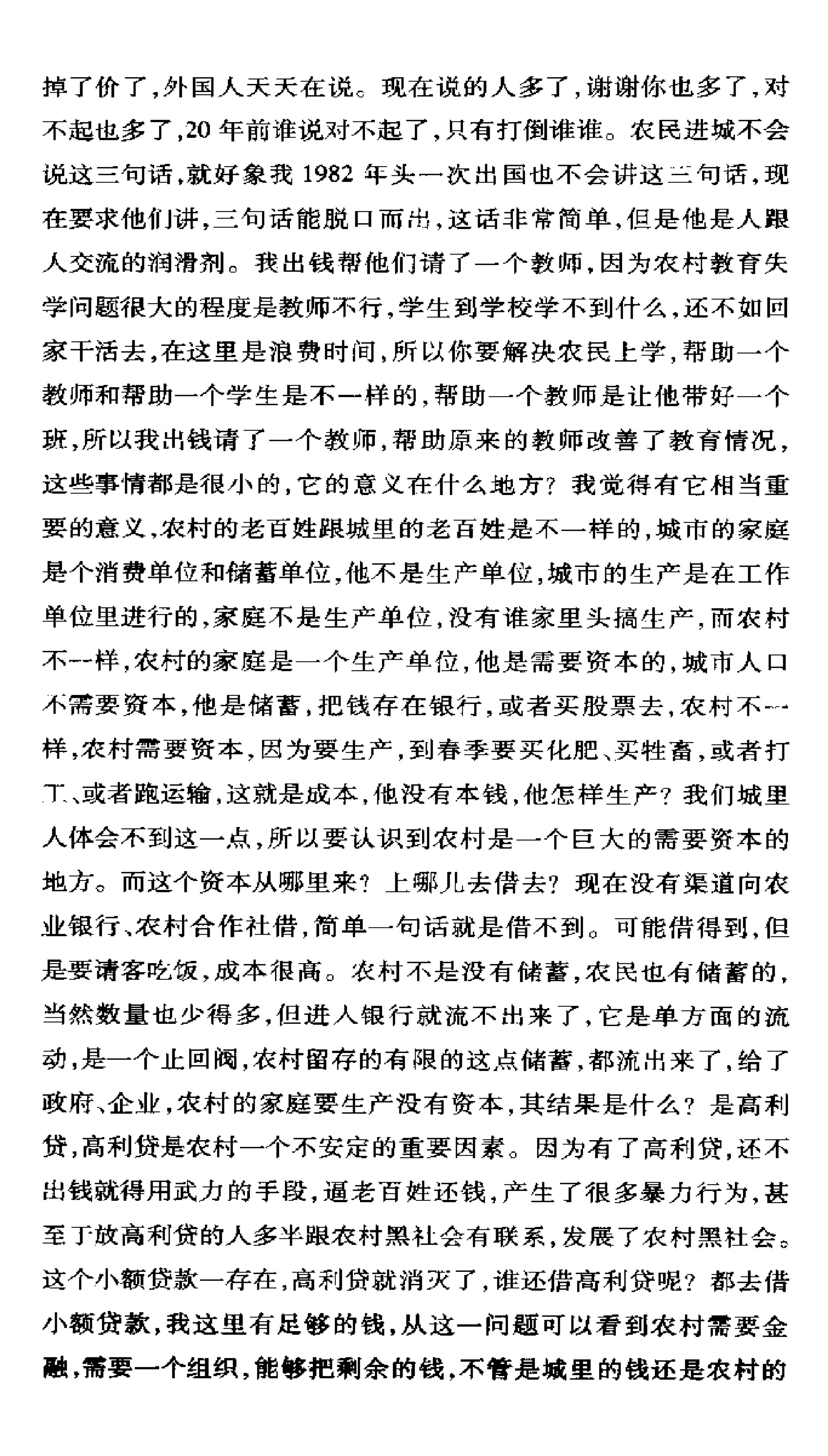


我介绍一下我个人在山西做的一个扶贫基金，从1993年到现在已8年了。93年的时候，山西一个小山村，只有240人，一个很小的村庄，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扶贫基金会。这个扶贫基金完全是由个人建、私人办的扶贫基金，它干什么事呢？就是借钱给老百姓花，不是给钱，是借钱。如果是用来看病，给孩子上学，这个钱不用付利息，你可以借一年，一年后还钱。如果拿来做生产、买化肥、养牛羊、出门打工，那么不但要还，而且还要付利息。付多少利息？每个月付1%，每年12%。这个利息从1993年没有变化过，1995、1994年的时候通货膨胀高到24%，银行的利息达到14%，那个时候我们还是12%。我问当地的农民是不是要降低利息？现在，在农村的高利贷是30%—50%，所以12%还是比较低的利息，而且很容易借得到，所以他们说可以。有的人想从我的这个基金里头借钱拿去放高利贷，他借12%，放30%—40%，当然，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借的。从一开始的时候，我投入500元，后来慢慢增加1000—2000元，到1998年已增加到5万元钱。我们开始从亲戚朋友中吸收存款，由于国家银行的利息也降得低，放到我的基金里面去，可以拿付6%的利息，我的利息高，所以有的亲戚朋友就把钱存在我这里，于是我的基金规模从5万元增加到11万元。这11万元拿来

借给老百姓,用于生产、看病和孩子上学。但现在,不可以用来消费。婚丧嫁娶我们不借,我们不鼓励这个消费。当然,将来钱多了我们可以借。那么,这么多年取得什么效果呢?我1996年去过一次,原来,在当地只有一个彩电,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我去的时候只有两辆摩托车,现在一半家庭都有了摩托车。当然,这些改进不光是扶贫基金的作用,还有其他的各种原因。

这个扶贫基金不但是帮助他们解决了生产所需要的资金,而且在农村建立了一个市场意识,就是借钱要还,不但要还,还要付利息。付的利息干什么用?首先并不是每一块钱都有12%的利息。我有1/3是用来看病和孩子上学的,所以有一部分钱没有利息,其他2/3的钱是有利息的,不管怎样,我得到的利息还是有剩余的。这个剩余的钱干什么用?一个是用在管理人员的工资上。因为有十几万块钱,每天都有几笔交易,来借的,来还的,他还要去催,管理是有成本的。另外还有一些文具费、通讯费、汇款的汇费。一个月现在工资是300元,一年管理成本大概是5000元。存款得到利息的人又要付20%的个人所得税,交到当地的税务所,当地税务所很吃惊,税务所到家家户户去收税的时候,人家都把门关了,人也找不着,但是我们这个扶贫基金会主动把税款送上门去交,税务局觉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培养了老百姓交税的意识,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农民生活改善了,税务所增加了税收,存款人增加了利息,三方面都得到好处。这个好处从哪儿来的?是农民生产出来的,是农民生产得到好处,这件事情各方面有不少报道了。除了建立这个小额贷款之外,我还帮助他们搜集城里淘汰的计算机,送到农村去,现在已送去了11台计算机,农民中的小学生、中学生有机会学习计算机,他们到城里来打工就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我要求他们讲普通话,进行普通话竞赛,我给予奖励,我要求他们懂得在城市里,在市场经济中间,人跟人怎样交往,让老师教他们三句话,谢谢你、请原谅、对不起。这三句话很简单吧,我记得我头一次出国,我就觉得奇怪,人家老说请原谅,这句话一天到晚要说十几次,咱们中国人从来不讲这句话的,谁说请原谅呀,说这句话就





掉了价了，外国人天天在说。现在说的人多了，谢谢你也多了，对不起也多了，20 年前谁说对不起了，只有打倒谁谁。农民进城不会说这三句话，就好象我 1982 年头一次出国也不会讲这三句话，现在要求他们讲，三句话能脱口而出，这话非常简单，但是他是人跟人交流的润滑剂。我出钱帮他们请了一个教师，因为农村教育失学问题很大的程度是教师不行，学生到学校学不到什么，还不如回家干活去，在这里是浪费时间，所以你要解决农民上学，帮助一个教师和帮助一个学生是不一样的，帮助一个教师是让他带好一个班，所以我出钱请了一个教师，帮助原来的教师改善了教育情况，这些事情都是很小的，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有它相当重要的意义，农村的老百姓跟城里的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城市的家庭是个消费单位和储蓄单位，他不是生产单位，城市的生产是在工作单位里进行的，家庭不是生产单位，没有谁家里头搞生产，而农村不一样，农村的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他是需要资本的，城市人口不需要资本，他是储蓄，把钱存在银行，或者买股票去，农村不一样，农村需要资本，因为要生产，到春季要买化肥、买牲畜，或者打工、或者跑运输，这就是成本，他没有本钱，他怎样生产？我们城里人体会不到这一点，所以要认识到农村是一个巨大的需要资本的地方。而这个资本从哪里来？上哪儿去借去？现在没有渠道向农业银行、农村合作社借，简单一句话就是借不到。可能借得到，但是要请客吃饭，成本很高。农村不是没有储蓄，农民也有储蓄的，当然数量也少得多，但进入银行就流不出来了，它是单方面的流动，是一个止回阀，农村留存的有限的这点储蓄，都流出来了，给了政府、企业，农村的家庭要生产没有资本，其结果是什么？是高利贷，高利贷是农村一个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因为有了高利贷，还不出钱就得用武力的手段，逼老百姓还钱，产生了很多暴力行为，甚至于放高利贷的人多半跟农村黑社会有联系，发展了农村黑社会。这个小额贷款一存在，高利贷就消灭了，谁还借高利贷呢？都去借小额贷款，我这里有足够的钱，从这一问题可以看到农村需要金融，需要一个组织，能够把剩余的钱，不管是城里的钱还是农村的

钱，帮助把钱用活，帮助农民搞生产，帮助农民解决生活的迫切需要。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金融管制法，你是不能够吸收存款的，现在我这里吸收的存款只限于亲戚朋友的，我就跟人民银行监管司的戴司长讲这件事，我说你们是不是调整一个管制的办法，让金融活一点，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现在还没有办法，他说你们扶贫的事不会有人管，继续干，现在我们等于是一个非法的扶贫组织，但效果很好。当然，我们也不见得完全是非法的。我不是叫吸收贷款，我是叫个人借款，个人借款政府是不管的，我向你借款，我给你6%的利息，政府管吗？政府不管，他要管不是麻烦死了吗。不认识的人来，我拒绝他存款，我自己只对亲朋好友、认识的人，我给他6%的利息，另外我帮他将所得税扣了，直接交给当地政府，这有什么不好。这个方法能不能推广呢？我觉得可以推广的，就是要有几个条件：第一，这是私人的钱、个人的钱，而不是政府的钱。农民有一个习惯，政府的钱可以不还，私人的钱一定要还，所以我主张，个人来建立扶贫基金，政府给予帮助，给予支持和保护。第二，要有一个负责任的管理员，保证及时地把欠款要回来；第三，要有一套监督管理制度，贷款办法和账目要完全公开，让群众大家来监督。



第 14 讲

法治与市场经济[①]



晚7点，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大学光华楼203室举办了“法律与经济论坛”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本所学术委员茅于轼教授担任这次讲座的主讲人，题目是“法治与市场经济”。讲座主持由本所首任所长梁治平研究员和本所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共同担任。这次讲座得到了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的大力协助。首都各大高校约50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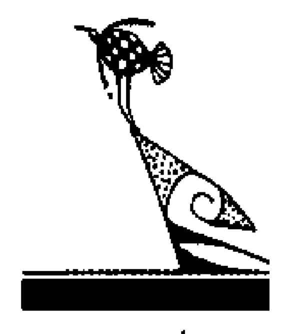
交换产生利益

茅于轼首先从经济中的交换现象说起。他说，交换产生利益，产生对交换双方都有利的结果；否则，交换无法实现。这是一个很简单而又非常重要的道理。一个人的能力只能制造很少的东西，由于有交换，我们每个人却能享受到许许多多自己无法制造出来的东西。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了交换的好处，早在有记载的

① 根据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法律与经济论坛”系统讲座的讲演内容整理。

历史以前,交换就已经存在了。

为什么交换能产生巨大的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具有独特的能力和禀赋,用经济学的话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人与人之间在体力上的差别不大,但是在智力和情感上的差别非常大。在允许交换的社会中,个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用己之长换人之长。有了交换的前提,才能出现分工。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会促成专业化分工的形成,专业生产能积累大量的专业知识用于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工具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形成规模效应,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社会产品大量涌现。富足的现代社会正是靠人人发挥其比较优势,通过交换实现的。交换使社会生产走上了一条知识持续增加、规模扩大、效率提高的发展之路。如果一个社会限制交换,每个家庭都封闭自足,自己完全消费由自己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没有剩余产品,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都趋同,没有多少差别。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优势无法发挥出来,每个家庭都具有差不多的生产能力,知识无法丰富,生产工具难以改进。限制交换是一条停滞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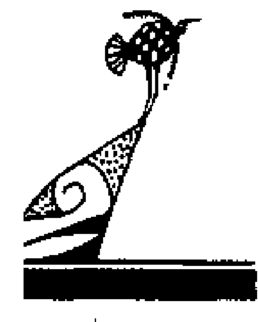
许多人不理解交换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道理。他们认为交换是等价交换,不会产生新的财富,因此鄙视交换,限制交换。这明显是错误的。交换双方如果不能从交换中得到多于不交换的利益,那么,交换就不会发生。既然人们在平等的条件下愿意交换,必然是参与交换的双方都认为得到了好处,这双方得到的好处就是新的财富。

价格是衡量比较优势的标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问题是,怎样才能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社会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分工满足各式各样的需求。对一个人而言,找到能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一个分工的位置非常重要。所谓"男怕入错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许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比较优势,找到合适的分工位置。因此需要

有自由选择的环境，允许自由选择的环境有利于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分工。

于个人而言，自由选择有助于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对于一个处于国际竞争环境中的国家而言，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则必须通过价格机制。本国的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一比较就能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所在。没有一个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制度，则永远找不到本国的比较优势。计划经济由于排斥价格，往往找不到自己的比较优势，甚至把劣势当作自己的优势。如中国在 1958 – 1961 三年特殊时期，天灾人祸，粮食奇缺，粮食生产是中国的劣势，可是在 1959 年，中国还比往年多出口了 450 万吨的粮食。中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粮食生产肯定是本国的优势，结果导致了饿死大批人的灾难性后果。计划经济时代出口了许多该进口的东西，进口了许多该出口的东西。有分工而无价格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过去，我们以为，只要有分工就能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其实不然，有了价格，才能知道比较优势所在，从而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



自由与平等是交换的前提

要实现由交换产生分工、由竞争形成价格所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需要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实现自由和平等，二者缺一不可，缺一就无法发挥比较优势，就妨碍财富的增长。人与人是自由平等的，这是人权的基本内容。有了人权的保障，才能充分发挥交换的作用，这是近些年来社会科学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这个结论与我们过去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贫穷的根源是私有制，工人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所剥削占有，因此，只有通过公有制的手段，才能解决工人的贫困问题，促进财富的增长。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社会财富能否快速增长要看这个社会是否保障了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换的权利。

人类社会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阶段：人人不平等（无人权）的

阶段和人人平等(有人权)的阶段。在长期的人与人不平等的阶段,交换得不到保护,生产力发展很慢。在法律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的社会阶段,交换得到了充分的扩展,价格机制建立起来了,于是财富剧增。在可以想像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必须有交换和价格的存在,很难想像能存在一个没有价格的富裕社会。自由平等的交换形成市场价格,价格机制能自动地平衡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不会出现某些东西长期缺乏,而另一些东西长期富余的现象。

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世界,会发现:越是有人权的国家,经济越发达;人权得不到保障的国家,必然贫穷落后。一个想要快速发展的国家,必须要非常重视人权的保护。人权的保护程度决定市场交换成本的高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发达国家的交换成本远远低于不发达国家。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明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人与人之间没有平等、自由,更谈不上平等的交换,因此当时非常贫穷。现在,人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保障,经济持续增长,人们越来越富裕。同样的人,同样的土地,工作时间减少了(现在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前是六天工作制),财富却比以前翻了好几番,区别就在于是否有人权。



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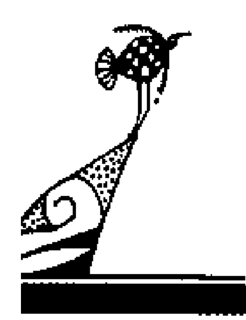
互利的交换行为自古就有,但市场经济制度却直到近代才发展起来。茅于轼分析了这个历史现象的原因。他认为,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种保护自由交换的制度是随着人权的保障而发展起来的,人权的保障是市场经济制度最终确立的前提。交换必须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基础上。过去长期都是等级社会,人与人不平等,不同等级之间无法实现平等的交换,妨碍了财富的增长。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都是皇权至上,社会分成不同的等级,商人的地位很低。不同等级之间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换,特权阶层不断侵犯社会低层的利益。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最缺乏的就是平等、自由等人权思想。人权思想首先在西方产生出来了,原因在于西方社

会的权力结构是分立的，教皇和世俗皇帝的权力不同，不同的权力之间存在缝隙。这种缝隙成为新思想萌芽、成长的地方。人权思想就在这个缝隙中产生了。“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发现了人权。人权思想的产生促使市场交换演变为一种制度。

所有权的保护

市场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是保护所有权。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着任何借口都必须在私有财产面前让步。交换行为是所有权之间的交换，无所有权则无交换。所有权在交换中是如此重要，西方发展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思想动力。但是对所有权的保护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在人类长期的等级社会中，虽然不宣称私有财产是可以侵犯的，但是穷人、社会阶层中的下层人民的财产权是没有保障的，常常受到等级高的特权阶层的侵犯。由于社会低层的人们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穷人辛辛苦苦积累的一点财产很容易被他人剥夺，因此，穷人永远是穷人。这样常导致穷人对社会的不满而发生起义、革命。只有穷人的所有权得到了保护，穷人可以通过勤奋变为中产阶级，社会才能避免革命。这样，问题的根本在于穷人的所有权是否能得到保障。一旦穷人的财产权得到了严格的保护，穷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这就是现在发达国家的情况，绝大多数的人都成为富裕的中产阶级者。正是私有财产得到严格保护使穷人走出了贫困的陷阱，而通过剥夺私有财产的革命并不能使穷人富裕起来。革命常与保护私有产权对立，革命是要剥夺富人的私有财产，很难提出保护所有权的口号。革命后，人们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许多人又会重新沦入贫困，潜在的革命因素又在积累着，于是一轮接一轮的革命，老百姓不断遭殃，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真实的历史。只有在革命中提出保护所有人的财产权，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才有可能走上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

所有权非常重要，但是在一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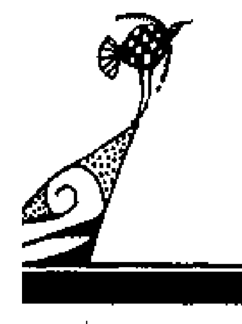
没有普遍深入人心的社会，所有权很容易被强权以各种借口和理由侵犯。侵犯所有权的行为每天都在发生，而且许多人并不知晓。比如中国农民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农民的所有权常常被侵犯；前年开始的关闭“五小企业”的政策行为等，都是明显侵犯所有权的行为。中国已经加入WTO，WTO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这也就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人权已经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要求伦理观念的变革。每个人自由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追求自己的利益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并且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反而成为一种不适当的行为，它破坏了交换的条件，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不利于财富的增长。市场中丑恶的根源不是因为追求自身利益所致，而是因为侵犯了他人的利益。如倾销政策，表面看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实这样损害了平等竞争中第三方的利益，所以是不正当的。WTO不允许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追求个人利益的重要性

过去我们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会使社会乱套，因此过去鼓吹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现在我们发现，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允许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不但不会使社会乱套，反而会使社会的财富以过去难以达到的速度增长。不过，这里有一个平等的观念的前提，即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正当性，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妨碍他人追求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每个人都不妨碍别人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真义，也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得到最大的自由。为所欲为的自由会侵犯别人的自由，这样会遭到别人的反抗和报复而危及自己的自由。不尊重别人的自由，最终会丧失自己的自由。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是自己获得自由的前提，平等的个人没有侵犯别人自由的权力，除非是特权。有特权就无人权，特权一定会侵犯他人的正当权利，特权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敌人。只有法治才能消除特权，保护人权。

追求自己利益的赚钱行为是正当的，赚钱推动了技术进步，社会发展。但是人生有比赚钱更为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对快乐的追求。使自己和别人在交换行为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增加社会快乐的总量应该成为我们在交换中遵循的原则。侵犯别人的自由，会使朋友变成敌人，亲人变成仇人，增加了社会的痛苦总量。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自由是增加社会快乐总量的途径。因此，他主张，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是真爱之道，快乐之源。让我们每个人为社会增加快乐，而不要增加痛苦。



第15讲

制度转轨中的人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改革是最成功的。只要和其他从事改革的国家作一比较，这个结论就不会有人怀疑了。但不是说我们已经改好了，政治改革已经完成了。我们还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做。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讨论关于人权的问题。

改革的20年变化是巨大的。20年以前，出国的机会只有高级干部才有，一般老百姓哪能出得了国？现在任何一个人，只要有钱，能拿到国外的签证，买张飞机票就可以上路。20年以前，有好多的冤假错案。现在呢，你要侵犯我的名誉，我还跟你打官司。那时说你是叛徒你就是叛徒，说你是特务你就是特务，你根本没有反抗的权利，现在你可以打官司，这个变化有多大！

当然这个变化还不够。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个社会怎样才算一个好的社会？从古以来就有各式各样的理想：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理想国等各式各样的想像。但是这种种理想，最后都证明有严重的缺陷。我们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把人分成两种人——奴隶和奴隶主。孔子的想法也是把人分成两种人，君子和小人，劳心者和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分了群，就没有平等可言。现在明白过来。明白什么呢？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一定要满足一个必要条件，其他充分条件还不清楚，但是必须

满足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人权,就是人跟人平等。我下面还来讲根据我的理解,什么是人权。可以说,人权的理想,代替了一切的理想。不管是叫它科学也好,乌托邦也好,人权是可以操作的。共产主义怎么建设,争论多得很。而人权的保护,则是可以操作的,而且可以一条一条的写成条文。联合国有《人权公约》,以后又有《公民经济权利公约和政治权利公约》,最近我们政府已经签了这两个公约。我们对人权的认识经过了这么一个阶段,逐渐认识到人权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它现在变成了全世界所公认的、超过一切的一个信念。本来国际法不能干预国内法,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不承认国际法,只承认国内法。有的国家是相反,国内法要符合国际法。但人权公约无例外地都要承认。

人权公约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拒绝人权公约。哪怕你实际上做不到,口头上也得承认。因为人权的规定,很难找到理由来否定它,也没有一个可以替代的东西。看看现在的国际关系,已经不是炮舰外交了。上一个世纪,英国在全世界搞了好多殖民地,英国旗帜全世界都有,太阳总是照在英国旗上。不光是英国、荷兰了,西班牙、葡萄牙都是老牌的殖民主义者。那个时代就是炮舰外交,中国人吃够了它的苦头。现在呢,炮舰外交根本行不通了。现在还有一个国家可以去侵略人家吗?像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最后落的什么结果呢?全世界都反对它。我们现在都很难设想,任何一个国家还会出现像希特勒、东条英机这样的大独裁者,发动战争去侵略别人。这种情况已经不大可能出现了,全世界都会制止它,无一例外地要制止它。所以现在的人权关系,已经超越了国内,已经变成了全世界公认的。以前你抢了人家的东西,现在得归还人家;以前你奴役了人家,现在得赔偿。慰安妇也好,英国的俘虏让日本人抓去做劳工,现在都要日本人赔偿。过去的尚且赔偿,现在还去侵略人家、奴役人家?

人权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有各式各样的理想社会。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比较能够实现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有人权的社会。当然并不是说人权能解决一切问题,还有

好多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贫富差距的问题。市场经济里人和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可是财富不平等。而且财富不平等就会引起权利的不平等。有没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够由政府不断地来注意它，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弄钱。有钱的人有势，这是很经常的。像美国这个社会，是个很平等的社会，但是有钱的人就有势。辛普森案你们知道，明明他杀了人，他请了好律师，就把他辩成无罪。他要是一个穷人，能请得到律师吗？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用法律的能力，就跟你有多少钱有关系。可是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只能说依靠政府，依靠老百姓，依靠舆论，不断地监督有钱人，不让他变成有势。人类社会，只能不断地想办法去改进它，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我们只能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加以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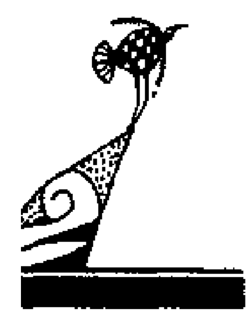


现在就要来讨论什么是人权。简单地说，人权就是一个人人都可以享有，同时又不会彼此发生冲突的权利。跟特权不同的是，特权只能一部分人享有。如果人人都享有的话，就彼此冲突了。所以人权的特点，它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

比如说，生存权，它是一种人权，因为我的生存不需要以你的不生存为条件，我们大家都可以得到生存权。但是，如果到了大海上的一条小船，只有那么一点点食物，那么一点点淡水，这个时候生存权就不会是人权了。现在我们地球上的资源，不是那种状况，所以生存权，就可以成为人权。说言论自由，这是一种人权，因为你的言论自由不妨碍他人的言论自由，大家尽管说好了。可是言论自由有一点条件，就是你不能教唆人家去犯罪。这种言论是没有自由的。我教唆一个人去把另一个人杀了，这就不行。言论自由是有条件的。它的条件还是人权，你不能否定任何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言论自由是有条件的，有些话你不能讲，但是听的权利是没有限制的，什么话你都可以听。有些话不许说，但是许可听，这不是矛盾吗？我觉得并不矛盾。因为有些话，不许可说，那是很清楚的，你叫一个人去杀人，去偷东西，很明显，这是不许可的。但是，有些话，是不是可以说，那是有争论的。“文革”的时候有好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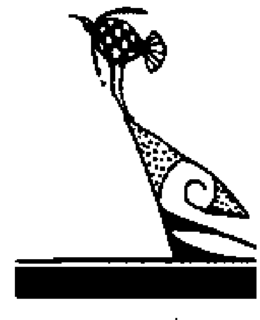
话都不让说，今天我说的话有一半是在“文革”的时候都不让说的。不光是“文革”，现在全世界有好多好多地方，就不让说一些话，它是有争论的。有的地方可以说，为什么我这里就不让说，像这种话，很明显，是有权利来听的。

刚才我说了，不妨碍别人的基本权利的权利就属于人权。对物的所有权应属于人权，这个权利很特殊。企业改革，就跟所有权有关系。我对于一个物的所有权——譬如对于这付眼镜的所有权——这明明是特权。因为我占有这个眼镜，你就不能占有它，否则还叫什么“所有”。所以对于一个具体物的所有权，是一个特权，它不具有人权的性质。但是，具有所有权的权利，就是一个人可以支配某些东西的权利则应属于人权。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就没有所有权，他对自身的生命尚且没有权力，何况对他的身外之物，他即使临时拥有某些物品，也随时随地可以被奴隶主剥夺。正因为要保证每个人都有所有权的权，所以你必须有对物的排他性的权。如果没有对物的排他性的权，那么对物的所有权只是一句空话。你说你有这个东西，他也说有，彼此不是排他性的，这个所有权就等于零。所以，只有对具体物的所有权有排他性，才能使得人拥有所有权的权力成为人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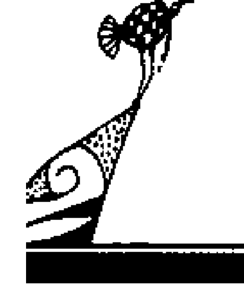
思想权是不是人权？思想权当然是人权。我在这里想，又不妨碍任何人，所以思想权是人权之一。妨碍思想自由，这是妨碍人权。在“文革”或者“文革”以前，不断地要求向党“交心”，你得交代你心里想什么，这就是剥夺思想自由权。我们知道伊朗要追杀拉什比，因为拉什比写了一本书，冒犯了伊斯兰教。伊朗的教会就要杀他，悬赏多少万元。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引起了世界上对人权的争论，是不是一个人有权利发表他的意见？英国人认为，这个权力是属于人权的，不能被剥夺的，因此不惜与伊朗断交，你要追杀拉什比就不行。思想权、言论权，到底存不存在，各个社会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别，有相当大的争论。但是，按我今天解释的人权最基本的定义，它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拥有而不至于彼此妨碍的权力。

人权是一个不可剥夺的权力。它不像我加入一个组织、一个学会、一个党派，我有权利也有义务，如果你不履行义务，你的权利也要被剥夺。但人权不一样，人权不可被剥夺。初生的婴儿没有履行任何义务的能力，但他享有人权。但有一个例外，即一个人侵犯了别人，这个时候要对他加以制裁。但是这个制裁也还是要以尊重人权为前提。什么意思呢？即剥夺他的某一项权利（如行动自由），他的其他权利仍受到保护。尤其是剥夺一个人的生存权要非常非常慎重。现在的社会发展趋势，死刑要逐渐减少，最后在非常小的范围内保留或者完全没有。坐监狱是剥夺一个人的行动自由权，他还有言论自由，还有听的自由，他有思想的自由，他的人格不受侮辱。这个观念跟我们原来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过去有一个所谓"专政"的概念，现在已经不提了。专政是什么呢，就是把他的权利全都剥夺掉，没有任何权利，把他彻底打倒，打倒之后还有踏上千百只脚，要他永世不得翻身。专政与人权是相对立的。因为没有人权就出现了好多问题，冤假错案都出来了，对犯人的侵犯，就不要说侮辱了，甚至拳打脚踢，这都是违反人权的。你把犯人抓起来是可以的，但通过法律手续。侵犯他的自由，因为他做了坏事。要进行审判，有律师的辩护，最后宣判。他的基本权利只有在一定限度之内，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才可以剥夺，而他的其他权利还应得到保障。人权是与生俱来的，生出来就有，用不着签署一个合同，承认什么义务，才享有人权。



正因为有了人权，法律上才有"无罪推定"的原则。意思是除非一个人侵犯了他人，否则他永远是无罪的。或者说有罪无罪的分界点是是否侵犯他人。附带说一句，我国司法还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人权又跟自由是相通的，跟无罪推定是相通的。人可以享受一切权利，只有法律禁止的事情他才不可以做。所以只有证明他违反了法，他才有罪。你没有理由叫他证明自己无罪，他本来就是无罪的。那么自由主义，跟人权又是怎么相通呢？自由主义就是指人们享有最大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的限度是不得影响别人同样的自由。我记得克林顿在北大演讲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这

个道理。因为我们希望这个社会人人享有最大的权利、最大的自由。如何来实现这一点呢？那就是每个人不越轨，那么每个人就都能享有自由。如果每个人都为所欲为，侵犯别人的自由，那么这个世界还有自由吗？正好像特权阶级，它可以侵犯别人的自由，就把普通老百姓的自由都剥夺没了。所以自由主义跟人权、跟平等，完全是沟通的。自由主义不是为所欲为，恰好相反，它是一种修养，是人克制自己不要影响别人的自由。特别是政府官员，必须要有自由主义的修养，因为政府官员是最有机会侵犯别人自由的。政府官员的责任是保护老百姓的自由，更不能去侵犯别人的自由。所以没有自由主义修养的人就不配做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责任就是保护人们的自由，保护人权。



人类社会脱离动物，是因为有一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跟蚂蚁、蜜蜂不同，它是通过理性建立起来的，不是通过基因建立起来的，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人类觉得有一个社会比没有一个社会更安全。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人跟野兽一样，人们彼此侵犯，各人的安全当然得不到保障，因此要有个社会。这个社会靠什么？靠两个力量，一个是道德的力量，自己懂得要约束自己，不要去做侵犯别人的事。但是光有这个力量还不够，因为总有一些坏人，因此就要有一个权威组织来管这些坏人，就是要有法律。自己管自己就是道德，管坏人就是法律。这就是两把剑，一把是道德的剑，一把是法律的剑。可是法律要有执行者，因此人类社会有巫婆、巫师，就是用宗教的名义统治社会。后来发展是皇帝、酋长，他们代表正义的力量来解决个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这样一个组织是很好的组织，使得坏人不能为所欲为。但是，酋长、巫婆、巫师、国王，他们往往本身就在侵犯别人的自由。所以本来是为了保护百姓的自由，可最后政府、组织反过来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所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变成了这样的历史：压迫和被压迫、革命和反革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本来统治者应该做好事，保护社会，保护老百姓。但是他自己变成一个额外的力量去侵犯别人，这就发生了我们所说的种种的问题。历史上，人跟人的战争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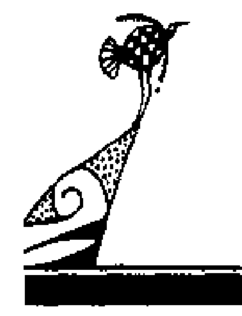
停过，其原因就是缺乏人权，缺乏自由主义，缺乏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所以，到今天我们才明白过来，别的统统都是空想，最最实在的就是人权。

什么是民主？我觉得中国把 democracy 翻译成"民主"，有很大的毛病。从字面上看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么，谁是人民呢？你也是人民，我也是人民，假定我承认你也是人民，那么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要当家作主，我也要当家作主。所以用这样的概念理解民主，容易引起好多纠纷。我觉得民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一套解决老百姓纠纷的程序。它的基础是人权，就是没有一个人能有凌驾于别人之上的特权。如果一个社会有特权就不会有民主。我说的这个特权是对人权的特权。有很多权利是特权，我方才讲的对于一个物的权利是特权，或者加入一个党派，你享有这个党派的权利；加入一个学会，经济学会，你可以得到学会的刊物等等，这都是特权，但是这些特权不是相对于人权而言的特权。如果一个社会有一些人享有对人权的特权，比如法律面前不平等，这是最普通的特权，别人就失去了人权。就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另一个本质是一套协商矛盾的规则。当人们之间有了意见分歧的时候，头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要有一套规则。首先要坐下来"谈"。不能你也不谈，我也不谈，光是喊口号，最后冲突起来，这不是民主社会。要有少数服从多数，有一套议事规程。有一本书，就叫《议事规程》，开会的时候，什么事可以列入议事规程，什么事不可以列入议事规程。有人提出要休会，像这种事怎么办，这叫做议事规程。这本书是社科院的一个经济学家王宏昌老先生翻译的，是英国人写的。这个议事规程，事先大家都同意，当出现了矛盾按照它一条一条来解决。所以，民主还是一种协商精神，它基于互相尊重和互相容忍。

说到这，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人权的思想，缺乏人跟人平等的思想，缺乏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不容侵犯的思想。我们往往看到很多家庭里面，父亲、丈夫是一家之长，把太太、小孩当成自己的财产。农村里面买卖妇女是很普通的事，而且买卖之后不觉得



是犯法，我花钱买的，又没偷，又没抢。买卖妇女有一个案例，一个农民买妇女当老婆，法院判他强奸罪，他非常不理解，他认为这跟马路上的强奸不一样，我是花钱买的老婆，这在农村很普遍。父亲对儿子讲话都是命令式的口气。所以鲁迅说，儿子还未开口，先就错了一半。我们跟西方国家普遍（当然不能说是所有的）存在的家庭关系相比，西方社会人跟人是很平等的，对于一个小孩，父亲跟他要商量着办事情，不能用命令式的口气。现在很多银行、宾馆、大商店都有很多保安人员，这些保安人员都是农村来的。保安人员来了以后要训练，最重要的训练是什么，第一是训练礼貌，不能仗势欺人。农民到城里来，是被欺负的，到城里来属于被欺负的角色，你欺负他，他不敢跟你吭声，但是他一旦穿上了警服，他得着机会就会欺负别人。或者被欺负或者欺负别人，而不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对待一切。所以，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人权的观念是特别薄弱的，这对于发展市场经济是很不利的。一个人应该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而不是用自己的拳头保护自己。我们看看农村的事情，有几个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往往就是打一架，或者是把他的果树砍了，把他的池塘里养的鱼毒死了，或者偷他一样东西，报复报复。再就是找一个村长，找一个书记，反正用人跟人不平等的办法来解决人际矛盾。所以教育老百姓的任务还是很重的。不但农民这样，城里或多或少也有，当然比较开放的、比较接受西方思想的，会好一些。甚至于在高级知识分子里头，这种陈旧思想也相当普遍，不懂得捍卫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文革"这么多年，把人捍卫自己利益这一点，剥夺得一点都没有了。浙江大学的一个教授，收到"美国名人录"的通知，说要把他选到"名人录"里去。他都不敢写回信，问党委书记这件事我该怎么办，被人表扬的权利都没有。尤其荒谬的是，党委书记也不知道怎么办，要问国家教委。所以说，我们缺乏一种最基本的保卫自己的应有的权利的观念，这在一些教授里头也是稀里糊涂的。



我想多留些时间讨论问题。下面欢迎大家提问题。

答问

问:这种问题的根源在哪?如何改进?

答:漠视人权的现象根源在哪?我觉得与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西方的人权概念也是最近逐渐形成的。西方的市场发生在300年前。市场的条件就是人跟人的平等。起初市场交换中不断受到特权的侵犯,因此产生出对特权的抵制,产生出人权的概念。中世纪有过很多灿烂的人权思想,但是真正变成一种法律行为,是因为与交换彼此促进。有了人权的思想,就出现了交换;有了交换,就推进人权思想的巩固。一直到现在,人权变成一种不可争议的东西。

怎么改进呢?我觉得发展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中国人受欺负是因为缺乏科学,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奋起追求科学和民主。可是追求了多少年,到了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一点科学也没有,一点民主也没有。这个教训深刻不深刻?“五四”运动60年以后,得到的结果是,既没有科学也没有民主。倒是改革以后的20年,民主与科学比那时好得多。民主和科学的实现,拿目前来讲,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段时间。因为有市场,每个人想要捍卫自己在市场上的权益,就产生出民主的要求,它是一种基于利益考虑的思想,它是一种很强烈的追求,不只是一种理念,一种理想,它是每一个做生意的人都要涉及到的,他意识到要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同时,也实现了科学,有了科学在市场上就能成功了。所以,怎么培养,我觉得应发展市场。但是也应该说,市场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民主和法制,还是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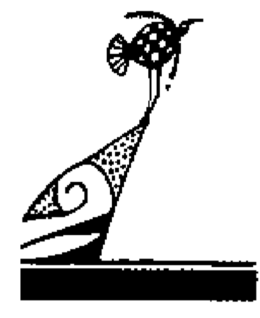
问:报告题目是“制度转轨中的人”,那么制度转轨中的“人”到

底是怎样的人?

答:是一个有自由主义思想,有自由主义修养,有人权概念的人。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太抽象。

问:美国尊重犯人的人权,以致犯人在监狱中享受的待遇极为优越。据统计,美国一年花在一名罪犯上的钱有三四万美元。从实际后果看,犯罪率高是否与过分增多人权有关?犯罪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财产,这从广义上讲,是否剥夺了纳税人的人权?

答:美国花在罪犯身上的钱是很惊人,所以美国正在酝酿把监狱商业化,让商人办监狱。(听众:笑)。已经这样干了。比如我是一个商人,我跟政府说,我来帮你办监狱,你不是现在花三四万美元吗?我花两万块钱,保证犯人满意。(听众:笑)。这是双赢的,大家都同意。当然,首先不能把犯人放跑了,放跑了就犯罪了。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的官僚主义,造成效率降低。



对于犯人是不是要讲人权?我觉得一定要讲人权。一个成功的社会,对犯人不但要有"治",而且要有"爱"。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孔子曰:以直报怨》,我觉得孔子的这个思想是非常伟大的思想。"以德报德",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这没有问题。可是以什么报"怨"呢?你对我坏,我该怎么办。普遍来讲,就有两种办法。基督教的办法:"以德报怨"。你对我坏,我还是对你好,你打我的左耳光,我给你打右耳光。这是基督教精神,它的前提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可以教化过来的。伊斯兰教则相反,以怨报怨,你要做坏事,对不起,我也对你做坏事,通过这样消灭世界上的坏事。于是以德报怨也对,以怨报怨也对,到底对在哪?以德报怨也有错的地方,它等于奖励做坏事,一个人做了坏事你还以德给他,还对他好,那不是鼓励他做坏事吗?以怨报怨呢?怨怨相报,就永远没完了。所以,以德报怨也好,以怨报怨也好,都有它的问题。孔子讲,以"直"报怨,"直"就是正直,意思就是对坏人该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不能用不该的方法对待。他对我搞阴谋诡计,我也对他搞阴谋诡计,他偷我的东西,我也偷他的东西,这是不对的,这不是以"直"

报怨，自己就错了。孔子的意思是要告诉犯错误的人错在哪里，同时又要教育他，爱护他，这就是以"直"报怨。

现在全世界面临着很多问题。问题之一是恐怖主义，搞不好恐怖主义要闯大祸。但是对恐怖主义怎么办？美国人的办法是采用伊斯兰教的办法，你对我搞恐怖主义，我就以其道还治于其人之身。伊拉克要谋害布什总统，美国就发导弹，打伊拉克。最近又发了导弹，打阿富汗。这就是以怨报怨。这个导弹该不该发？不该发。就好象你偷我东西我也偷你东西，你给我搞恐怖主义我也给你搞恐怖主义，这就没完了。所以美国的以怨报怨的办法激起了大片的反抗声，而且这种办法是没有结果的。而用以"直"报怨的办法来对付恐怖主义，你首先得找出来是谁干恐怖主义，然后给他适当的制裁。美国的导弹把不是搞恐怖主义的老百姓给打了。我们想想，为什么有人要搞恐怖主义？他有他的原因的。他把炸弹绑在身上去炸别人，一定有很大的冤屈，没处讲，最后只好用恐怖主义的办法来向全世界宣称。所以只有消除恐怖主义的原因，才能解决恐怖主义。同样道理，你要消除犯罪，就要教育罪犯，让他懂得怎么做事，做一个好人。



问：你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提出"私有制是道德之神"，又说"等价交换是一个臆断"，请你具体讲一讲这两个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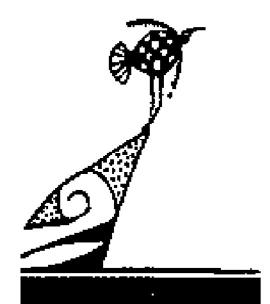
答：私有制是道德之神。没有私有制，就没有所有权，也就没有小偷了。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才可能被人偷。如果没有所有权，人人都变成了小偷。正因为人人都变成了小偷，才没有了小偷。所以，想一想一个没有所有权的社会，是多么混乱吧！怎么可能所有权不是道德之神呢？所有权肯定是道德之神。

等价交换是一个臆断。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臆断一头羊之所以和一柄斧交换是因为二者生产所用的劳动时间相等。这是荒唐的，既然用同样的劳动也可以生产出来，干吗还要交换呢？市场经济的解释是交换的双方都可以获利，因为各自的生产的比较优势不同。

问：市场经济下要求人权，中国在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出现

了权利介入资源配置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人权争取难上加难，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答：我觉得大家不要悲观。应该说，我们现在的人权条件比过去是好得多。总的说起来，共产党的领导，中央政府的领导，这20年是很成功的，这个事实我们应该承认。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呢？担心的是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但是现在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文革”时是什么状态呢，根本就没有法律。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随便就可以把他弄死。连刘少奇都没有人身保障，老百姓有什么保障？今天我们经常地打官司，当然打官司也不是太好的事，但以前根本没有打官司这一说。专你的政，你就老老实实呆着，说你什么你就是什么。所以从总的情况看，有很大进步。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解决人权问题的艰巨性。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问问每个人自身，是不是能够平等对待别人。你是不是能平等地对待你的下属、你的朋友、你的子女。这个问题并不是政府一句话就能解决的。政府有它的责任，但是更深层次的是我们每个人在心中想的那些问题。

问：你提到有关法律的问题，你提到人权是法律的基础，但是又提到法律是惩治坏人的，难道好人不需要法律吗？

答：对，我觉得好人不需要法律。如果人人都是好人，那还要法律干吗？法律只是在人跟人出现纠纷的时候才需要。当然，我这个说法可能不精确，两个好人是不是就不会打官司？他也会打官司，因为对于自己的利益解释不同，也会打官司。但是，如果双方都能够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自由主义的修养更高一点，我觉得可能这些官司就不必要了。就是多想一些人家，少想一些自己，这些官司可能就不要打了。

问：保护人需要法律，但是希特勒同样利用国会控制特权的垄断，你认为法律都是好的吗？

答：有很多问题法律确实不能解决。法律有时同道德发生矛

盾。从道德判断跟法律判断的结果有时不同，这时候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讲，这个法律是有问题的。法律的基础应该是道德。如果法律跟道德有矛盾的话，法律是有问题的。但是，也应该说回来，就是道德的观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前面讲，农民认为买个老婆是道德的，没有什么不道德。人的道德观念也在变，但是可以说不会变的是人权和自由的观念。这是可以从逻辑上来证明的，它不需要许多先入为主的假定。

问：Democracy 应当怎么翻译？

答：我没想出来怎么翻译。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怎么能更确切地反映这个含义。

问：最近刚刚拜读你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得益颇多，其中有个问题不甚清楚的是自私阻碍着社会向前发展，而是在市场制度下自利又起着推动作用。



答：我觉得自私和自利都属于人权的思想。我觉得自利是不错的，而且是必要的，一个人不会自利他就没法生存，但它有严格的界限，此界限就是别人同样的自利。做生意赚钱，这是对的，但是你要帮助别人也赚钱，不能采取欺诈的方法去赚别人的钱，叫别人受损来赚钱。自己自利，也要尊重别人的自利，这才有市场。

问：人权问题与国有企业改革有何联系，探讨它有何益处？

答：这个联系是有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所有权的重新结构，这就牵涉到私人产权的问题。我说了市场的基础是交换，交换的基础是所有权，没有所有权就没有交换，所以，所有权是市场的基础，同时所有权也是人权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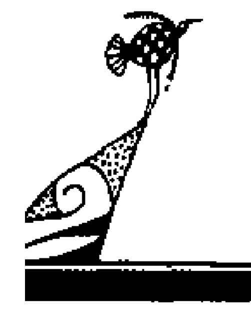
问：1998 年抗洪之后所表现出的万众一心、大公无私，是否对国企改革有所借鉴？

答：我觉得这是两种情况。抗洪救灾也好，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也好，跟发展市场是两回事。抵抗外国人侵略，抵抗自然灾害，需要的不是自利，而是大公无私、牺牲自己。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要

求。我们往往弄混了这两种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事。在大敌当前,我们还要讲市场,讲交换,你不给我这个条件我就不干,那就等着受侵略吧。同样的,我们应该在发展市场的时候,要求大家无私奉献,那就错了,市场不是无私奉献的地方。所以两个场合不一样,适用的原则是不一样的。革命时候用的一套办法,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 场合不同,遵循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问:请问,西方国家一直攻击我们国家没有人权。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人权状况到底如何,请你做一个对比评论。

答:我们国家的人权情况有很大的改进,我一开始就讲了,但是还不够。我们看一个问题,也许能说明,就是全世界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中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2%,但是中国被执行死刑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全世界的一半。我觉得中国在死刑问题上需要重新考虑。一个是太宽泛,比如说小偷也判死刑。小偷判死刑有些过分。另一个呢,是执行的太快,判刑之后立即执行。在国外,判了死刑一般都要等10来年,有的等20年,起码要等三五年。我们在执行死刑中出了很多问题,现在还有,"文革"时就更不用说了,错杀了好多人。我们的人权状况比过去有很大的改进,但是拿国际标准来看,还有很大的差距。



问:按照您的观点,市场制度的内核是人的平等,是人权,不错。现在我们在市场制度的改革中思路是明晰的,但相应的中国近期人权进步的表现会是什么?

答:我已经谈了一些例子。现在我们已经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我们政府反复地强调要建设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这也是很大的进步。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们不提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我们报纸上不断地揭露各种特权侵犯人权的事情,过去不是没有这种事,过去是不揭露,现在揭露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所以,总的说起来,我抱的是比较乐观的态度。

问:当前的制度转轨中,你认为存在着哪些有违人权的问题?应当怎样保护人权?

答：简单地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这个法律不受干预的、独立地作出判决，这才能保证法律的公正性。我觉得当前转轨之中这个恐怕是最重要的。

问：伊拉克侵略科威特，遭到了世界性的声讨。但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以致于伊拉克人民缺衣少药，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不了。请问，这是不是西方国家侵犯了伊拉克人民的人权？

答：我同意这个看法，是西方国家侵犯了伊拉克人的人权。西方国家这样做，等于拿伊拉克的老百姓做人质来对付萨达姆。就是说，萨达姆不下台，要搞大规模杀人武器，我就拿伊拉克的老百姓做人质，叫他们活得不好，很痛苦。这个理由何在？我非常反对现在的美国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的做法，它是损害了几百万人。因为一个人的错误，使得这么多人受罪，这完全没有道理！



问：目前巴尔干局势，是南斯拉夫政府侵犯了科索沃人民的人权，还是北约国家侵犯了南斯拉夫人民的人权？

答：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不好答复。

问：国企改革中怎么样处理精简人员与人权的关系？

答：精简人员跟人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除非这种精简是由于侵犯了人权。就业不是人权。就业和失业，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有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就会有失业的现象。除非这种现象是由于比如说企业领导滥用职权，欺侮职工，而且不受惩罚。

问：你认为现在改善人权对经济改革有何意义？现在经济停滞的原因是否与政治改革的滞后有关？你对现在的人权是否不满？

答：改善人权对经济改革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中国政府最近签署"公民政治权利公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在20年以前，人权、人道是不容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政府都签了这个公约了。我们要不断地改善人权，对发展经济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一开始就讲，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是讲人权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国家，没有例外。中国想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在这方面加以不断地改进。现在经济停滞的原因跟政治改革滞后是有关系。滞后的表现就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司法程序受特权的干预，因此社会的公正受到怀疑，这是很危险的现象。今年以来，我们政府出台了非常重要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停止军队经商，军队经商就是特权经商，现在停止军队经商了；反对走私，谁在那走私？有权有势的人在走私，一般老百姓哪敢走私？过去走私走了几十年了，现在反对走私，这都是重大的进步。还有司法系统，现在揭发了很多司法系统的问题，这都是人权重大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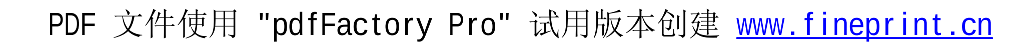
对现在的人权是否不满？我当然不满，但是我也觉得是有非常大的进步，我是比较乐观的。

问：人跟人平等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市场。那么中国改革是否首先从政治上解决人权问题，而不是经济改革优先？

答：这是互相促进的。回过头来看78年开始改革的时候，就是允许集市贸易在城市里出现，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在市场上有选择的权利。那时有粮票，买粮食要拿票，如果你不拿粮票买黑市粮，是要犯法的。而改革后，允许不要粮票的粮食买卖，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所以说，这是一种市场上的改革，同时它默认了人们的某种权利。而且这种市场的改革又强烈地要求市场的参与者更明确自己的法律上的权利。

问：中国政治改革必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权的推进而向前发展，同时中国政治也离不开中国国情。你能预测一下中国政治的走向吗？

答：我预测中国政治的走向，是跟以前一样，还会不断地走向一个法制、民主的社会。其理由是，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过去20年，在政治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我相信今后还会有这样的进步。**但我也不抱幻想，再过10年中国便变成了民主法治国家。即使十分顺利的话，也要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有了一个庞**



大的中产阶级，才可能成为民主法治国家。

问：人权是制度的内核，请问：市场制度是否与人权相冲突的地方？

答：是有的。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个例子，市场制度的结果产生了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如果这个差距是由于市场的结果，贡献大的，收入就多，这个差距是有益的。如果不论贡献大小，收入都一样，那就没有差异了，大家都吃大锅饭，市场就死掉了。但是，由于贫富差距使得人的基本权利变得不同，我刚才举的辛普森案件的例子，这种例子很多的了，有钱的人往往有势。所以一个政府应随时警惕，不要让有钱的人有势，看住那些有钱的人。比如美国的微软公司不断地受政府控告，比尔·盖茨的官司到现在也没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老看着这些有钱的人，不让它越轨，你越轨我就跟你打官司。美国的这些大公司无一家不在打官司，IBM 在打官司，AT&T 在打官司，比尔·盖茨的微软在打官司。政府老敲它脑袋，说你不要以为有钱了就可以胡作非为。这一点，我们的政府就比不上美国政府。政府要认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是要维护一个法制社会。谁最容易破坏法制？有钱的人，有势的人。有势的人，就是政府官员；有钱的人，就是大公司。



问：如何界定在社会组织、企业、政党等机构中的规定是否违反人权？

答：这个问题很具体。我不清楚有没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拿出来讨论，在社会组织、党政机关、企业里头，它的规定有没有违反人权，比如说，往往有这样一条，对于政党，不仅是政党，有些黑社会党也一样，要保守组织秘密一直到牺牲生命。这个是不是违反人权。我觉得如果这是在一个平时状态，而不是战时状态，这个规定是多余的。但是如果在战时状态，在对敌斗争状态，这个规定完全必要。所以要分情况。当然，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变到一个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的组织，所以以后对于侵犯人权

的规定，应该越来越减少。

问：交换在东方和西方社会都有着相当长的历史，而且都产生特权阻碍自由交换的继续进行这一现象，但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人权观念，有制度选择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答：西方社会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从秦始皇开始就是皇帝统治天下，但是西方从第四世纪开始，宗教与政治就是两权并立，宗教有很大的势力。中国的宗教没有势力，只有一个皇帝有政治权利。宗教在西方有政治权利，皇帝有政治权利，因此在这两个权利之下，就有一个夹缝，就能生长出人权的思想来。中国只有一个皇权，皇权是绝对地压制人权，所以人权思想没有办法生长。在西方社会生长出了人权观念，是因为有宗教权利存在的原因。



问：何以说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是最好方式，你的论证方法又是怎么样的？

答：我在这里是没有办法论证了。实际上经济学论证的就是这个，微观经济学论证的就是这个。它论证的就是，在竞争条件下形成一个均衡价格，这个均衡价格用来引导资源配置，此时可以实现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微观经济学最主要的结论就是这个。

问：你说理想国、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是人权平等，何以见得？

答：这些想法、理想国、大同世界、共产主义，你说它是科学也好，幻想得也好，乌托邦也好，它们从来没实现。而可能实现的，最符合我们理想的，就是一个具有人权的社会，而这可以操作的。我怀疑理想国、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我觉得是建立不起来的。我对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有一个很严密的论证。全民的公有制产生不了均衡价格，而惟一只有均衡价格才能够引导资源的最优配置。所以，如果一个社会要解决稀缺性问题，必须要有均衡价格。请同学们注意，我这个论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说将来人类社会有什么可以预见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可以预见的，就是社会必然有

一个均衡价格。因为人类永远面临着稀缺性，每个人都想生活得更好，(资源)总是不够的。而且自然资源不断地在耗竭，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寄希望于发达的科学技术来克服稀缺性。可是，怎么知道什么东西稀缺，什么东西不稀缺？所谓科学技术，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就是一种新的投入产出关系，它可以用不稀缺的东西做投入品，得到更稀缺的产出品，或者说你投入一块钱能产出两块钱。如果没有价格怎么能知道新的科学技术是减少了稀缺性而不是增加了稀缺性呢？学过经济学的同学更容易接受这个观点。所以要产生均衡价格，人类社会不管是几十年也好，几百年也好，如果还能有几千年的话，必须有均衡价格。如果没有均衡价格，这个社会就乱套，就可能用黄金去盖厕所，而不是去做耳环，这个社会就浪费资源。为什么黄金不能去盖厕所，而是去做首饰？因为黄金从市场价位上讲，有人愿意出黄金现在的价格拿来做首饰。我们不能拿窗帘做地毯，拿地毯做床单，为什么呢？因为有市场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会犯大错误。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以为不要价格资源就可以最优配置，这是不可能的。同学们如果学微观经济学学懂了这一点，也就真正掌握了微观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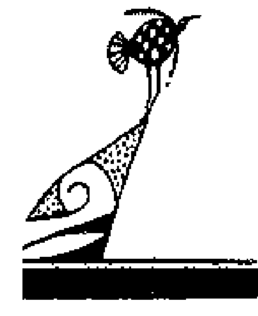
问：你刚才讲的人有思想的权利，对“文革”时交心提出了异议，我想问，你是怎样考虑现在入党过程中要求的思想汇报。(听众：大笑)

答：我没有入党，所以我不好回答这一问题。(听众：大笑)。我觉得没有权利干涉一个人的思想，这是我的信仰。

问：平等作为市场的基础现在才被认识到，是否是人类理性的认识？如果是，这一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人类最先承认强权而不是承认人权？

答：我想，平等作为市场的基础，确实是逐渐被理性所认识。我也反对人类可以用理性来设计自己。我比较赞成哈耶克的思想，他反对一种社会工程的思想，就是把社会看成一个设计的对象，我

们可以把它最优化地设计出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社会科学,不可能自己设计自己,因为设计者自己就是一个被研究的对象,不可能掌握自己。其实到现在,自然科学也有这样一个结论,自然科学的测不准原理,说明不可能完全客观地认识自然界。我们观察一杯水的温度,要插一个温度计下去,温度计一插下去,水的温度就变了,就不是原来的温度了。量一条电线中的电流,要串接一个电流表,这个电流表本身也有一个电阻,这就改变了电流。那么我观察一个东西,我用眼睛看一下总不会影响它吧?现在发现,你眼睛看,你就影响了它。为什么呢?你眼睛怎么会看到呢?因为有光线从它身上反射过来,当光线照到物体上时,在微观结构上,它的量子就变了,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已经不是它原来的东西。从这个道理看,甚至连自然科学都不可能观察到一个你不干预的一个物体原来的性状,何况社会呢?



问:请评论一下自由主义在中国当代传播的情况以及应努力的方向。

答:我在这里就是传播自由主义。(听众:笑)。我希望大家如果赞同我的意见,也跟着我传播。

问:民主的基础是什么?

答:我觉得民主的基础就是没有特权,而且人人懂得怎么协商、怎么让步、怎么求得妥协,而不是惟我独尊,只有我的才对,这就是民主。

问:中国与美国保障民主实现的手段有何不同?随着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你认为理想的保护手段是什么?

答:中国和美国保护民主的手段,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些相同的地方,但是肯定也有不同的地方。同样是民主社会,欧洲国家和美国,就有很多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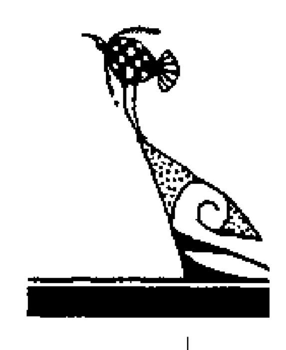
随着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最理想的保护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市场的实践。市场的实践,从利益出来,鼓励每个人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当然也需要教育,就是关于自由主义的教育。

问:所有权是不是人权?它的含义是与人权含义相矛盾的。我指的是所有权具有排他性而人权没有排他性。

答:我开始的时候解释了这个意思,就是对于一个具体的物这个所有权是排他的,但是每个人都拥有所有权,你可以拥有对甲物的所有权;他可以拥有对乙物的所有权。但是不能拥有已经被别人拥有的一个物的所有权,这个权利已经被人家排他性地占有了。也正因为有排他性的所有权,每个人才可能都拥有所有权。

问:请您对我国规范市场的立法工作发表意见。

答:我们现在对市场立法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有非常多的法。但是应该讲,立法中有一点问题,就是法律干预市场。法律管市场是不错的,但是法律不能干预市场。比如说《节能法》,我觉得这个法是完全错了。因为节能不节能是人家的选择,你没有权利干预人家。有的人愿意节能,多用一点其他的资源来替换能源。也有的人不这样。人家怎么判断呢?用市场规则来判断,就是我用一个措施来节能,我这个措施的成本跟我节约的能源做比较,投入几块钱,产出几块钱。如果这个投入产出关系是投入得少,而产出得多,那么我就愿意做。所以,法院没有权利规定人去节能,同样的道理,法律没有权利规定人去节约粮食、节约水、节约外汇、节约时间、节约劳动,什么都得节约。这是市场解决的,不是法律能解决的。法律介入到市场,侵犯人的选择自由,这是我们计划经济一贯的作风。我觉得我们的法律总的说不错,但有一些法律有问题。而这些法律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还是计划经济。计划现在不行了,就用法律来治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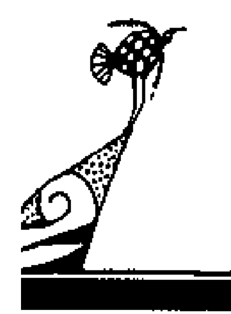


有人说了,外国也有节能法。那么,外国有的我们都该有吗?美国有节能法,但是它是失败的。所以美国也不是那么聪明,美国能源危机时也犯了大错,在全世界作为一个笑柄。我就不详细讲了。

问:怎样在我国形成一种尊重人权的气氛,你有什么实质性的建议?你对这个前景抱乐观态度吗?

答:大家知道鲁迅写《阿Q正传》,对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揭露得非常透,看得很准,中国人是有很多坏毛病。我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农民进城来,没穿上保安服的时候被人欺负,穿上保安服以后欺负别人。这都是人的一些很深层次的观念,一下子把它改掉,不可能。我们是这样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70%的农民,这是现实。这个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民主的进程,来逐渐地改变它,没有快的办法。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经济上不可能,文化上不可能。

问:今天是国企改革系列讲座,请问茅于轼先生对我国国企问题观点如何,你能谈谈国企改革问题吗?



答:中国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中国改革的成功并不是把计划经济改成了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越来越小,另外有一块市场经济越来越大。计划经济没有改成市场经济,它改不了。同样的道理,国有企业要改成民营企业,非常非常难,没有一个成功的经验。现在我们成功在哪呢?我们另有一块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不断地壮大,而国有企业在不断地萎缩,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前景。我不认为国有企业顺着1、2、3、4、5几个步骤,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到了第5步,已经变成民营企业,我觉得没有这条路。所以我对国有企业改为民营不是很乐观,我认为最后的办法是不断地缩小,那边不断地壮大,最后实现一个比较好的均衡,有一部分是国有的,有一部分是民营的,大部分是民营的,这是我们能设想的前景。